

张 学 良 轶 事



华文出版社



张友坤
王云鹏

编著



张友坤 王云鹏 编著

张学良轶事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轶事/张友坤, 王云鹏编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0.5

ISBN 7-5075-1025-5

I. 张… II. ①张… ②王… III. 张学良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107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c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32 开 8.5 印张插 0.5 印张 17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 少帥英姿

少年时代的赵一荻 ▶



◀ 1930年时的于凤至

▶ 任民国陆军第27师师长时的张作霖



▲ 张学良姐弟与母亲合影。据沈阳张学良陈列馆杨景华教授考证。左起：张学良、张冠英、张母赵氏、张学铭



▲ 赵一荻在井上温泉养鸡

一不天 知情况
 造苦 野合
 苦一知前住
 一并止 观洋
 互有元以 借
 在月 之南
 谋面之期 不
 远 见面再
 谈一切

弟 张学良

▲ 写于1929年的张学良手迹



▲ 1991年6月，吕正操向张学良赠送《冀中回忆录》

之輝下子孤臣一釋儒，
 填膺大義抗強胡，
 非且勿豈在尊明朝，
 確係台澎入版圖。

謁延平祠旧作，音聲可

正操弟正

九十老人

毅庵書

▶ 1990年张学良书赠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



▲ 1991年6月，张学良在看邓颖超托吕正操带给他的亲笔信





▲ 张学良在赠给阎明光的照片上签名



▲ 1996年6月，阎明光与女儿安琪在夏威夷和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合影



▲ 1996年6月，于魁智和夫人在夏威夷与张学良合影



▲ 1991年6月，张学良在李道豫别墅吃饭时，叶剑英的孙子向张学良敬酒



▲ 1999年12月25日，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赵双城向张学良赠送《中华世纪宝鼎》说明书



▲ 1999年6月，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在夏威夷合影，这是西安事变后60年来，张将军与杨虎城亲属首次会面

謝
你們
懷念
我。

◀ 1998年张学良写信感谢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

張
學良
的
青
島
五
九
八



▲ 2000年3月12日，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副会长王维凡、秘书长周毅在夏威夷与张学良合影。后左起：张、王、周



▲ 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与该会名誉会长张学良在一起

前 言

张学良出身特殊，少年得志，平步青云：19岁就授上校、20岁荣升陆军少将、25岁晋升中将、28岁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30岁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34岁授陆军一级上将，是名副其实的少帅。他与世纪同龄，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与他直接有关的就有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和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他是百年沧桑的见证人，其功过是非一直为世人关注、学者研究。有关他的论文、专著、影视作品之多，在近代爱国将领中可称之最。由于受家庭出身、地域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其经历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他一贯主张“和平统一，息争御侮”，“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身陷囹圄，无怨无悔，淡泊荣利，为国筹思，即便信奉耶稣，仍不改爱国初衷，深得人民景仰。他的《谒延平祠旧作》：“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①以歌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抒发其主张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反对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爱国主义情怀。1990年为纪念张学良将军九十华诞，赵一荻撰写了《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文称：“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是对自己作的事情负责，绝不推诿。他

^①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422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事与愿违，……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①“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限的要求，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激起他的抗日情绪。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与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统一，希望全国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②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③早在1934年他就提出：“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④“凡属中国人，无论其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爱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经，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⑤“他并不爱那一党，亦不爱那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就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⑥1936年12月12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学良与杨虎城不顾集团利益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力挽狂澜，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实现全国抗战，为我国获取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

① ② ③ ⑥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428页—142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④ ⑤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第169—170、103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了政治基础，功在国家、功在民族，被周恩来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当然，张学良与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他当过军阀，追随过蒋介石“剿共”，生活荒唐过并且曾吸毒。但他对此从不讳言，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则责之“堕落”，并多次检讨，一一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总之，张学良之所以能由一位年轻军阀逐步转变为功勋卓著的爱国将领，除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因为他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和纷繁复杂的内战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有一定的认识，并始终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作出巨大牺牲。因此得到华夏子孙的高度赞扬。受其影响，笔者立志于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深入民间实地调查中，发现了不少有关张学良与张作霖的趣闻轶事，现将其中的一部分编辑出版。它不是文学作品，亦不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只是一个历史小品而已。但它的确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张氏父子的爱好、性格、志向、人品、办事果断和爱国精神，读之定会有所收获。

笔 者

2000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张学良对发动西安事变和送蒋返宁无怨无悔	(1)
张学良与周恩来	(8)
张学良与吕正操	(20)
张学良是降生在大马车上，“小六子”是他的爱称	(29)
张学良是靠喝高粱米汤养大的	(32)
张伯苓给张学良以希望	(34)
张学良与于凤至	(37)
张学良是为学医才走上从军之路	(40)
张学良与郭松龄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崭露头角	(44)
张氏父子整军经武，誓报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仇	(49)
郭松龄反奉，张学良遭骂	(53)
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	(61)
张学良与张作相互相让贤	(69)
张学良与《贞观政要》	(78)
张学良特别重视教育	(82)
张学良为民除害	(86)
张氏父子与穆春轶事	(88)
张学良修建打通铁路	(93)
张氏父子创建八道壕煤矿与矿新民小学	(98)
张学良最喜欢张学思	(102)
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107)
杨扒皮誓死效忠张学良	(110)
张学良大义灭亲	(117)
张学良参加孙烈臣葬礼	(119)

张学良罚乘警背尸骨	(122)
张学良创办少帅矿	(125)
张学良支持北平青年赴西北考查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129)
张学良与文物书画	(135)
张学良与京剧艺术	(139)
张学良谈财主与土匪	(144)
张学良谈国民政府及其社会上的腐败	(148)
张作霖与张有财墓地的龙脉传说	(153)
张作霖与海大老爷	(157)
张作霖认何二爷为干老	(160)
张作霖劫持增祺三姨太，以求投诚官方	(167)
张氏父子与汤大虎	(170)
被气死的戴夫人	(177)
自杀身亡的常司令	(180)
徐傻子当军官	(183)
邹芬吞金而死	(186)
才貌双全的寿夫人	(190)
笑话	(195)
沟通红军与张学良联系的使者高福源	(198)
附 1 确保台湾入版图	
——读张学良《谒延平祠旧作》	(204)
附 2 我拜见了张学良	(208)
附 3 爱国何所罪 青史有定评	
——张学良爱国获罪略析	(212)
附 4 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	(227)
附 5 试论张学良的功过是非	(244)
后 记	(264)

张学良对发动西安事变和 送蒋返宁无怨无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一本爱国赤子之忧，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不顾集团利益与个人的身家性命，力挽狂澜，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实现全国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周恩来在世时，每念他们则必称：千古功臣。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抗日，张学良不顾部属阻拦，不听杨虎城劝告，也未告知周恩来，就决然送蒋返宁，负荆请罪，并于到达南京的当天（1936年12月26日）上书蒋介石，内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而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①对于张

^①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226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学良“负荆请罪”之事，毛泽东与刘少奇均有高度评价。1937年3月1日，毛泽东曾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① 这既充分肯定了张学良送蒋返宁的意义，也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一定作用。

然而，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的蒋介石却背信弃义，经审张、判张、赦张，然后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三部曲，把张学良囚禁54个春秋，直至蒋氏父子去世后的1990年，才算恢复自由。

张学良爱国获罪，你说他后悔吗？非也！

请看当年担任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的一段回忆：“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培德）、鹿（钟麟）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周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如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

^① 1937年3月27日《新中华报》第3版。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一人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张学良说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同我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张学良：‘你在西安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拨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①“学良据实陈述：‘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

^① 《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65—3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① 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作此事了。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①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上地位；②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③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当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作出来的。前次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致如此。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其是邵先生翼如，我心中真是十分不安。如不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以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犯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②

解放后，李烈钧谈起审张一事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

① 殷汝耕，汉奸，原任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年11月下旬，盘踞冀东25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堕落为日本的走狗，1947年被国民政府枪决。

② 《张学良年谱》（下），第1238—123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①

审判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元旦），张学良对发动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和国际影响，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阐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函称：“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已如逝水般的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二十六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的今后任务？再看看国际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巩固我们的阵线，来为民族国家及至全人类的和平面奋斗？”^②

“我亲爱的战士们！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的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憧憬与迷梦。”^③

“我亲爱的将士们！民国二十六年从今天开始了！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以往，我们也曾为急于‘回家’与不甘容忍而怨恶政府，但现在已迥非从前的情形了，我们当此新年开始之日，过去的，只如听其过去，不要再云怨望；现在的，我们必要把握得住，也不必再去讴歌，怨望不足济事，讴歌便有惰心，现在是我们的主张就要见诸

① ② ③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243—1244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行动的时候了。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请你们随着这次的元旦一致努力，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①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局面的即将来临充满喜悦，对东北军寄予厚望。

在张学良发表上述意见的同一天，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说：“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全国团结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问题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②

综上所述，可见张学良“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去台后虽长期遭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即便身陷囹圄，仍不改爱国初衷。

张学良到台后，在井上温泉曾对来看他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刑期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③

张学良在台湾还曾对一位记者说起他不愿见记者，因为记者总要问他有关西安事变的具体情节。他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是我一时的冲动，显然是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我是受共产

①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 536 页，华文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② 《张学良与台湾》，第 84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党的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决不能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① 他的这一谈话表明，他始终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正确的。

1990年8月，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及此事时再次表明，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发动西安事变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如此而已，别无他说。

^①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第115页。



一、“同乡同师”同爱国，各为中华做贡献

张学良 1901 年 6 月 3 日生于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堡，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爱称小六子，笔名曾显华，化名李宜、李毅等。11 岁前，其父张作霖在外闯荡，他与生母在辽西的新民地区生活，家境贫寒，靠喝高粱米汤维持生计。

周恩来，1898 年 3 月 5 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城内附马巷，字翔宇，化名飞飞、伍豪、周少山、冠生、胡必成、赵来等。张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周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他比张大三岁。

张学良 11 岁生母病故，同年进入沈阳。张作霖聘名师教他读四书五经，学孔孟之道，同时也学英文，使他成为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开放型人物。有

一次老师以“民国之害甚于帝制”为题，让其作文，他却写了完全相反的内容，致使老师罢教而去，遭到父亲责骂。

周7岁丧生母，10岁嗣母又故，家中料理两次丧事后，已是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他12岁（1910年）到辽宁铁岭县堂伯父周贻谦家寄居，入银岗书院读书，是年秋，到沈阳伯父周贻康家，入新建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受进步思想老师的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开始习惯了吃高粱米。他比张学良早一年进入沈阳。13岁时，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诸生为了什么而读书？”的提问时，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可见其学习目的之远大。

周恩来15岁（1913年）考进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成为张伯苓的学生。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21条”修正案，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①后来他又先后东渡日本、留法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张学良16岁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听了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有我》的演讲，茅塞顿开，精神振奋，感受之深，难以忘怀：“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努力救中国。”他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②他积极参加爱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第24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国储蓄，推销国货，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会董之后，“十分热心，遇有募捐，首为之倡，并担任队长，向各方劝募，所得称最，会中经费，得告不匮。河北水灾时，青年会带头义卖，他在会场，最称活跃，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的最多”。^①他还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21条’等爱国活动。他为“息争御侮”，“救国救民”，历经坎坷，最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毅然发动西安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全国抗战，成为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巨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垂青史。

以上简要事实说明，张、周既有出身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生，又有童年丧母的不幸和“同师同乡”的友谊。张学良在延安会谈时就对周恩来说：“我的启蒙者也是张伯苓先生，我们都是南开人。”他们生长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在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中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是时代的骄子、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在救国救民的实践中建立的友谊，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友情，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张学良的友谊。

二、“患难”之中结友谊，周为救张尽其力

张学良与周恩来相识于1936年4月9日的延安会谈。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机，仍然推行祸国殃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最终把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流亡集团逼上了兵谏之路。

张学良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浪潮的推动，再加上西北“剿共”三大战役失败

^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记》第14页，香港南奥出版社1996年版。

的教训，其爱国思想进一步升华，开始由拥蒋反共抗日转化为拥蒋联共抗日。为寻求共同抗日之路，他与周恩来在延安的一座基督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张表示：“①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②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红军坚持东出，他可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以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在云南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活动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他愿为此事活动。③蒋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蒋公开降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④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由张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①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②

是年4月22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可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如约派刘鼎赴张处工作。”^③ 张在洛川见到刘鼎时说：“我估计你会回来（此前刘就在张处工作，他随张参加延安会谈后，和周一同回陕北根据地），你果然回来了。好哇，你已不是我的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05—3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③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999—1000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真好哇，我很得意呀！我要谢谢周先生。”^①刘说：“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对你和他的谈话，非常满意，对你的未来很乐观，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呢？”还说：“同志们不同寻常地欢迎我，仿佛我是你的代表。”“蔡畅、邓颖超同志问四小姐好，她们说：‘总有一天会见面吧！’你知不知道你的勇敢言行，多么动人啊！”张学良说：“周先生为我解决疑难，建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太满意了。”^②

张学良西安兵谏后成骑虎之势，进退两难，问策无人，特邀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出使西安，不顾休息，昼夜工作，协调各方关系，在和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后，终于使蒋介石答应兑现六项诺言：“①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②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商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③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④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⑤立即召开国民党会。⑥联俄联英美。”^③迫于形势，蒋在临上飞机前还对杨虎城说：“我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你们的错误你们承认”，“我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不成其你们的领袖。”^④

为恢复蒋的威信，使他好见人，好做事，好领导全国抗日，并看着他一一落实在西安答应的各项条件和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嚣张气焰，向世人表示其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张学良不听杨虎城的劝告和部属的反对，也未告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就毅

^{①②④}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1221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然送蒋返宁，当周恩来追至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因此留下终生遗憾。

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经审张、判张、赦张后，又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长期囚禁。因此引起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愤怒，其内部在救张问题上发生和、战之争，以致在东北军内部发生一部分盲动主义分子枪杀爱国将领王以哲事件。又是周恩来甘冒袒护的嫌疑，让刘鼎将制造杀王事件的首要分子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送到云阳镇红军驻地，才避免了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蔓延。与此同时，他立即代表中共中央到王以哲家中进行吊唁。

张学良身陷囹圄，周恩来与有关人士竭力营救。1937年1月10日，周亲自写信给张学良，指出：“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体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①是年2月13日，张学良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②是月17日，张学良还致函周恩来：“柱国兄来说，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持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仁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仁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同仁致敬意。”^③可见他

①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新论》第765—768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② ③ 《张学良大事年表》第389页，台湾1996年出版。

身处虎穴，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忘朋友，其思想境界何等高尚！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对他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见本书第1—2、5—6页）。

就在张学良发出上信的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严正指出：“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人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未承召谈，只因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以俟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已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①

是年6月20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八·一三事变’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由南京撤退武汉。周恩来通过刘澜波等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领导人与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和东北各界人士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代表中共中央继续积极努力营救张学良。”^②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电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赫尔利，正式提出国共恢复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及其他爱国被囚人士。”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报告时，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一事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上，周恩来当面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

①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65—766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②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66—769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同年12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再次呼吁：“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予正当地裁判。”“在纪念‘双十二’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①

是年4月28日，周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与重庆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上，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曾与张学良有深厚关系的王卓然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个在息峰钓了10年鱼的人，他这10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②……这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难过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花。

是年9月，周恩来对美国记者孛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他不无遗憾地说：“12月25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没想到去南京后从此被囚。”^③

1956年12月，东北人士在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高度赞扬张、杨两将军：“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汉卿将来能挽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他是名垂千古的了”^④。

1960年，周恩来托友人到台湾巧妙地转交张将军一纸条，上书：“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⑤张看后

①②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65-766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③④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66-769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⑤ 《我拜见了张学良》，刊于1998年7月1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

心照不宣。

“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周恩来重新回顾事变，追忆了他与张、杨的友谊，赞扬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义举，对至今仍未全面恢复自由的张学良表达深深的怀念。张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恩来也忍不住流下热泪。他说：‘我的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扣留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①

1966年，中央中央本拟隆重举行纪念西安事变30周年活动，因爆发“文革”而未能办成。多少年来，周恩来和全国人民都一直在怀念、时刻在关心着张学良，感念他和杨虎城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特殊贡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周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②对张的亲朋故旧，周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解决京津两地张的亲属的生计问题，他特指定由张的部下于学忠办理，将西城区张家的所有的顾承王府（今全国政协所在地）作价买下来，把房款存入银行，以待张家弟兄随时支取（惟有张学思夫妇表示不要）。

1974年9月29日，周恩来就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事，致信王洪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在吕正操同志已经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因此有必要增加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③

①②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383—1384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975年9月，周恩来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严重。此时此刻，他还关注着在台的张学良。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

三、党和人民想将军，期盼将军归故里

现在参加过国共两党和谈的主要人物大都作古，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这位千古功臣。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亲切地接见了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的一家，表示希望张将军回大陆看看。同年召开“双十二”54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出席，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西安事变的伟大功绩，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都很关心张将军的健康，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邓颖超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期间，中央又委托她主管与张学良的联络工作。

是年5月30日，邓颖超致电张学良，对他90寿辰表示祝贺：“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忧，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民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而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

首，以慰故人之思耳！问候你的夫人赵女士好。”^①

几十年来，张学良放逐林下，栖隐山间，远离政治，与世隔绝，年复一年。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遥对明月，寄诉思念之情，悠悠之口仍在谈论他，报章杂志仍在追踪他，电影、电视仍在再现他，历史学家仍在研究、探讨他；他当年寓居的公馆，已修葺一新，大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参观学习。全国人民热切盼望张将军能早日返回故里，东北的父老乡亲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跟张将军再见上一面。

1991年，吕正操赴美与张将军会面，希望张在方便的时候回大陆老家走一走看一看，并转交邓颖超给张将军的信件。张对吕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你替我问候邓女士。不久他亲自给邓颖超写信，其中写道：“寄居台湾，翘首云天，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②他还关切地询问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中共新老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提到杨尚昆主席在亚运会期间接见张学森一家，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给他送画，要吕代为转达谢意。并表示如有机会回大陆，一定去拜访“中枢诸公。”

1996年12月12日，江泽民主席在西安事变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西安事变是件大事，在中华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它，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为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集中体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努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的抗战高潮，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

^①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第1422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 《吕正操重会张学良》。

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① 他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海峡两岸、海内外一切爱国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给予张、杨两将军高度评价。

张学良也时常思念老朋友周恩来。1996年，当记者请他对国共两党当年历史作简要回顾时，他说：“当年的‘剿共’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人心在共产党一边，所以才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当记者问他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他答道：“是周恩来。”当得知邓颖超病危时，曾表示希望能和张将军再见一面时，感叹地说：“没能再见周恩来先生和夫人，这也是我的终生遗憾。”^② 可见他（她）们之间友谊之深厚。也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一直在怀念、关心这位千古功臣，而张学良也始终不忘他付出巨大代价而交的这些朋友。

① 199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

② 张友坤：《我拜见了张学良》，刊于1998年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

张学良与吕正操



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和抗日名将吕正操，关系密切，情深袍泽。吕正操从入伍东北军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的部下任职。“雁荡奇突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安谈和安天下，羸里课易求大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①这是吕正操1984年12月游览浙江奉化雪窦寺，触景生情写下的“浙东纪行”诗，充分表达了他对张学良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所建不朽历史功勋的赞誉和对张学良的深切思念。

张学良与吕正操都是辽宁海城人。1901年6月3日，张学良生在逃难中的马车上，养育在海城桑林子詹家窝铺（现属台安市），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1905年1月，吕正操生于海城唐王山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们虽然出身

^① 当年张学良被囚禁奉化雪窦寺时，手植四楠，现余两株，枝叶茂盛，称为“双楠”。它们也在盼望张将军归来；羸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安阳南郊，曾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讲易经的地方。张学良字汉卿，故称汉公。

不同，地位悬殊，经历各异，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的掠夺和蹂躏，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皇姑屯遇难身亡，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九一八事变使张与吕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张学良19岁入东北新办讲武堂（一期）学习炮兵。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鸿图大志。对其父张作霖热衷于军阀混战不感兴趣。打了胜仗，他不以为喜；打了败仗，他也不以为忧。张作霖在世时，他即着手整军经武，重视经济建设，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他自幼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外，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广招人才，尤其注重培养、提拔青年一代。他不受党派、地域、出身、年龄的限制，只要有文化有才能的人，都收留重用。吕正操就是他培养、提拔青年军官中的一个。

吕正操自幼就萌生了长大当兵打日本的念头，他原名正超，后来自己把“超”改为“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正是怀着这样的爱国之志，他17岁（1922年）就说服家人，入伍到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同年考取文书资格，在旅部副官处当上士。不到两年，一个偶然的机，张学良看到吕正操的字写得不错，又是同乡，便推荐他考取东北新办讲武堂（五期）。1925年吕正操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是年，进步军官郭松龄倒戈受挫，吕正操对郭氏夫妇同遭惨死，很伤心，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当时张学良让他任新兵营长，他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他回锦州、分配他担任张学良的少校副官。1926年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迁往北京，进驻光明殿。吕正操也随之到了北京。1927年上半年，军团部进到郑州，先是和吴佩孚退下来的军队作战，以后又和张发奎军作战；下半年和冯玉

祥、阎锡山军队作战。这时吕正操改任少校秘书，并兼任宣传队长。

1928年初，张学良派吕正操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干事（该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是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娱乐的地方）。他在此任期间，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看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书，似懂非懂，思想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的一些人，有的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们回国后也给吕正操讲一些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还对他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带兵？”这对吕正操启发很大，他一再向张学良请求下部队去。张虽然批评他年轻浮躁，但还是把他派到16旅任中校参谋处长，时为1929年。

1930年冬，16旅入关，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年，第二年移驻北平南苑（此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撤到关内，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他的嫡系部队发百分之百，对东北军先是二八，而后三七，待遇很不平等，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上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江桥一战，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东北军震动很大。

1932年冬，16旅奉命开赴热河。热河失守，张学良十分焦虑。1933年3月上旬，张学良电召吕正操连夜赶赴北平。吕骑马赶到北戴河，次日早晨上火车，下午晚饭时抵北平，住花园饭店，立即打电话给张的侍卫官谭海，请报告张学良，约定时间去见。吕当夜在中南海万字廊见到张学良。张询问前线情况，说：“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吕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

后方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听后当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令吕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徵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还说，他要去见蒋介石请命抗日……吕很高兴，以为这次可能打出关去。同时张委任吕回去接任 647 团团长。不料次日下午，吕还未及登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代蒋受过，出洋考察。当晚吕正操乘火车赶回部队，向缪徵流报告会见张学良的情况以及他的指示。但是，关于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命令也就无从传达和执行了。

吕正操接任 647 团团长时，16 旅已改番号为 116 师。部队随即开赴唐山稻地镇，略作休整，即奉何应钦令移防河北易县一带。647 团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强迫东北军撤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

热衷于内战的蒋介石为调动东北军“剿共”，召张学良回国。1934 年 1 月，张海外归来，任“豫鄂皖剿匪代总司令”。8 月，吕正操在武汉见到张学良时，张表示对“剿共”没有信心，慨叹抗日遥遥无期。1935 年秋，张又被调到西北“剿共”。不到三个月，近三个师的精锐部队相继被歼，不但得不到补充，反而被蒋介石取消了番号，张对内战中损耗的国力，深感痛心。东北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收复失地，不愿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张曾感慨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1936 年 8 月，本来张学良因提升 116 师师长缪徵流为 57 军军长，原拟委任吕正操接任 116 师师长。万福麟反对吕升任师长，就和缪徵流背着张学良，把吕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徵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吕入学，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 116 师师长。吕正操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他。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刊载：“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吕

正操回部队，吕9月回到北平，和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先锋队，作为东北抗日联合会组织之一，推吕为总队长。10月张学良调吕到西安张公馆作内勤工作，住东楼。在西安时，张学良有时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曾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消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兄弟。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送蒋返宁后，吕正操预感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与少壮派军官争权夺利，混乱局面难以收拾，考虑到647团的政治情况，掌握这支部队还是有把握的。是年12月31日，乘飞机到郑州，转火车回到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随后中共地下党通知吕正操，同意他入党。吕根据北方局指示，服从万福麟和刘元勋拆散647团的改编命令，而不公开对抗。5月初，吕带一个营到石家庄和119师645团的两个营合编为130师691团。5月4日晚上，在一个帐篷里，地下党李晓初代表党为吕正操举行了入党仪式。七七事变后，691团受党指示，挺进敌后，创建人民自卫军，部队迅速扩大，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为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立下赫赫战功。

张学良送蒋被扣，失去自由，其爱国思想始终不渝。1990年6月，他在为其举办的九秩大寿庆祝会上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此前，他书寄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谒延平祠旧作，书寄

正操学弟正

九十老人毅庵书”

吕正操于6月1日给张学良发去贺电：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嘏：

“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一行五人飞向大洋彼岸，先到旧金山拜会了张将军的夫人赵一荻女士，其时张学良已去纽约。5月26日吕又飞往纽约，5月29日上午，吕到张学良住地贝祖贻的太太家会见张学良。吕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将军站在公寓门口等候，一身西服，穿着整齐，用不着介绍，张一眼就认出了吕，老远伸出手。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沉思片刻，互致问候，即进屋落座。吕送上从北京带去的贺礼：一整套张将军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一幅国内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将军赶画的肖像和一幅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手书的贺幛，书录的是张将军1990年写的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的视力较差，他掏出一个类似水晶球大小的放大镜，认真仔细地鉴赏启功先生的墨宝。两位老将军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谈笑风生，畅叙久别重逢之情。张幽默地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吕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笑着说：“你叫地老鼠。”吕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

湾。”张插话：“得民者昌！”吕接着说：“那还是靠人民群众。”

5月30日，张与吕二次见面，这是他们二人的单独谈话，吕首先向张将军郑重地递交了邓颖超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对张的问候。在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委托，诚恳欢迎张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回家乡看一看。当时张没有使用放大镜，脸几乎贴到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看着。看到末尾邓颖超签名时，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沉思片刻又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他表示要写回信。不久，他给邓颖超亲自复信，其中写道：“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国土。”并引用“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两句诗来表达他既想回家看看，又不愿过分张扬的愿望。

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晚上，旅美华侨先后两次为张将军举行祝寿宴会。吕送的贺幛被张学良特别悬挂在6月1日宴会大厅内显眼的地方，正式向外界透露了吕赴美为他祝寿的消息。阎明光（即阎宝航之女，阎明复之姐）代表大陆亲朋故旧出席了寿宴，张悄悄托她转告吕正操希望再见面详谈一次。于是吕邀张于6月4日下午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张在阎明光、张闾蘅的陪同下来到别墅，给吕带了一包台湾产的凤梨酥。此次谈话范围甚广，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政治，经济到人物及海峡两岸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张将军一一道来，而且有独特见解。谈话中张将军尤为关心祖国统一问题。他说：“我看，大陆与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吕给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张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并询问大陆为什么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吕说，这主要是对付外国干涉和台

独分子。一旦台湾在外国支持下搞独立，中国共产党不能坐视不管。若放弃使用武力，岂不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给外来势力、台独分子以可乘之机。当说到“二二八”事件时，张学良说：“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不是人干的事都干出来了，硬是把人民逼反了。他们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以我看，要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就完蛋了。搞什么台独？最好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对台湾独立，日本右翼势力是支持的，不可忽视；我明白了你说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意思，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

张、吕此次会晤距九·一八60周年仅两个多月，为纪念此一事件，张应邀题写了“历史伤痕，痛苦回忆。”由吕转交辽宁人民出版社，已刊载《“九·一八”事变丛书》上。

张将军与吕正操西安事变后的联系始于1984年6月。传递他们之间信息的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之女张闾蘅（全国政协委员），她从香港到北京作生意，受其伯父张学良之托，特地看望吕正操，并介绍了张在台湾的生活状况，并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到大陆经商，一次聊天时跟我讲，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十分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让我有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

张闾蘅回港时，吕托她带给张一副健身球和几听上好的新茶，以示问候和挂念。之后，张闾蘅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为张、吕传递信息。由此，他们之间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

1987年初，张闾蘅带来张学良赠吕正操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张学良摘自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的第三联和第五联，集成一诗，抒

写他晚年久居林下、不慕荣利、甘于淡泊、寄情山水的闲适恬淡的心境。吕正操也以同样的集句方式，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第二联和第四联，集成一诗，回赠给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何待。”末句将原诗“良辰詎可待”的“詎”改为“知”，反其义而用之，希望他振奋精神，焕发青春，相信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后来吕又书录 1984 年冬的旧作《浙东纪行》赠张。诗中有“思君常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之句，表示期待张早日归来，旧地重游。并在致张的书信中多次希望他“走出台湾小天地”，“回家乡看看。”目前张将军已经走出了小天地，在世界旅游胜地夏威夷安度晚年。每年都有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社团及亲属、部属为他祝寿，可见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特殊贡献，炎黄子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张学良是降生在大马车上，

『小六子』是他的爱称

①



张学良为什么叫“小六子”，很多人并不清楚，是因为排行老六吗？不是。是因特别聪明而称“鬼子六”吗？也不是。它是因为张作霖当年闯荡江湖时，有一次逢凶化吉，喜得长子，双喜临门，就给长子起名“双喜”，经批八字，为克忌讳，才改名“小六子”。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军溃散，辽河一带的散兵纷纷携械为匪。一些草莽流寇更是趁机而动，有的组织大团自称保护乡里，有的建立保险队啸聚山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互相厮杀，搞得地方天无宁日。如海城一带的冯麟阁，青麻坎的杜立山，姜家屯的洪辅臣，北镇一带的金寿山，赵家庙一带的张作霖和八角台的张景惠等，他们各霸一方。

1900年，张作霖在镇安县（今黑山县）赵家庙，拉起一支保险队，窜到北镇的中安堡，妄想独霸一方。当地不可一世的金寿山，被气得暴跳如雷。想打吧，怕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不打吧，干

① 根据张学良的一次谈话，参照《张学良与台安》（台安县张学良出生地纪念馆编，1990年印），撰写此文。

吃眼前亏。他再三考虑，暗生一计，派其儿子带领几个侦探，假降张作霖，被张收留。

是年腊月二十三，金寿山的几名侦探，名为请假回乡过年，实为向金寿山报告张作霖大团正在杀猪宰羊准备过年的情况，并建议金寿山乘其不备，把张作霖来个连窝端。金知此情后，就勾结驻扎附近的一连沙俄骑兵，配合他的“花膀子队”，于除夕星夜疾驰中安堡，团团包围张的住宅，喊声大震，枪声四起，外攻内应，张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他拼命从镇南打开一个缺口，带着眷属和残部，手持双枪边打边突，宋老凤背着张的女儿首芳（名冠英），汤玉麟背着已怀孕四个多月的赵氏，孙大虎背着新过门的卢氏，由张掩护，狼狈冲出中安堡。后来在用大马车将家眷运往詹家窝堡赵明德（张妻之堂侄）家中的途中，一个婴儿降生在大马车上，在詹家窝堡养育，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学良，时为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张作霖几经波折，到了八角台附近，要和当地的张景惠联系。八角台这个新民厅（翌年改厅为府）所辖的小古镇，虽然人口不多，但由于它位于盛京（今沈阳）与关内的要道，明清时代就有商贾行人经常过往此地。为“保境安民”，镇上也组织了保除队，其头目张景惠与张作霖早有结交。张作霖随机应变，在镇上有权有势的岁贡张子云的支持下，和张景惠联合起来办团练，成为头领。他丢了中安堡，得了八角台，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的势力大增，引起附近大小首匪的嫉妒。他们想方设法找张的麻烦。其中闹得最凶的是匪首项昭子，经常活动于镇安和八角台之间，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听说张景惠把团练长的职务让给了张作霖，又恼又恨，又眼红。他绞尽脑汁要把张作霖挤走，好当八角台的草头王。为了制服项昭子，确保八角台安全，张子云、张作霖、张景惠经过一番计议，决定：一是实行按地抽饷，补充团丁费用；二是串连附近会首，加强联合；三是采用官府军规进行团丁训

练。在汤二虎的认真操练下，八角台的团丁个个都成为训练有素的武士，附近的大小匪股莫不闻风丧胆，望而生畏。项昭子退三眼，不敢染指八角台。张作霖在八角台得知妻子生了男孩的喜讯，非常高兴。张景惠和陶元恭等人纷纷前来道喜，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人生之喜莫过于立子呀！”张乘兴对诸位说：“领谢大家的吉言，请诸位分神给孩子起个名字。”听过张的请求，有的踱步深思，有的低头冥想。一位叫陶历卿的师爷（文牒）抢先说：“团长升官得子可谓双喜临门，那么小少爷何不可以‘双喜’为名？”大家不约而同地称赞：“太贴切了，太贴切了！”

双喜满月不久，赵氏从詹家窝堡迁到了八角台。一个偶然的机，张作霖从街上叫来一位瞎术士，让其给长子批批“八字”。术士一听请他算命的人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心想“八字”批好了定能得到重赏，批不好定要招来麻烦。当张作霖夫妇报过长子的生辰后，算命瞎子装模作样，屈指念念有词：“少爷本是辛丑年癸巳月癸丑日壬子时降生，孩子大福大贵，但命硬克父母。”张作霖喜中生忧，拜求算命先生，求其解法，以免灾难降临。算卦者说：“要想解除忌讳，少爷的名字必须得庙上赐给，先许愿，还愿时，将孩子的头发剃成光圈并拍打他跳越板凳，跑出庙门至大街上，此时有喊什么名字的，就作为他的乳名。”当时头一个听到有人喊小六子，所以张学良就改乳名双喜为“小六子”。这样似乎张学良就变了另一个人，可免克父母之灾。数十年后张学良讲起这一趣事时说：“当时若有人喊王八蛋，我就是王八蛋了”。

说也凑巧，张学良 11 岁失去母亲，28 岁又丧父，这是历史的巧合，并非算卦者高明。另外，张作霖 1928 年 6 月 4 日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暗算身亡，正是农历四月十七日，恰与张学良的农历生日是同一天，被张视为忌日。他从不在这一天过生日，因为过生日，他一想起父亲就特别难过。后来他对记者讲，他与他父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张学良是靠喝高粱米汤养大的

①

1901年6月3日在逃难中生在马车上的张学良，据说由于大车的晃荡，他头盖骨的一些连接缝一直没有长好。当时张作霖还未发迹，家境还不富裕，因为其妻没有奶水，孩子只能靠奶妈供养，一块银元雇了一位45岁的奶妈，你想奶能好吗？1986年张学良在跟晚辈谈及此事时说：“在娘胎里上帝就造就了我，他们都没能想到我还能活着。我过去身体很不好，有个大夫说，我的身体很坏。我是靠喝米汤活着，不是你们今天喝的大米汤，而是高粱米汤，后来再大一点，由大人把高粱米嚼碎喂我吃，就这么活着。活到一岁多，那时我们家还穷得很，雇了一个奶妈子，她对我很好，后来我一直养着她。因为生活太苦，我五六岁时，连话都说不清楚，我舌头短啊，不好使，小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说话了。你爷爷到外边去做事，把你奶奶扔在家。她不回娘家。本来我外爷家多少富裕一点，是个小地主，可

① 此文是张学良1986年一次谈话记录中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饭吃啊，睡的床也没有，奉天那里都是睡炕，没有席，在泥巴上睡觉。我妈常让我看她的腿，就是这个地方（张比划着自己的腿部）都磨成了臃肿，你们知道吗？这是怎么来的，这是睡炕睡出来的。我爸爸常告诉我，你可不能对你舅妈不好，没有你舅妈，就没有你。那时我妈没有饭吃啊，有时几天都吃不上饭，是我舅妈从她们家里偷点米送给我妈吃，我原来不喜欢我舅妈，所以我爸爸才经常提醒我不要忘记恩。鉴于此，我舅妈死后，舅妈一家都是我养活的。那时穷啊，你爷爷冬天穿个大褂，还装漂亮。……”由此可见，张学良的幼年是在社会动荡不安、家境穷困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一客观事实给他幼小稚嫩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烙印，对他后来的成长和爱国爱民思想的萌生，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伯苓给张学良以希望



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受的是家教，不仅有旧文化的功底，而且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曾对其侄辈们说：“我十五六岁时，简直是个爱国狂；不光我个人，那时很多青年都爱国啊！为什么？当时我们东三省让日本欺侮的够呛，日本向袁世凯提出 21 条，要灭亡中国，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要当亡国奴啊，中国要灭亡，东三省要完蛋了，要被日本吞去，我心里很难过，我身体不好，都吐血了，那时候你爷爷有个医务处长，他是个基督徒，他跟我很好，他劝我说：‘你不要灰心（可我觉得国家到了如此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可以出去散散心，我给你一张票，去听听讲演。’那时我还不不懂这玩艺儿，没有这个时髦。当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请张伯苓讲演，票上注明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有我》，这就打动了我的心。中国将来的希望会是什么？我正为这一问题彷徨呢，我要去听听。那时我十五六岁第一次出去，要是与张伯苓熟悉，当时非跟他干起来

不可。年轻时我冲得很。张伯苓开头就说：简言之，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我真想站起来问他，你算什么东西。可他慢慢地讲，说人哪，一般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负责中国的事，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唉！我一听，这个是好样的，说得很有道理。是他头一个给我以希望。从此我与基督教青年会开始有了来往，并立誓报国、救国。”^①由此可见，张伯苓的讲话对张学良有着多么大的影响，他与张伯苓的接触从此开始，连续不断。

1928年，张伯苓为教育国民认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成立南开东北研究会。派该会负责人专程去见张学良，聘他为该会名誉董事。张欣然接受，并捐助研究费500银元。是年12月，张在沈阳又会见即将赴欧美考察教育的张伯苓，对其“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殊堪钦佩”，当即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作为学校发展基金。

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对校务实行改革，特别倚重张伯苓，聘他为东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南开校友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张伯苓多次去沈阳为东大的改革和建设出谋划策，还派南开大学秘书长，体育课负责人去东大指导工作。张学良还把南开庶务课主任借调到东大管理后勤工作，于是南开的办学成功经验得以在东大推广。当时报刊上写道：“南开精神由白河之津而展之辽河之滨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同学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张学良承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想方设法收容学生和难民。张伯苓主动为张学良分忧解难，先后接纳78名东大学生免费借读。这对一所私立大学来说，自然是不小的负担。

^① 引自张学良1986年的一次谈话。

张学良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总以师礼事之，并以张伯苓私淑弟子自居。1936年4月9日，张与周恩来在延安的一座教堂会面时，就曾对周恩来说：“我和你同师，我们都是南开人。”

1996年春，纪念张伯苓诞辰120周年时，张学良给这位“启蒙”老师题词“桃李满天下”，以示祝贺。

张学良与于凤至



张学良 15 岁与于凤至（字翔舟）结婚，当时于 18 岁，张称于为大姐。

于的父亲于文斗，吉林省榆树县人，人称八爷，极其富有，名震一方。张作霖早年曾受于八爷破金相救之恩，两人结为金兰。张作霖在东三省发迹后，不忘故交，加之相传于凤至八字极好，是大福大贵命，是“凤命”千金，有“娘娘”之尊，张作霖托人说媒，配长公子张学良为妻。开始不仅张学良不同意，于文斗也不赞成，他常常当面评论张作霖所干的事情，张则一笑了之，并不怪罪，他们关系之好可见一斑。由于张作霖的强求，终成婚配。结婚时，于家怕张家小看，陪送的是两座银行，一处 在沈阳，一处 在锦州，分别叫富裕祥和庆泰祥，资财总计约有 500 万元之巨。

除随于凤至嫁到张家的佣人外，还有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专事管理妆奁财产的庶务股。这些财产大部分在奉天用于实业投资，奉天的服装公司和几个大字号就是于凤至的私产，奉天边业银行有于凤至的一半股份，这些财产直到九·

一八之前，都是很兴旺的。

于凤至知书达理，人品端庄淑慧，命相之术不可相信，但是于的贤德，确实给张学良带来了不少福气。他们婚后相处很好，生有一女三子，名闻瑛、闻珣、闻珩、闻琪。张学良对他们施以全面教育，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吸收西方的文明。大儿子曾在英国读大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返宁，他从街上买的《大公报》上获此信息，他说：“完了，我爸爸送到老虎口去了。”他催妈妈尽快回国照顾爸爸时说：“你别管我们，我们都大了，您就照顾好我爸爸就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急，患了精神病，以后送回了台湾，也死了。第三子于1926年因患肺炎不幸夭折于奉天小河沿医院。由于四个孩子出生时间相隔太近，张作霖怕影响于的身体健康，不让她继续生育，便有意让她学抽大烟，据说这样可以使女子绝育。于从此染上烟瘾，后来又发展到注射毒品。1927年在协和医院做过子宫切除手术。1933年才彻底戒除毒瘾。

于凤至豁达大度，极有修养，当她知道张学良与赵一荻的事情后，同意赵给张当秘书住北陵，在那上大学。赵生闻琳后，于将赵接到家中，以姐妹相称，处得很好，于给张管家，赵在政治上给张以协助。张学良幽居期间，于、赵先是轮流陪护，后又同时陪护，直到1940年于凤至因劳累过度赴美就医，赵狠心将小闻琳改名后送往美国，请一位朋友抚养，只身前往修文县阳明洞陪伴张学良。

1961年，张学良的女儿张闻瑛和丈夫陶鹏飞教授应邀赴台讲学，他们奉母命，到台后要求探望长期阔别的父亲，几经周折，终获“会见一小时”的特许。父女见面，异常悲伤，女儿抢前两步扑倒在爸爸跟前，凄惨地喊了一声“爸爸”。张学良的心啊，就像电流触动了一样，他老泪纵横，哽咽无语，双手拉住女儿、女婿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女儿从身上取出于凤至的近

照时，张学良勾动了满腹愁肠。二十一载没有见面了，回忆凤至大姐陪伴自己辗转于奉化、黄山、萍乡、郴州、沅陵和贵州，过着幽居生活时，这一幕幕往事在脑子里翻腾。1940年她在狱中积郁成疾，不幸患了乳癌，赴美就医，由赵一荻接替伴狱。从此一别，就是二十余个春秋。

张学良与女儿、女婿，从谈学《明史》到读《圣经》，并说：“我如今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基督徒！”这时，他用一只颤抖的手从内衣袋中掏出了一封信来，郑重地交给女儿时说：“现在牧师还不肯为这个虔诚的教徒洗礼啊！这是因为基督教徒在洗礼的时候，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因此请你们把这封信，交给你妈妈，请她帮我下这个决心吧！”大女儿返美后，一直瞒着妈妈，没有勇气把那封不平常的信交给妈妈。两年后的一天，居住在旧金山郊区小镇的于凤至忽然盯住女儿问：“你和鹏飞从台北回来……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你爸爸真的没有信给我？”大女儿顿时紧张起来，不得已才把从台北带回的那封信交到妈妈手中。于凤至看到了丈夫两年前写的那封亲笔信，顿时觉得晴天霹雳，泪如雨下，往事历历，百感交集。但她终于逃出了原有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仗义舍情的决定：“汉卿，只要你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做的！”“赵一荻是位很难得的女子啊，这些年她代我陪伴你，在牢里吃了千辛万苦，她现在理当得到法律的承认了。”

1964年，张学良在台湾与赵一荻正式结婚，堪称冰雪爱情，世人楷模。无论是过去在政治上辅助张学良处理公事，或是在二十多年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与世隔绝，历尽艰辛，道德情操确为世人钦佩，实属难得。

于凤至1991年在美国病故，在坟上竖有小碑一块，按她遗嘱，将当年张学良写给她的小诗刻于上面：“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是为学医才走上从军之路

①



张学良自幼天资聪颖、活泼、顽皮。他的老师对张作霖说过，你的孩子顽皮得不能要了，可见他顽皮的程度。即使这样张作霖还特别喜欢张学良，从多方面加以培养，望子成龙，继承父业。张学良 17 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其老师亦是张作霖的老师，算是张的师爷，但是思想特别守旧。有次给张出作文题竟是“民国之害甚于帝制”。张学良写的题目与之完全相反，是说“帝制之害甚于民国”。致使老师愤怒罢教，因此遭到其父的责罚，被袁金铠劝住。袁对张作霖说：“你没看到他写些什么，先拿来看看再说嘛。”袁看后说：“没有什么错嘛。”张作霖乃另聘名师教张。

张学良说过，他从小就是爱国狂，也是一个爱人狂。自从听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奉天基督教教育年会的演讲《中国之希望有我》后，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救国先救人，救

① 此文是张学良 1986 年某次谈话的一部分。

人必学医，以洗“东亚病夫之辱”。当年奉天有个南满医科大学，张的一个朋友在那里读书，他经常去那里玩，所以对南满医科大学特别熟悉，很想到那里读医学，张作霖不同意，也不明说。他愿儿子学军，也不明说。张学良无奈，跟自己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了自己的心思，想到美国学医，这位朋友特别支持他，说，你到美国后，我给你介绍到一个信教的家庭，你住在他们那，每天给人家擦擦玻璃，扫扫地，人家会免掉你的房租，并会从多方支持你。

张学良要出国，需要学好英文，也需学好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张学良与陈英很熟，此人是德国留学生，担任过奉天测量局局长和测量学校校长。他教张学数、理、化。为到美国学医，张学良借了70美元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打算偷偷跑到美国去，与父亲不辞而别。陈英知道后，对张说：“你是傻乎乎的，太不懂事了。干吗要与你爸爸作对啊。他那么喜欢你，你若偷偷跑了，他会难过的，为什么要这样伤他的心啊！你为啥不顺着他呢？”张说：“我要学医，他不让我学，偏要我学军，我不愿干那种玩艺。”陈说：“你就对他说，我愿学军，他肯定高兴。你说到美国学军，他会更高兴。你到了美国，愿学啥就学啥，他还管得着你呀！”张学良果然醒悟，唉呀！这个办法好，于是，一次当着五夫人的面，他向其父表示，愿意学军。张作霖一听，心中喜悦，但又觉得奇怪，对五夫人说：“小六子怎么主动提出学军？算了吧，他这么自由散漫，不服管教，进了军校干几天不干了，给我丢人，我可怎么办？”张学良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对其父说：“如果人家都干不了，那我也干不了，不算什么。如果人家都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请你放心，我一定干好！”张作霖兴奋地说：“那好，由你五妈作保，如果你能坚持到毕业，不出校我就让你当营长！”

张先考保定军校，因考期已过，为了张学良与其他四位朋友

学军，特加考一场。他们是由段芝贵保荐的。也因家庭出身特殊，四个人竟敢相互对抄，其中的四道数学题，谁都不会，主考官一看急了，拿出去找人代写，结果四人都名列前茅。但实际并未去保定军校，改入新办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张学良学炮科。

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业特好，三个月考了三个第一，期末又考第一，于是引起轰动，大家认为他是张作霖之子，肯定与出题老师有勾结，事先知道了试题内容。为此，时任讲武堂教育长的熙恰，有一天突然到张学良的那个教室，让学生们对调座位，彼此分开，当堂出了四道题，（其中一题是张学良没有学过的）重新考试。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都答完了。熙恰当场宣布：“你们看，你们谁都没有答全，只有张学良答全了。这说明他没有作弊。”从此，张学良在讲武堂，大有名气。师生对他过去考第一的真实性不再怀疑了。鉴于这些，张作霖兑现当初诺言，没毕业，就让张学良当上了少校队长。张学良后来说过：“我考的好，并非有特殊本事，而是因为当时学员绝大多数都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相比之下，我受的教育要比他们多得多。”

其实张学良的记忆力，确实非同一般。在讲武堂时，他对同班姓陈的同学说：“咱们全体同级生的姓名、字、籍贯，我都知道。”陈说：“我不信。”张说：“不信，你问问看。”于是，陈将自己知道的一一问张。张全答对了。300多名讲武堂同级生的姓名、字、籍贯，他居然全都知道。

另外，张在卫队旅当团长时，其部下的赵营长年龄特大，当年他常抱张学良玩，还摸过张的小××。总逗张，表面上服从张的命令，背地里也说过张小时候的事，仍认为张是小孩。张对赵的所作所为很生气。夏天军训时，张站在操场上严肃地说：“赵营长，我可要告诉你，你要再说过去那些事，嘻皮笑脸地逗我，我就要罚你，现在我是你的团长，必须真正服从命令听指挥，否则，决不客气！”（数十年后张对晚辈谈起赵时，他说，赵营长可

是个好人，在战争中牺牲了，直到现在我还很思念他)

张学良就是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优秀的军人品质和战争中的功绩，加之特殊的出身地位，19岁当团长，20岁任少将旅长，25岁任中将师长，28岁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0年荣升中华民国陆海空副司令，1934年授陆军一级上将，可谓青云直上，声威显赫。

1990年，张学良在与记者谈及学军一事时说：“我父亲希望我能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成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我做梦都没想到当军人。现在说起来是个笑话，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成了杀人的军人。”

张学良与郭松龄在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崭露头角



郭松龄 1883 年生于盛京（今沈阳）东部渔樵寨村，祖籍山西汾阳县。郭自幼喜欢读书，手不释卷。日俄战争后，他耳闻目睹日俄在东北的野蛮侵略暴行，萌发了“驱敌寇，复国土”的念头，投笔从戎，决心救国。1905 年秋郭在奉天陆军小学堂念书，第二年因成绩优异被选入奉天陆军将弁学堂速成学堂学习。1907 年又被选进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受到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擢升卫队哨官，倚为亲兵。1909 年，郭随朱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后经方声涛、叶荃两人介绍参加新军同盟会。1913 年秋，郭考进北京中国陆军大学，编入深造班第三期学习。1916 年毕业后调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 年 8 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与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抗衡。郭受南方革命形势的感召，只身南下投奔军政府，通过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介绍，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曾亲赴广州拜谒孙中山，向孙献策说：

“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深韪其言。”1919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避居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彻底失败。郭从此失去依靠，于当年秋返回奉天，立志开创新局面。

郭松龄回奉天后，对张作霖向日本借款，购买军火，扩编军队，割据东北，问鼎中原的野心不满，始终有改革奉天之志，决计加入奉军，暗取兵权，潜蓄实力，以图根本改造。他由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是郭在陆大时的同期同学）地推荐，充任督军署中校参谋。1919年2月，郭被张作霖聘为东三省新办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当时恰逢张学良在讲武堂炮科学习。郭看张是一位颇具爱国思想和有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的有用之材，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与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天之夙愿。张学良有感于郭的至诚态度，并见郭工作严肃认真，具有丰富知识，遂有罗为己用之意。1920年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后，推荐郭任参谋长，兼任第二团团长。从此专心训练军队，进行军事教育，整顿军队纪律。不到一年，卫队旅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奉军中一支劲旅。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染指中原，借调停之名率兵入关。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之力击溃皖军两旅之众。战后，郭随张学良到佳木斯一带消除匪患，迅速安定了地方。因此，郭在奉军中名声鹊起，不但为张学良器重，而且也取得张作霖的信任，地位日臻巩固。1921年5月，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乘机将奉军扩编为10个混成旅。改任张学良为第三旅旅长，提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合称三、八旅，成立联合司令部。因为张学良常在总司令部参与决策，部队行政、训练均由郭实际负责。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当时，奉军总司令是张作霖，副司令孙烈臣、许兰洲，参谋长杨宇霆。东路军总司令张作霖兼任，驻军粮城；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驻永清；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驻信安镇；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驻马厂。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驻长辛店；第二梯队司令邹芬兼，驻西苑；第三梯队司令郑荣廷，驻通州。

战争一开始，张学良自以为自己是讲武堂毕业，门门课程考第一，雄心勃勃，满不在乎，谁的话也不听。他的梯队，除他和郭的三、八旅外，另有蔡平本的第四旅。张学良指挥第二梯队在天津以南的马厂一带与直军作战。他把三、八旅摆在两边，让第四旅在战争打响后，迂回到敌人后面，等敌人一来，将对方包围起来歼灭之。张把部队从正面展开，而敌人也从正面展开，黑鸦鸦一片全是部队，张有些奇怪。第四旅报告，已到目的地。可是第八旅正面碰上了敌人的主力（是预先埋伏好了），一举击退了第八旅，局面万分危急，这时恰逢奉军将领韩麟春到前线看张，张见到韩就哭了。韩问张该怎么办，并鼓励张要下决心顶住。张说，我没有决心反击了，但决不再退。还说，即使曹锟把我俘虏了，我也不至于丧命，因为他是我的“三大爷”^①。韩说，我建议你两个旅长调回来，开个会，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张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只是把第三旅拉开，调一个团正面展开，还有第八旅交郭松龄指挥，这一团一展开，带第三团到正面，总兵力大约6000人，这一团不过2000人，是张学良任团长的那个团，归他指挥，韩麟春替张当梯队长（相当于军长职位），在后面指挥。张带两个人在天黑前，跑到前线去告诉那些当兵的，决不后退。士兵们在战壕里认出他是团长，说团长你跑到这里干什么？张说，现在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线情况极其危急，你们团在正面

^① 直皖战争时，张作霖曾与曹锟合作过，并兄弟相称，故张称曹为三大爷。

担任护卫，假若你们一退，全线崩溃，我们就完蛋了。所以今天我就睡在你们这儿，要死咱们就死在一起。士兵们齐声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赶快回去，只要我们活着，决不会退却，除非我们都被打死了，那没办法。张坚持不走。士兵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并推张赶快走。张说，好，好，我走。可我渴得厉害，还没有喝口水呢。有个士兵说，我们这还有点汤，你喝点快走。张说，你们真幸运，还有汤喝。张喝汤时，士兵们讲，团长你放心，你说到那，我们就做到那，你都舍得命，我们还舍不得命吗？假若我们都死了，那无法子，活着退却就对不起你。张说，对呀！于是撒腿就跑，士兵们送他好远，跑了几百米，张才跑回到原来驻的那个村庄。这一前线鼓劲儿，一下子把战士的士气鼓起来了，拼命与敌厮杀，把敌人打退了。韩麟春高兴地说：“好了，现在没有我的事了。”从此，张与韩麟春也成了好朋友。

张作霖知道前方情况不佳，不仅为奉军担忧，也为儿子担心，特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要他亲译。电报的大概内容是说东路军已经溃败，第一梯队已退却了；张作相打败了，现在只有你孤军深入，就剩你自己了，那你就自个想办法吧。张学良此时决定把郭松龄找来，把军队交给郭，然后到前线把军队团结一下，快去把已经被打败而尚未退下来的张作相救出来。于是到军粮城去见父帅张作霖，父子之情不同一般，张作霖见张学良就说：“唉呀，你可回来了！”学良问“什么事啊！”（当时张作霖正在审问一个报信不准的士兵。士兵对张作霖说，少帅前线落马，不是受伤，而是从马上掉下来的，腿摔伤了，生死不明。）张作霖说：“仗打败了，我不知道你的行踪，是死是活，无从知晓。我特意给中校参谋跪下磕头，请他算上一卦，看你怎么样。”张学良听后十分难过，父子相对，激动万分。张学良说：“爸爸，你怎么这样呢？既然你让我干军人这个行当，就应该豁出去，你不要难过。军队是退下来了，由老郭带着回来了。完整退下来的就只有

我这个部队，还未被人看不起，但是其他部队都被人家打垮了。”

当奉军退至山海关时，与李景林的部队会合。直军追击时，又与奉军交战，奉军大胜，可是直军也未撤退，成为对峙状态，经谈判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张氏父子整军经武，誓报第一次

直奉战争失败之仇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爱子，又是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与郭松龄崭露头角，立下战功，其声望地位在奉军中日渐上升。张作霖为整顿奉军，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兼总监，副监孙烈臣（曾任过吉林省长，是“中央”派到东北去的，也是张作霖的一员大将）；另一副监是姜登选（曾给孙中山当过参事）。张学良任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兼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队长、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监督等要职。但他的真正实际职务仍是第三旅旅长。为培养、锻炼张学良，张作霖有好多事都让张学良去办。每天天刚亮，张学良要到航空处看看，再到北大营走走，然后去拜见其父张大帅。因为是父子关系，当然与别人有所不同。当张大帅还未起床时，他在卧室外面的沙发上坐等，让当差的报告大帅他已来到，问爸爸有没有事，没有事，即回到整理处，办完事即吃中午饭。下午办办事，晚上还要打打麻将，找找女朋友（据说张与于凤至结婚后，

张曾给于题写“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十个字。于故去前曾留下遗嘱，死后要把张题的字刻碑立于坟前)。真是一天够忙乎了。张学良其时地位特殊，实权甚多。可以说对人对事，愿怎么办就怎么办，成为东北地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帅。

1924年9月15日，奉军先发制人，向朝阳，山海关进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奉军当时只有七万多人，仗该怎么打？大家开军事会议时，面面相觑，怕出征后回不来。当时东北军有五个军团：第一军团长姜登选，副军团长韩麟春，驻喜峰口；第二军团长李景林，副军团长张宗昌，驻朝阳；第三军团长张学良；第四军团长郭松龄。临行前，张学良去告别于凤至，在于处住了一夜，他对于说：“你不要说话，不要扰乱我的军心。我是来看看你就是了。”^① 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既然当了军人，就应该准备着死。

在山海关时，第三军团在一边打，第一军团韩麟春带着部队在九门口，结果并没有打进城去，直军很厉害，韩麟春败下阵来。天亮后才把情况搞清楚，周围全是大山。当他们把城攻陷后，郭松龄与韩麟春闹起矛盾来（这是奉军中的士官派与陆大派的矛盾再次“爆发”，他们都受张学良的领导，但彼此矛盾却根深蒂固。张认为郭松龄虽有诸多长处，但是非常小气，缺乏肚量。郭总想让张学良只跟他好，不让张跟别人好）。张决心乘胜前进，而吴佩孚的部队却只守不出，张只好在九门口等着。郭松龄这个军都在山上，白天在九门口都能看见。张学良征得姜登选同意，秘密由山海关抽出八个团，派郭统率加入九门口的部队。郭奉命到达后，要求接替第一线，姜、韩认为郭氏争功，言多讥讽，使郭所率部队充作预备队，郭深感不满，张学良也激于姜、韩二人的攻讦，对郭略有责难。郭氏乃大发脾气，立将部队撤离战线，把带进去的军队又带回来了，甩手不干了。（当时姜登选

^① 引自张学良1986年的一次谈话。

除将这一情况电告张作霖外，并对张学良说：“郭茂辰如此违抗命令，应当军法从事。”）这下可苦了张学良啦。张心想，“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就打电话骂他几句，郭却把电话放下了。万般无奈，张只好夜间骑马走山路去找郭松龄，跑了几十里路，中途遇到后撤的部队。张问：“谁下的命令？”有人答，“是郭旅长。”张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都站着，不准跑。直到天亮，才在一个四合院里找到郭，他正在睡觉。张喊：“起来，起来，起来！”郭讲，“我是你的老师，不能这样。”张说，“可现在我是你的上级（长官）。”郭说，“我给你丢脸了，人家打胜了，我来帮忙，我不干！”“你不干！”张很严肃地说：“那好，今天我是你的长官，你真是不干，你身上带着枪，我没有带武器（说着张学良撩起衣服让郭看），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郭说：“我愿死。”“那好啊，你既然想死，就到前线去死。你到前线打了胜仗，不是可以收回面子吗？万一出了问题，要杀头咱们一起去，出了什么事，我来承担责任。”张学良又向郭松龄开导一番。郭松龄说：“你放心，我说到那做到那。”此时张学良跑了一宿尚未吃饭，连口水也没喝。郭松龄把军队整顿一下，就开回去了，敌人一看，也不晓得来了多人，把敌人吓坏了。郭一发火，有点野性，一下就攻上去了，打了大胜仗，俘虏了两万多人。山海关的铁路已被破坏，别的军队也都退了下来。没有列车，张作相与张学良是坐轨道车进去的。张作相把张学良的眼睛捂住，不让他看到那种到处都是死人的场面。但他还是看到了。他看见一个士兵死后还握着枪，心里十分难过，打败仗实在是太惨了，兵败如山倒啊！张对战争的残酷性身临其境，别有一番感慨。1925年6月，他在与记者谈对沪案^①之意见中曾说：“爱国之心，余自问与各界无异，但处此时局艰难之际，眼光当放远，步骤当严整。国人向痛

^① 指“五卅”爱国运动一事。

垢军阀跋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①可见他参加内战是父命难违。1996年他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堂作“见证”时又说：“在中国不幸的动乱年代，我参加内战不知多少，杀人如麻。”再次表示忏悔。

^①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第16页，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郭松龄反奉，张学良遭骂^①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缴获了几万支步枪，七八百门机关枪、大炮，俘虏了大量官兵。吴佩孚从此一败涂地，彻底垮了。因为打了胜仗，奉军各级将领均应论功行赏，但是并未做到公平。奉军中以杨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为首的陆大派，矛盾由来已久。^②前者势力虽大，资格也老，但是缺乏明确的宗旨，后者具有新思想和民主意识，没有那么多封建属性。因为杨宇霆与郭松龄是死对头，而且在张作霖面前说话很起作用，致使郭松龄这一派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军队出发前，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韩麟春四人歃血为盟，一致表示在战争中都不允许抢地盘。但是首先到达天津的李景林，就赶走了准备当天津市长的一个奉天人，自己当了天津市市

① 史料主要来源于张学良1986年的一次讲话。

② 奉军中有三派：一是老派，又称旧派，以张作霖为首，另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二是新派中的“土”、“洋”派。洋派又称“士官”派，即日本留学回来的，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荫槐等。“土”派又称“陆大”派，是受到张学良支持的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一些人，如郭松龄等。

长。当时张与郭还在火车上。张宗昌到了山东，也扩充了许多军队。杨宇霆当了江苏省督军。姜登选当了安徽省督军。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按照盟约，什么也没有搞。郭深感不平，十分难过地对张说：“一路仗都是我们打的，我给你当部下，真是倒霉了。”张耐心地劝郭不要计较这些。郭说，你是大帅（张作霖）的儿子，说什么都行，反正我算倒霉了。可是张的部下也没升迁啊。别的部队确实都阔得很，都扩充军队。什么旅长、师长、军长都当上了。张询问在张宗昌部下工作的人，说他们给你什么职务了？他说，唉呀！别问，人家都阔得很，都发了，仅张宗昌、李景林一下子就扩充了五六个军，一个中校参谋，一下子就升到了军长，……郭松龄愤愤不平。张认为这都是杨宇霆搞的鬼。于是张向张大帅反映这些情况，其父不听此言，就听杨的。张再提议，其父就大骂说，你小六子想当总督啊！不行！张是建议自己接替杨宇霆任巡阅使，郭松龄当直隶总督，再次遭到其父的大骂，这样他回天津也不好办。杨赴江苏上任时，已把张调回奉天，代杨办事，当总参议。张把驻关内的军队都交给郭松龄了。郭趁此机会，把旅长调动了许多，他们都是郭的亲信。后来驻江苏、安徽的奉军都被打败了。杨带去的两个师都被陈调元缴械了，姜登选也跑回来了，冯玉祥也开始活动了。杨宇霆回到奉天又当总参议兼督办（因为他去江苏时并未免去此职），张作霖这种功过颠倒，赏罚不明的作法，引起其他将领们的强烈不满，尤其是感到倒霉的郭松龄，更是激烈。这时张作霖还要打冯玉祥，没有军队啊！只有张、郭二人手中还有军队。杨宇霆把打冯的命令都拟好了，张学良揣着此令到了天津。当时李景林、姜登选、郭松龄等正在开会，张还没有提打冯玉祥的事，也没敢拿出揣着的打冯命令，感到气氛不对。郭先发言说，我们还要打啊？！杨已把江苏丢掉回到奉天了。姜说，别提了，别提了！别提这丢人的事了，拿人家的钱，真丢人啊。因为姜是跟杨一起去的，最了

解情况。他这一说，大家更气了。群情激愤，使张学良觉得情况不妙，就对郭说，茂辰（郭松龄字茂辰）啊！你想一想，杨宇霆不好，咱们不是也有过错误吗？大帅对他宽厚，一旦我们今后犯了错误，和对杨一样，大帅也会对我们好。郭说：“张景惠是大帅的人，他打败了为什么不敢回奉天？你还不知道这一事情，主要是杨在里头搞名堂。杨反对张，张就不敢回去。有你在，我们可以没有顾虑，我们若犯杨那样的错误，回到奉天是要被砍头的。”郭边说边哭。张怕激起事端，始终没敢把打冯玉祥的命令拿出来。他立即打长途电话给张作霖反映下面的情况，说杨宇霆管兵工厂账目不清，可借此撤换他，给大家平平气，又遭到大帅的痛骂。张作霖命令张学良快回奉天。回奉天之事，大家都知道了。李景林对张说：“兄弟呀，你放心。万一回奉天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站到你这一边的。”张本不想回去，可不回又不行。他已预感到，一旦离开此地，会出问题的。张回到奉天再次遭到父亲的大骂，并要张叫郭松龄回奉。无奈张给郭打电话，要郭回来一趟。因郭早有“暗取兵权，潜蓄力量”，借助张学良的特殊地位，以待改造东北的思想，对张作霖武力统一，大打内战，耗尽民脂民膏的穷兵黩武的行径，早有不满意，反叛张作霖的决心早已有之。当张学良离津返奉后，他发出通电，逼张作霖下野，让张学良继承。此前郭氏在天津就曾对张学良说：“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好多，可以开发经营，不应再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芳辰（李景林别号）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传达上将军多加考虑。”

11月20日，郭认为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沈阳一定不怀好意，遂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郭氏还向张学良说过：“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他建议父让子继，愿竭诚拥护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东三省局面。张骤然听到这番话，不禁骇然。但

他未动声色，乘北宁路火车东返。

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也因张学良痛恨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少内部反抗。但是郭立逼张“大义灭亲”，实为张学良难以接受。张学良在复郭松龄函中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驾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①

郭发动兵变时，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打算和国民军联手。1925年11月23日，郭自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通电话数张作霖的罪状，逼其下野，同时把自己的军队改编为东北国民军。把他与张带的部队编成五个军，开向奉天。出山海关后，势如破竹，一路进击，迅速占领了锦州、白旗堡、新民等地，直逼奉天。

在奉天的张作霖惊慌失措，召集在奉的诸位将领开会，大发雷霆：“常处长（常为军政执法处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刚想转身，吴俊升站起来摆摆手说：“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张作霖怒冲冲地对吴说：“你有什么说的？”吴说：“唔，……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你胡说！”张作霖把脚使劲儿一跺，全场震动。吴连忙说：“唔，……没有张将军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

^① 1925年12月7日《申报》。

子（郭松龄绰号）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唔……收编郭军，谁也做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将军不可！他一招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学良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接着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又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的都是好的。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即王永清当土匪时的诨号）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晕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军队，瞧不起于兰波（即于芷山），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我姓张的向来用人一秉大公。李景林、张启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即于学忠）是吴子玉（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我与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现大洋，给他安家。当时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做老婆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即汤玉麟）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儿。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这时杨宇霆也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俊升）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将军不仅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率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将军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接着王永江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体会。”于是，张作相、吴俊升二位上前一左一右架着张作霖退席。张还是边走边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到

此，闹剧才算收场。

此时，张学良则想方设法与郭松龄取得联系，打电报，不见回音。无奈，只好和张作相一道坐火车到前线去，但是铁路被破坏了，电线也被割断了。正巧遇到前面开来火车，张问，“什么人？”

“我们是郭军长派来的。”

张上前一看，原来是他的工兵营长杜维刚。杜上了张的火车。

张问：“杜维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杜说：“你有命令”，说着从靴子掏出命令。一看是张学良和郭松龄联合下的命令，说张作相叛变了，要回去打张作相。

张说：“你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张作相。”

杜说：“这我认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张说：“郭松龄叛变了！”

“啊！郭松龄叛变了？！”杜维刚感到吃惊。

张说：“在讲武堂我是他的学生，可我现在却是他的长官。你甭管他，把车挂在我的车后跟我走。你把破坏的铁路、电线照原样给我修好。”因铁路一时难以修好，张只有坐船去见郭（当时郭军已占领锦州）。半夜里张在船上接到一封电报，一看内容，觉得奇怪，说是请张汉卿回奉天就职。张十分难过，坐着大哭。几个随从问他为何如此大哭。张把电报给他们看，他们都笑了。说，你不要哭，别难过。我们到秦皇岛上岸与郭联系。郭要求张到天津，张不同意到天津，张要郭到秦皇岛，郭又不干。看来是非打不可了。张只好到旅顺，心想，算了，完了，爸爸都称我为张汉卿先生，还怎么有脸见人！人到这一步，活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跳海一死拉倒。经周围人劝说、阻拦，张才未跳。当时杨宇霆还在张作霖身边，他们都怀疑张学良与郭松龄事先已有勾结，是同谋反奉。连与张同行的张作相也对张有怀疑。后来张作相见

张回来了，问，你是怎么回事？张说，咱们回去吧，打吧，我不回奉天，要到前线去。张作相当时也扣着文件不给张看。张当时任 27 师师长，其部队在锦州附近还有留守处，有一点炮兵。他把仅有的一点部队收拢收拢后，正好碰见郭部队中有一个营倒戈过来。张对那个倒戈过来的营长印象很好，因为他缴了反戈部队的械。张赶快过去，又碰见其父的干儿子，姓郑，是个旅长，穿了个大马褂，笑着对张说：你来干什么？回家去吧！张说，去你妈的，少管闲事！他不要随从，独自一人过去对那位营长说：你不要害怕，既然倒戈了，反郭了，他现在也不知道（该营有 600 人）。你要是信得过我，跟我走。到了锦州附近把剩余的炮拉着。其余的部队都在往后撤，那张作相也打不过郭松龄，也直往后退。依牙格（意大利人）给张开火车，一直开到巨流河，郭松龄的部队也到了，当时张作霖，准备一把火烧了大帅府逃之夭夭，张学良心中十分难过，也不敢回奉天，只给其父打了电话。张作霖问，“你在哪里？”

张说：“我在巨流河。”

大帅：“听说你跑了。”

张：“我要是跑了，就不是你儿子。我听说你跑了。”

大帅：“我要跑了，就不是你爸爸。”

张：“我们跟他（郭松龄）打！”

于是张作霖全力支持张学良，把奉天兵工厂里那些破枪破炮集中起来，全部运到前线，还送去了 40 万块现大洋。这就给前线的人壮了胆了。除倒戈的那 600 多人外，又收容了从前线跑下来的散兵，加起来大约有两三千人，成立了司令部、炮兵。他们对张学良十分忠诚。张学良还雇了好多日本人帮助指挥。张对大家讲：“如果你们不想打，打败了，郭松龄把我逮住，也许不会怎么样，但是饶不了你们，因为你们背叛了他。再回去是非杀头不可。我把话说清楚，要打就打，要不打就走人，我车上有 40

万块现大洋分给你们。要是打败了，我就上山当土匪，决不服郭松龄。”大伙说，那好。我们绝对跟你走，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张的部队中有个陈长兴，其兄长陈再兴在郭松龄那边，是个旅长。陈长兴大骂其兄：“打他妈的，打他王八蛋。”张说，当年我是郭的学生，在巨流河演习过，过去是假演，今天可是真打，看看师生之间比试一番谁行。结果郭兵败被俘，在押送途中被杀。张学良本想放他一把，饶他一命，可是当张学良的命令传到时，因杨宇霆先于张有所指示，郭在白旗堡被押送者杀害，在沈阳陈尸三天。此事对张刺激很大，1929年张学良枪杀杨宇霆、常荫槐，也跟此有关。

1990年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及此事时说：“我很自信，假如谁叛变，我也能控制他。我确信反叛是不会成功的，但是郭松龄真的反了。当时我非常苦恼，我感到对不起东北人民，对不起我的部下。叛变是使东北的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我的部下有好多人牺牲了。确实我喜欢郭松龄，他以前违背命令时，我想我不应该饶恕他。那时我饶恕了他，结果他发动了叛乱，使许多的人牺牲了。”

张学良直截了当地说：“杨宇霆可以说是死在郭茂辰手里。我父亲常骂我说：‘你对郭茂辰除了老婆不给他睡外，什么都可以给他’。”张、郭亦师亦友之好，感情之亲密，可见一斑。

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①



赵一荻是我的同学，后来我们又是妯娌。我们之间情谊深厚，我很尊重她。当我们分离后，我常常想念她。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不愿谈及赵一荻，特别是有关她过去的事。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太多。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张学良。40多年如一日啊，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

甘为秘书随少帅

赵一荻又名绮霞，童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当时正处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天津是达官显要的一处居停地。张作霖、我的父亲朱启铃、绮霞的父亲赵

^① 朱洛筠为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铃之女，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夫人。

庆华等，都在天津安有住所。他们之间过从甚密，眷属多有往来，我们这些子女便经常聚会嬉戏在一起。我和绮霞幼时常在一起玩耍，以后同在天津浙江小学和中西女中念书。

绮霞的父亲赵庆华（字燧山）在北洋政府时代连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当梁士诒做总理时，他曾官至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生有六男四女，男女分别排行，女儿之中，绮霞最小，排行第四，家里人有时就称她赵四。大约在1926年前后，绮霞的姐姐赵二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出人交际场所。当时有名的交际场所是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曾留学德国，颇有西洋派头，经常到此参加娱乐活动的还有绮霞的六哥赵燕生和张学良等。其时绮霞年纪才十几岁，起先出于好奇，随姐姐去舞场观看，后来和张学良相识，很快成为朋友。此后有一年暑期，天津诸家眷属子女多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张学良、赵绮霞在那里相会了，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

1928年秋天，张学良同绮霞相约，秘密去沈阳北陵同居，并让她就地入大学深造。绮霞求学心切，张学良答应了她的要求。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绮霞失踪”传闻。

当时，张学良同夫人于凤至已结婚多年，并且生有子女。为了家庭和睦，他向绮霞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可谓侍从小姐。于是，绮霞便有了秘书、赵四小姐的称谓。

赵庆华得知绮霞与张学良去沈阳同居的消息，震怒异常，随即在报端发表声明，与赵四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在父亲的强烈反对和舆论压力下，绮霞毫不动摇。她精心侍候张学良，并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沈阳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1929年，绮霞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张闾琳。这是她和张学良的爱情结晶。

贤良聪慧助夫君

1930年，绮霞随张学良到北平，住进顺承王府（即现在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偶尔来探望她的，只有她的生母和哥哥赵燕生等。她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赵家，也再没见到父亲赵庆华。

绮霞自从住进了顺承王府，便和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朝夕相处。绮霞识大体、顾大局，以她的贤慧品德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融洽和睦。她对于凤至非常尊重和亲热，生活上亦殷勤照顾。张学良外出买回衣物，绮霞即送给于凤至。于凤至对绮霞的贤良很是赞赏，故深相接纳，如亲姐妹相待。她们亲密合作，精心照拂张学良，这对张专心处理军务、政务是很大的支持。在家里，他们三人一起愉快地生活，接待朋友和客人时，张学良总是带上于凤至、绮霞。当时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羡慕他有个和美的家庭，称赞他有两位贤内助。

1933年，蒋介石、宋子文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现在的情况是，有一只船，只能坐两个人，风浪骤起。如果下去一个人，船才不至于下沉；如果不下去一个人，船沉了，三个人都得淹死……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在张学良失意的时候，绮霞不但给他安慰，并支持他在出国前短期内戒毒。张学良由于凤至和绮霞陪同，去英国、意大利、德国、芬兰等国考察军事期间，绮霞为了使张学良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他想要从事某种西方娱乐活动（如打高尔夫球）时，便很快地学会，陪伴他一起娱乐。1934年，绮霞从意大利回国至上海，后转往汉口张学良住地。于凤至因子女们留在英国，于次年回国住北平，1936年因思念子女又第二次去英国。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前后，绮霞一直陪伴张学良在西安。

按张学良的个性，不许眷属参予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不受妻室的影响。但是，在“双十二”这个关系中国现代历史转

折的非常时期，张学良给绮霞以很大信任，一切情况和秘密，绮霞是了解的。在这期间，她有力地支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壮举，协助他们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比如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革命同志的来去，便是她从中联络并加以掩护的。这一切，表现了她坚决抗日的爱国情操。

舍离幼子赴囚笼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为拥蒋联共抗日，送蒋介石回南京。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赵一荻在万般忧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携带儿子去香港居住。1937年初，于凤至从英国回到北平，遂赴奉化溪口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历时3年，由于辗转迁移和特务的折磨，于凤至健康状况日差，需要外出就医，于是，张学良便在1940年向军统头子戴笠提出，让赵一荻来接替于凤至照顾他的生活。

赵一荻获悉张学良需要她去照顾的消息，毅然决定前往张的囚地。以赵一荻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钱财，有自己的住所，生活是很安定舒适的，加上儿子年幼也需要照拂；她不去张学良的囚地是可以的。但是，她考虑到正在危难中的张学良，此时此刻更需要她去陪伴，她只能抛却一切优裕的条件，去同张学良一起过囚禁生活，其中包括舍离自己的最心爱的儿子。

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其时刚满10岁，既无能力独立生活，也无亲人在港照管，而她将要去的囚笼，又不能带孩子同去。怎么办呢？赵一荻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她在痛苦的思索中，忽然想到一位美国人，他是张学良的忠实朋友，张曾将一笔财产委托给他照管。于是，赵一荻带着闾琳来到美国，将孩子交给这位朋友照看，请他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设法让他念书，但不许他接触外界任何人，也不能向他人谈及他的有关情况，以防止有人加害孩子，或因环境复杂发生其他意外。临别的时候，闾琳哭闹得十分

厉害，他哭喊着要跟妈妈回去，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妈妈泪满双腮，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孩子被拉开了，赵一获呜咽着，步履蹒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那里是湖南沅陵凤凰山张学良的囚所，那儿是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

以沫相濡四十年

据外间传说，赵一获曾在胸前挂着一条精致项链，上有一颗红色的象牙质心形链坠，内藏一张学良的小像，以示对张学良的爱慕和忠诚。这事是真是假，因为当时我未留心，不得而知；但是赵一获对张学良的无限真诚，已被她陪伴张学良度过了40多年软禁生活所证实。40多年的囚禁！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熬过这漫长的岁月，这叫人难以忍受的酷暑和严寒的！

1940年，赵一获从香港来到凤凰山陪伴张学良，后被遣转永兴农村，又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次年5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赵一获陪他在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他们又被囚禁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乡，1944年冬迁至桐梓，在桐梓天门洞一直软禁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他们被解到重庆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不久即被押往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军统局指派特务刘乙光长期监视张学良和赵一获。刘乙光为了在精神上折磨他们，经常采取一些过分的作法，比如限制他们在规定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克扣外间寄给他们的衣物食品，特别是放任自己患病的老婆及无知的孩子，常常吃饭时在桌上胡吵胡闹，致使张学良、赵一获无法进餐。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再加上种种非人的待遇，张学良和赵一获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得两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一获身上，赵一获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张学良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并且好动的人。凡是张学良需要做的，赵一获就陪着做，跟着学，做到

样样都会，都能跟着来。张学良在囚禁中不时用英语会话，赵一荻就学习英语，随时和张对话；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等，赵一荻就陪他对打；张学良研究明史，写文章，赵一荻就给他购买书籍，查找材料，帮助做一些文字工作；到了张学良厌倦读书，喜欢文物古玩的时候，又是赵一荻去帮他采买、鉴定和收藏。

在软禁中，许多生活琐事都是赵一荻自己动手，而赵一荻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什么都会干，并且做得很好。比如仿照新的式样缝制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等等。张学良使用假牙，保养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线绳都是赵一荻一根一根地用手捻成，然后打上蜡料备用……

大约在1958年秋天，周恩来总理来看望我的父亲朱启钤，一见我便问起：“你认识赵四小姐吗？”我说，我和她从小同学，很熟。总理听了很有感触地说：“赵四小姐，聪明贤慧啊！”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总理还没有忘记赵一荻啊！我觉得，总理对赵一荻的评价很中肯，他对赵一荻所做的一切是了解的。

此情感动于夫人

赵一荻和张学良在软禁中的种种情形，特别是他们被押往台湾以后的情况，我所知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回国观光时告诉我的。说来痛心，数十年来，我和赵一荻见面，总是在梦中，在一些港、台和国外出版的报刊里。正是在一份台湾报纸上，我才得知她和张学良在1964年7月4日补行了婚礼。那时，他俩与世隔绝已经20多年，她都51岁了。

据报道介绍，他们补行婚礼的原因，是基于宗教信仰。张学良在囚禁中，曾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后来，他厌倦了，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向收师请求受洗，但依照基督教的规定，教徒在受洗时不能有两任妻子。他必须在于凤至和赵一荻之间作选择。张学良的最后决定是和赵一荻结婚，并在事先取得于凤至的同

意，结束了他们两人的婚姻关系。当时，于凤至和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博士住在美国，她对 20 多年来一直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与之共患难的赵一荻十分敬佩，并且深为赵一荻的坚贞爱情所感动，所以，当张学良向她提出上述要求时，她慨然应允。

这篇报道还透露出，张学良和赵一荻这时“隐居”在台北市郊北投的一所小楼中。张学良“已恢复自由，但他个人不愿与外界接触”。除了基督教以外，他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做礼拜，每星期五在家中听牧师说教，偶尔也出外看场电影，但已经没有人认识他了。报道说，他和赵一荻的婚礼，是在台北市一位美籍人上的家中举行的，除了他们夫妇之外，仅有张群等十二人参加。婚礼按照宗教仪式进行，虽然简单，但很隆重。当证婚牧师为这对年老夫妇祝福时，他和她的嘴角都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报道中所描绘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处境与心绪，读来令人心酸。文章的小标题也是动人心魄的：“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回眸笑看小於菟

3 年前，我看到美国一家中文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张学良在金门眺望故国河山》，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则消息配有两帧照片：一帧是张学良将军的侧身像，只见他眯着眼睛，把脸紧贴住高倍望远镜，贪婪地观看对岸的大陆河山；在另一帧里，他和赵一荻面带微笑正对摄影机镜头，昔日的容颜，依稀可辨，但两人都明显地见老了——屈指算来，我今年 72 岁，一荻少我一年，也已年逾古稀，理应是垂垂老矣。我所痛心的是，他们 40 多年不得自由行动，加之海峡两岸长期隔绝，仅能藉望远镜聊慰故园之思；他们远离所有亲人，包括子女和孙辈，直到垂暮之年，仍然是两人形影依依，连世间最普通的人伦乐趣也无从领受！

说到这里，我愿再讲一件可堪告慰大家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旅居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儿子闾琳如今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相当顺遂。1940年，一荻把他托付给一位美国朋友照拂，后来经这位友人关照，又将他委托给一个有产大家庭教养。这个家庭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照管闾琳的学习和生活。闾琳大学毕业后，有一位女大学生慕名而至，主动来找他交朋友，她便是陈济棠的侄女。后来他俩便由相知而相爱，终于结成终身伴侣，婚后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都像父亲一样，读书用功，十分聪明。尤其是第二儿子，即一荻的小孙子，聪慧非凡，成绩优异，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名，上中学时就在电脑方面有一项发明，被美国科技当局认可并发奖鼓励。当时这孩子才十一二岁，所以有一段时间，曾被周围的人们誉为“神童”。

赵一荻身入囚笼陪伴张学良以后，内心自然时时挂念寄养在国外的爱子。后来，他们的“监护”情况稍有松动，一荻就每隔两三年去美国一次，看看闾琳、儿媳和孙子。然而，她深知单独留在囚地的张学良，一定会在她离开时备感孤独和不便。据说，为着不扰乱张学良的心绪，她每次在美国都只停留三天左右。单是从这点也可看出她对张学良的一往深情。

我与一荻自幼同学以至而今，60多年匆匆过去。我怀念童稚时的伙伴一荻，更敬重今天作为大嫂的一荻。我经常在期待着这一天，当祖国统一、大哥和大嫂双双归来时，我们张家所有的同辈、第二代和第三代，一齐会聚在北京、天津或沈阳，畅叙离合悲欢，尽享天伦之乐。最后，权将我在去年三八节为一荻填写的《思佳客》，作为我这一串谈话的结尾：

少小同嬉忆故情，面今白发说余生；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怀旧雨，盼新晴，春回两岸海波平。中华一统归来日，万户融融笑语声。

张学良与张作相相互让贤^①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位，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甚至兄弟父子之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亦屡见不鲜。真正为大局筹谋，推心置腹，互让贤者的不多。张学良与张作相相互推让最有实权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之事，实属罕见。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沈阳皇姑屯炸车案，其险恶用心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作霖的死亡而引起社会混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当时张学良正在与杨宇霆统帅奉军第三、四军团掩护奉军向关外撤退。6月4日，张得悉张作霖被炸后，化装为一名士兵，着灰色军服，佩“王得胜”符号，混在战士中坐闷罐车，于6月18日秘密返回沈阳。翌日，张学良、臧式毅、刘尚清等以张作霖名义，伪称张作霖大元帅正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委张

^① 由陈崇桥、肖鸿：《罕见的历史奇迹——张学良、张作相互让‘帅位’纪实》改编。

学良代理。”张学良遂于当日就职。是月 21 日始公布张作霖当日死亡（张作霖 6 月 4 日被炸重伤，回到大帅府即死，21 日是假日期）。这位东北最高当权者的突然死去，一时间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对内对外问题甚多，新老名派主张各异，霎时间，谣言四起，东北政局立呈不稳之势，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尽快确定东三省的最高首领，乃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当时，张学良竭诚推荐张作相继承张作霖之位，可各派意见殊不一致。

张作霖经营东北多年，目的就是为他的“张家王朝”创基业。他只取帝王之实，不取帝王之名。当年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说他要复辟，要建“大辽帝国”等。张对此极为气愤，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的政治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他虽不想称帝，但却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从多方面培养长子张学良，让他博得“将门虎子”之名声，以便有朝一日好顺利接班。有人说，“以老将生前的步步安排，可以说全是为儿子着想。”按照中国封建传统惯例，早就以少帅闻名的张学良子继父业，似乎应是东北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况且张作霖死后还没发丧之时，就在大帅府由秘书草拟遗嘱，要张学良继承父权）。事实并不尽然，有不少人认为年仅 28 岁的张学良资历太浅，太年轻，对他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持坚决抵制态度。

那么，谁来继承张作霖的位置才更合适呢？张学良回到东北后，除着手办理丧事外，即召集东北元老开会，研究东北的继承人问题。他也认为自己太年轻，资历浅，极力推荐张作相，略谓：“大元帅殒天，群龙无首，辅帅是父执，功在东北，德高望重，即拥为首长，共济时艰，请大家同意。”自己则甘居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张学良何以如此？因为张作相确实有许多优越条件是他所不具备的。

张作相虽不是张作霖的胞兄或族人，但他确实是与张作霖同起辽西的拜把子哥们，“资格”最老，而且在奉系老派中尚属最年轻（47岁），最有实力的人物。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无不良嗜好，并常在别人危难时给予帮助，在奉系集团中素有“德高望重，忠厚长者”之称，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就人事而论，张作相一向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官位的高低。1920年，张作霖让他任黑龙江督军，他考虑到吴俊升非张作霖嫡系，力荐吴任该督军。他说：“论资历，我不如兴权（吴俊升字），论年龄他也比我大，为表示待人公正，不徇私情，让兴权先升，这对我们事业的前途有好处。”直皖战争后，张作霖拟派张作相继任热河都统，张执意不就，并推荐非张作霖嫡系的汲金纯充任。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吉林督军孙烈臣病危时，曾进言张作霖：“我死后要以辅忱（张作相）接替我的职务。”张作霖完全同意孙的意见，但又怕张作相再谦让，特派张学良密告张作相，对吉督一席应当仁不让。这样，张才就任。打破了杨宇霆、李景林对吉林督军一席均欲染指的美梦。

从稳定内部来说，张作相也颇有贡献，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奉失败被杀，“其军长刘伟、刘振东、范浦江等，皆束身来归，拘置一所。”张作霖召集文武官员，问以处分之法。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人物，素日仇恨新派分子，欲乘机杀一批以泄私愤。因此向张作霖表示，这些东西都是郭鬼子（即郭松龄）一手训练出来的，将来恐怕靠不住，为不留后患，不如把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杨宇霆与郭松龄非同一系，素有“洋”（留学派）“土”（国内陆大派）之分，彼此矛盾极深，杨认为此乃剪除异己的天赐良机，在张作霖面前力言：“他们随同郭松龄倒戈，不但危及总司令的事业，而且使辽西一带百姓遭受兵灾，祸民伤财，若不严惩，将何以谢百姓，何以警将来。”其言语激烈，“理由”

也说得冠冕堂皇。张作相见此情形，从座上霍地站起来，严肃地说：“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桑梓子弟，多年袍泽，应该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宽大，以安郭部下之心。”此建议颇有远见卓识，表明张作相这个人绝非心胸狭窄、意气用事之辈可比。对此建议，多数人表示反对，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多时，张作霖也未裁定。最后张作相涕泪陈词：“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把我张作相先杀了吧！我可不愿意再看见这种不幸的惨剧在奉军内部重演了。”至此，会议的紧张气氛才逐渐缓和下来。结果除郭氏夫妇遭杀害外，没有株连他人。张作相这一老派人物在处理郭松龄事件的善后问题上，表现出宽厚的心怀，受到新老派人物的高度赞赏而威望升高。

张作相对日本侵略者持坚决反对的立场，1928年5月间，满铁代表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即敦图、长大、吉五、洮索、延海五路）“承造”合同，因“满蒙新五路”多在吉林境内，故张作霖令张作相出而与日本签订承造合同。张表示“困难颇大”，“不愿接受”，同时密电吉林省议会，内称：“大元帅为筹措军费，正拟吉林省所有森林、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外借款，并将命令我二人（另一人为交涉署长钟毓）签字，此刻希望你能够对我们两人此举的意图保守秘密，并向大元帅发出反对的电报”。吉林省议会接到张作相的电报后，立即给张作霖发出多次反对电报，内称：“把铁路建设权给予外人，将留下大患。”“无论日本人玩弄什么权术，亦断不能允许给他们以该项铁路权利，必须坚决拒绝。”张作相始终拒签丧失主权的条约，因此得罪了日本人。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最“没有威信”，这恰恰是张作相值得骄傲之处。

张作相还一贯严禁鸦片泛滥，对“种毒筹金”也持坚决抵制态度。认为“种毒筹金”是最大的苛政，是赚“亡国灭种”钱，并在毗连奉黑两省边界及交通要道，设禁烟药科查验所，采取有

力的措施，防止毒品进入吉林省。这一举措使吉林全省免受不少灾害。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能公开制止种植鸦片，而且他本人洁身自好，带头不吸鸦片，实属难能可贵。

张作相对奉军几次入关打内战都持有异议，认为几次进关打仗，把东北打穷了，主张“闭关自守，开垦戍边，广立学校，振兴实业，训练精兵，以便养精蓄锐。他在督吉期间，政绩比较突出，颇得人心。

正因为以上所述，张作相在6月21日的东北三省议会联席会议上，被各位代表一致选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非常高兴，立即把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和印信送上，表示衷心拥护。可见在当年的东北，张作相确实是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

后来，张作相拒绝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衷心拥护张学良子继父业。

张作相把张学良送上的公推书和印信全部退回。同时声称：“母老病剧，侍药无人”，借故跑到锦州回避。他仍坚持自己的原来主张，拥戴张学良主持东北。他深感自己水平太低，才力不足，无法应付当前动荡不安、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张学良是张作相摸着头顶长大的，后者最了解他，认为他虽年轻，但其文化水平、学识、才能和在部队中的影响，都在自己之上。

正如张作相所言，张学良虽未读过大学，但其学识和阅历却相当丰富。张作霖向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早在张学良七八岁时，即为延师开蒙，如白永贞、宋文林、张梦九等知名人士，都先后任过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张不仅自幼就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教育，而且也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后，又马上聘请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为张学良教授英文。其后经人介绍，他又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又跟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等外国朋友学习英文。还与一向思想进步的阎宝航等结为挚友。1920年，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一期炮科。1921

年秋，随张作相赴日本参观秋操。观操后，日人特邀张作相、张学良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从中国掠去的战利品，并问他们有何感想？此举本身就带有威胁性质。对此，张学良回答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战争的中国了。张作相认为张学良的这一回答不卑不亢，非常得体，对张学良的才华表示欣赏。

张学良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即出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镇威军东路梯队司令，显示出卓越军事才能，23岁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24岁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27岁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作战。他的军队，训练最好，纪律严明，战斗力最强，堪称奉军中的楷模。张作相考虑到这些，认为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培养的新势力雄厚，继承父业是自然趋势，对于支撑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各方面的团结，都有重大作用，他完全可以胜任。同时他将此意向旧派人物分头说服。他以奉系老派资格的身份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派当然欢迎，旧派亦开始认识到张作相言之有理，逐渐转向拥戴张学良了。

当然，张学良拥戴张作相接班，亦属真诚，大家看这个“老把侄”对长辈如此谦恭有礼，这也是张学良得到奉系将领普遍赞扬的原因之一。当二张数次谦让，暂时无法决定时，袁金铠竟提出什么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严肃大事，岂能儿戏。后经张作相继续多方串连进行说服工作，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于是，张作相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次召开会议时说：“东三省保安司令”一职本人坚辞不就，势难挽留此职，关系甚重，未便欠悬。遂于7月2日，在正式召开的东三省联席会议上，当场表决，推选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今辽宁）省保安司令，翌日宣誓就职。之后，张又兼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张学良名正言顺地成为东三省的最高领导者。

为辅佐张学良尽快稳定东北政局，张作相在东三省联席会议上带头表示：“我们服从总司令（张学良）就如同服从张大帅（张作霖）一样，都要坚决听从总司令的命令，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保卫东北，抵御外侮，如此才能对得起大元帅，对得起总司令和东北父老兄弟！”私下里，张作相又极其诚恳地对张学良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地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

素有智囊之称的杨宇霆是个既有雄才大略，又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在酝酿推举东北军政主帅时，不甘寂寞，跃跃欲试，后见张作相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竭诚拥戴张学良，只好发布通告，公开表示：“今后更当秉其（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主，宇霆忠不出位，祇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字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驂之随靳也。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甚幸。”

可以看出，确定张学良子继父业，张作相的主张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在当时亟须稳定东北奉系内部，顺利完成政权交接，以便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支解中国东北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制造炸车案，计划鲸吞东北的阴谋破产后，野心不死，又积极策划东北独立运动，妄图让张学良充当傀儡。曾派权威人士林权助为全权专使，拿一银制花圈到沈阳吊唁张作霖。名为吊唁，实为乘人之危，对张学良施加威胁、恫吓，迫其就范，达到侵华目的。由于东北政权的顺利交接，上下内外团结一致，张对日本的恫吓，毫无后顾之忧，泰然处之。林曾露骨地对张说：“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面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针锋相对：“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

一，我惟有依照人民公意。你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日本当不至于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大不韪。”“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的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而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当初林权助由日本起程时就对人说：“我和张雨亭（张作霖）是老朋友，我见到老世侄张学良，只需痛哭一场，不由他不念故交，不走亲日路线。”到了沈阳之后，果然表演得很精彩，真有点像柴桑孔明哭周瑜，涕泪纵横。见张学良毫不屈服，即从另一角度进行诱惑说：“我和令尊是老朋友，敝国政府派遣我来吊丧，就是因为我与贵总司令有这种渊源，在私意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的子侄，有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到林这种倚老卖老，毫不顾及外交体面的无理言词，立刻给予还击：“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奉答的就是这些。”于是张学良乃端茶送客，双方不欢而散。

张学良这一阶段的表现，当年日本驻沈阳领事森岛守人曾有评价：张学良从19岁就驰骋疆场，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他为人性格沉着，头脑清楚，实有卓识，即使没有亡父的余荫，他也是具备能创大业的素质的。在和日本交涉方面的过程中，他向来能以含蓄的语言、端庄的风度、飒爽利落的作风而应付自如，从未发生过有失大体的地方。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张作相拥护张学良出任主帅，诚得人心，功莫大焉。

1986年张学良在对晚辈谈起张作相时，他说：“那个张作相啊，他真是你爷爷的忠臣，他有意提拔我，培养我。那时，我年轻气盛，若稍大一点，我不会那样。他那时是27师师长（你爷爷是东三省巡阅使，他有个卫队旅，也是张作相兼旅长），还是你爷爷的总参议。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想

让我担任卫队旅旅长。我还没有毕业，卫队旅有什么事，如出缺啊，他就问我，你推荐个人啊？参谋长出缺，我就把郭松龄推荐去。我还没毕业，他就让我担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本来人家有团长，那个团长很好，硬把人家调离。当时我本是卫队营营长。我才19岁，他就让我当团长。”张作相对张学良的培养提拔早就尽心尽力，难怪66年后，张学良还记忆犹新。

张学良与《贞观政要》



张学良从小就爱读书，崇拜世间民族英雄，对古代明君及其功业，也都赞赏之至。他曾写信给朱光沐：“弟尔来行军之中，无事之时，间阅《贞观政要》，发觉李世民之成大功业，非世民之功勋业，彼乃浮华纨绔子弟耳。其所为多类常人，不过是从谏如流，勇于改过耳。但亦有时不快于衷，或竟不从，成其功勋者，除其名臣外，魏徵为一大功业，一谏不从再谏，再谏不从三谏，其所谏中心秉正，不阿私，不沽誉。凡有心人安能不听乎？而况太宗之英明乎？弟用茂辰之败败于左右；弟之错用茂辰，及余二人感情之离间，又由于左右，弟放任职权，乃弟之大错误，然未曾有一人谏我也。弟今上承大元帅（张作霖）付托之重，下受众部僚之依赖之殷，一举一动诚有关国家大局及千万人之性命，千万人之前途。弟年少乏学，生性嬉游，虽不敢有太宗之野心，然甚愿有魏徵房杜之幕友也。弟常奖直言之士，凡言真中我失者，无不勉改，但甚少见言者。请购《贞观政要》一读，再

念三、四方面军团体，及弟私交上关系，勿任弟任意放浪游嬉为盼！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请勿笑弟不知自勉而求助于人也，弟之所求，非为私利，乃确愿保我一身，大则效力于祖国，小则有益于同寅也。”^① 张学良深受《贞观政要》的影响，深求苛责和渴求直谏，诚意恳切，十分动人。郭松龄倒戈使他最为痛心，故特别提出实例。

张以李世民自况，主要表现在喜读《贞观政要》。此书为唐代吴兢撰，“采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记当时法制政令，议论事迹，备作借镜”，尤以魏徵陈谏居多”，这就引起张的阅览兴趣。1928年打彰德时，在专车上也携以自随，军书旁午，犹不废夜读。对于魏反复以隋亡为鉴戒，提醒太宗，强调民水也，君舟也，水能安舟，亦能复舟。要求国君要居安思危，兼听广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务必使人民得到安居。以及太宗慨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镜矣，……’诸多资料，深有感触，认为自己需要这样一面镜子，便一挥而就，给朱光沐写信，求贤若渴，非常需要有人给自己指出缺点，而重用之。”

1928年秋冬，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久，郭道浦突然在海拉尔发出独立通电，痛斥军阀集权，民不聊生，非彻底改革，不能救东北的危亡。此通电在东北的报纸都不敢登，《新民晚报》得张许可，一字不易地揭露出来，日本报纸以为奇迹。郭是外蒙古人，曾任高级长官，通俄文和中文，年纪三十开外，很想帮助东北发展政治和经济。

张学良接到海拉尔临近军队来电，都主张出兵，张则因为父丧初定，应该与民休息，不宜用兵，更因海拉尔是中苏合办中东铁路的一个大站，四通八达，是黑龙江省西部的交通枢纽，清朝

^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记》，第118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出版。

时设有呼伦贝尔都统，是个重镇，1905年又辟为商埠，何必使他受炮火之灾。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郭所指责的话，他认为句句中肯。他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长信给郭，劝他取消独立，一切可以面谈，郭深为感动，竟起身到沈。第二天中午，张招待郭午餐时，郭将中国社会组织和发展的规律，说了一小时以上，张颇为动容。请郭当秘书，被郭婉谢，改为师范学校校长，他没有就职，只愿做一个客卿。

1922年，王以哲（黑龙江宾县人）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满怀爱国之志，拟投效东北军，在沈阳奔走多日毫无头绪。最后抱一线之希望，给少帅张学良写信，内称：“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纪律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有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样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他。张学良接见了王以哲后，当即委王为东北军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说他“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学良为了查明真相，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

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学良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人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总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少将旅长姜汝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以哲的提升，都是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决定的。不到六年王被提升为旅长少将军衔，1933年王又被提升为东北军67军中将军长。后来王以哲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助手。1937年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内的极“左”分子杀害，张学良闻之大声痛哭。他在写给子学忠的信中称：“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张学良特别重视教育



近百年来，我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他们在寻求救国之道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和政治救国等，其中教育救国之思想最有广泛影响。重视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每一个爱国者都很赞成的。1921年秋，年轻的张学良赴日观操期间，发现中国留学生的学费甚微，生活困难，经与驻日公使会商，特电张作霖立即拨款接济，以励学生而重学业。12月7日，张作霖拨款10万元给留日学生。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我父亲给我留下好多财产，我有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几乎都捐出去了，建立了东北大学等学校。那些费用都是我出的。一点也没使公家的钱。我很高兴这样做。我要国家强起来，要强起来就得培养人才。教育是强国的根本。”为了实践他的诺言，张学良首先狠抓军事教育、裁军屯垦，加强国防。早在1922年就成立军需教育

班、宪兵教练处、东北学生队、炮兵研究班、高等军学研究班、东北步兵研究班。继而开办军官教育班，军事教导班，并亲自抓海、空军建设。成立东三省航空、航警学校，以提高部队的文化、军政素质。

张学良还特别重视教育的普及，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捐赠其父遗产 1,000 万大洋中的一部分用于扩建东北大学，增设师范教育，体育教育和农学专业，并亲任东北大学校长。高薪聘请国内学术界名流到东大任教。如章士钊、梁漱溟、梁思成、张伯苓等。教授月薪是 400 元，少数人高达 800 元或 800 两白银。同泽中学教员月薪也是 80 至 120 元，主任、校长是 180 元至 200 元，是一般公务人员收入的三四倍。他还捐赠 500 万元私产成立“汉卿教育基金会”，用以发展中、小学教育。创办了 36 所新民小学，创办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海城同泽中学等。并将东大的优秀生成批派出留学。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以辽宁教育为例，1929 年各地公私学校共计 10404 所，比上年增加了 400 所。在校学生 64 万，增加了两万多。同年吉林省兴办吉林大学。

再以教育经费为例，1928 年教育经费为 528 万元，1929 年猛增至 1635 万元。东北大学经费 1926 年为 51.7 万元，1929 年增至 133 万多元。这与当时蒋管区教育经费连维持原有规模都不易，因欠薪而造成风起云涌的罢教风潮，是一鲜明对照。

他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学习文化知识外，特别注重实践，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他要求学生要“明耻自强，振兴民族。”他为海城同泽中学制定的校训是“爱国、尊师、励学、崇实”八个大字。张学良思想比较开放，承认世界列强科学进步，国富民强，其根本原因是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为此，他下决心进一步发展教育，“要振中华，心赖乎人才，赖乎教育”。1930 年张学良在南开中学演说时说：“余幼时对国家极为悲观，以为从此受到列

强宰割，无复望矣。后又大悟悲观之非当，于是本个人之良心，努力救中国”。他又说：“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一途”。他深知培养人才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因此对中学教育极为重视，使全省的中学教育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29年辽宁普通中学达到122所，学生22153人，其中有初级中学99所，高级中学5所，完全中学18所，较之1926年增加了48所，加上职业及其他中学，全省的中等学校总数共有198所。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即在教育落后。”要独立富强，其“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

1933年，张下野出国前致书东北军将领与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与共，准备收复东北为最大责任。“嘱咐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念念不忘复土还乡和洗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1936年8月，他为东北大学西安新校舍奠基题词：

东北大学校舍奠基纪念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自九一八，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勳尔多士，复我河山。

1936年9月30日，他在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要求师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含义，养成大无畏之奋斗精神，作西北青年之表率。

1991年3月29日，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代校长宁恩承先生从美国给阎明光发来电传：“汉公（即张学良）亟愿见见你和明复，谈谈玉衡（即阎宝航，字玉衡，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张学良的挚友）教育基金会问题，即请办理来美手续，早日会晤。”4月6日，张闾蕻（即张学良侄女）从美国来电话，转达

张学良的意见，希望吕正操、阎明复和阎明光姐弟能去美国见面。张对阎宝航感情深厚，得知阎在“文革”中被迫害惨死狱中，极为痛苦，表示要为大陆成立的“阎宝航教育基金会”捐款10万台币。他给阎明光题词：“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

是年，他又给青田阜山中学六十五周年纪念题写：“培育英才”四字。阜山中学是张学良德文老师东三省军事测量局局长陈英（字惠生）于1926年出资在浙江省青田县创办的。

1992年11月30日，他出任恢复后的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并题写“东北大学”校名。

1993年4月13日，他为东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题写：“东北大学七十周年纪念”。为东北大学复校典礼题写：“教育英才”四个字。

1996年2月，他为表示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一位杰出代表的深深敬意和怀念，给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南开创办人张伯苓先生120周年诞辰题写：“桃李满天”祝词。

张学良为民除害

①



1924年初春的一天，黑山县荒山子烧锅大院的五东家记佩东带着4个随从，赶着马车前往黑山赶集。当途径四楞屯附近时，遇上了十几个土匪，其中一个领头的大栏把当面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赶快把钱物都交出来。”这时记佩东见机行事，商量着说：“各位长兄与老弟，咱们有事好说，要钱我们给你，”大栏把却说：“光给钱不行，我们还要车马。”记佩东央求说：“要钱给点可以，若是连车带马都交给你们，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待。”大栏把见记佩东拒绝交出车马，就下令强行抢劫。记佩东灵机一动，大鞭一甩，马车即刻飞奔，大栏把和十几个背枪的紧追不舍，开枪把记佩东等4人打死，只有一个随从逃出虎口，幸免于难，回去后立即向大东家记佩男汇报被劫情况。记佩男气得暴跳如雷，问：“劫车的人是什么模样？”他说：“我见那个领头的大栏把左手有点歪，不好使。”记佩男立即将案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此文。

情报告黑山县公安局。

公安局派警察赶赴现场察看后扬长而去，几个月后不见回音。经记佩男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西边外的土匪头子刘歪爪子领人干的，写状子向县公安局起诉。县公安局一再推托说，证据不确凿，不受理此案。这是因为刘匪事先暗中贿赂警察，使他们向县公安局做了假汇报。

记佩男有冤无处申，有仇不能报。万般无奈，就写了一份呈子，通过孙烈臣的亲属转交张学良。张批示：责令黑山县长马吟龙立即查处此案。

马吟龙接到命令后，责成公安局长将刘歪爪子抓来审讯。刘歪爪子自认为对方没有证据，死不承认。经逃出虎口的那个随从当场出庭做证，刘歪爪子这才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供出在其它地区所抢劫的财物和杀死4人的罪行。经审判，判处刘歪爪子死刑。在办案中受贿的警察也都被撤职查办。马吟龙给张报告处理结果。张对此表示很满意。事后受害者记佩东的长兄记佩男，特意专程到奉天感谢张学良。

1925年清明节前后，张学良借给孙烈臣将军送葬的机会，顺便到荒山子记佩男家看望，并在他家住了一宿。后来张学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之事就在黑山一带传开了。

张氏父子与穆春轶事

①



1926年8月，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在南口与宋哲元军队作战，经过数日激战，奉军获胜。接着奉军先遣部队穆春师、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旅于8月中旬迅速挺进张家口。在攻占张家口、多伦后，穆春师军纪极坏，特别是王永清旅的官兵到处抢劫，竟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多伦喇嘛庙的珍贵文物和金佛抢走的事。此案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慨，多伦的一些士绅和喇嘛到吴俊升处（穆、王部均属吴的部下）告状。吴虚伪地说：“穆春是奉军，我管不着，可到上将军处去控告他们。”于是吴俊升向张作霖发了急电，状告穆春，而暗地里却派人到新民县发动商绅写了80多张状子，告穆春师在郭松龄反奉时有抢劫行为（吴之所以唆使士绅、喇嘛告状，是因为郭军反奉时，穆的部下王永清团抓到郭后直接向张作霖做了汇报，而引起了吴的嫉妒）。张作霖接到状子和控告穆春的电报后，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成此文。

气愤地骂道：“他妈个巴子的，穆春领的这些胡子兵匪性不改，非得处置他们不可。”于是他命令张学良将穆春师全部缴械，团长以上军官交军法处受审。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和韩麟春带一个营的卫队，由北京乘专车前往张家口处理此案。穆春接到张学良的电话，深感自己对部下管教不严，造成极坏影响，当即下令团以上军官在站台上等候训话，营以下军官把枪架起来，排队欢迎张学良。张学良一到张家口车站，他的卫队就在车站周围架起轻重机枪，严密把守，预防意外。此时张要下车讲话，被他的卫队长姜化南拦住。姜说：“你是军团的司令长官，责任重大，还是我去吧。”姜下车还没有讲几句话，场内突然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开枪还击，交火猛烈，姜化南与交际科长死于血泊之中。整列专车遍体鳞伤，张学良和韩麟春躲在车厢里险些丧命。王永清和穆春当场被捕，穆春的下级官兵，除王永清旅的团以上军官和团营以下个别抢劫财物的首犯受到处罚以外，其它官兵均被收编成奉军万福麟的 17 师。穆春的 14 师番号被取消。

穆春被撤职查办后，张作霖又派于芷山到穆的奉天公馆进行清查，查出穆在奉天北关仅有一处宅院，只不过拥有日常家具、器皿等物，别无财产，更谈不上什么金佛爷和珠宝贵重物品。于芷山善言安慰穆夫人一番，并严令部下不得骚扰，同时于还将查封穆家公馆情况向张作霖做了如实汇报。

穆春在狱中听说他的 14 师番号被取消，心情非常难过。他要求面见张作霖请罪，谒张后穆说：“穆春治军不严，使无辜商民受害，确实有罪，请大帅处决穆春，以谢百姓。”张作霖想起穆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特别是在郭军反奉时，打了胜仗活捉了郭松龄夫妇，才稳住了他东北王的宝座，不无感缴之心。他沉思良久，才说：“从抄家情况来看，你原来是老公骑驢马有屁无蛋，还算清廉，回家去吧！好生休息，以后还得干一场哪。”当场发

还家产。穆获释不久，又被提升为军长。张学良执政东北之后，穆春被任命为东北军满洲里警备司令。

穆春，字祝三，1872年生于黑山县小东窝棚山。穆的祖父在清道光年间，从山东逃荒到窝棚山，落户后娶西边外大屯海性蒙族姑娘为妻，生子穆园林。穆园林在咸丰年间，娶小东潘氏女为妻，生四子二女，穆春为长子。穆春幼时家境比较贫寒，只有几亩薄地，他九岁入私塾读书。三年后弃文从农，与其父在家种地，以种香瓜维持生活。每到夏季，他经常和父亲赶牛车拉香瓜到新立屯去卖，一天卖不多少钱，还经常受官府地痞和土匪的气。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01年夏季的一天，穆春正在香瓜地看瓜，有两个身背快枪的胡子（土匪）来到瓜地以威逼的口吻对他说：“穷小子快给老子摘几个香瓜吃。”穆无奈，给他们俩摘了几个香瓜。这两个胡子吃完就走，不给钱还骂人。穆春气得火冒三丈，一气之下他从窝棚里拿出两把尖刀。趁两个胡子正蹲在地上擦手的时机，将两把尖刀对准他们俩的后背说：“你们俩快把枪交出来，不然我要你的命！”胡子心想，不交枪就没命了，忙说“饶命，你别扎呀，我们交。”穆春缴了他们的枪并大声警告：“你们以后不许再到我这捣乱，如果再来，我就要你们的命，快起来滚蛋吧！”胡子连头都没敢回，慌忙逃走了。窝棚山的老百姓都说：“穆春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缴胡子的枪。”

有一天，那两个胡子带着50多号人来报复，扬言要绑穆春的票，把整个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恰巧穆春去新立屯办事不在家。他的老父亲说了不少好话，胡匪们才算答应不绑票，以后专找穆春算账，临走时把穆家抢劫一空。穆春回来后见家里出了事，深知在家里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离开家乡去当兵。可是没有马怎么办，正在焦急的时候，他的表嫂答应借他一匹马。穆春骑着马，带着缴获的两支枪，到绥中前所新军三协二十七标十五哨

当兵。1912年，穆春返回家乡，经黑山县士绅赵尊伍保举当上了芳山镇的警务巡官，是年被提拔为黑山警务所所长。1914年由其亲属闾朝玺推荐参加了奉军。1916年，被提拔为陆军混成旅某营营长。此后在历次战斗中，因其骁勇善战、屡建战功，颇受张作霖赏识，先后被提拔为师长、军长，授予中将军衔。

穆春不但为官比较清廉，而且也很平易近人。每当回家乡看望父母时，只带两个卫兵，到村头他先下马步行进村，碰上家乡父老先打招呼后鞠躬。家乡谁家有什么困难找他，只要能办到的都尽力去办。穆春在外当军长，其父穆园林照样在家种地，穆园林还经常告诉自己家的牛羊信放牧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吃了人家的庄稼，别让人家说咱们有仗势。有时放牧的牛羊信不注意，牛羊吃了别人的庄稼，穆家照样赔偿损失，而别人家的牛羊吃了穆家的庄稼，穆家从不让赔。因此穆春在家乡有很高的威望。穆春一生只娶一位夫人，家里有汽车，他立下规矩没有特殊事谁也不许坐，在奉天街头他经常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安步当车，从不搞特殊化。

1930年末，穆春已年近花甲，他辞官不做，解甲归田，颐养天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做满洲帝国皇帝，穆的好友于芷山当了伪满奉天警备司令，于怂恿穆出山任御前侍从武官，穆婉言谢绝。日本侵略者想让穆春带头在报纸上发表“拥护满洲国”的宣言，曾威胁穆就范，穆也未从。日伪统治者看他如此倔犟，很不放心，就在他的户口上定为“特务要视察”，穆毫不在乎。他在家中养了七八头鹿，一次小鹿降生，管穆春户口的一个伪警察见穆很平易近人，认为他软弱可欺，曾以查户口为名，向穆索要小鹿，穆春勃然大怒说：“如果你喜欢，我全部奉送，只要你赏脸就行！”警察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还有人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告“穆春私通张学良，”很多人都劝他躲一躲。穆春听了微微一笑，立即命令司机把汽车开出来，直奔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长听说穆军长到，亲自出迎，并问：“军长有何贵干？”穆答：“我来打官司。不是说我私通张学良吗？”宪兵队长笑道：“军长多心了，我们向来都尊敬军长，相信军长是拥护皇军的，请回。”就这样，穆春安然而归。后来穆春对别人讲：“如果有机会我和张学良可以明通嘛，何以私通呢？”

八年抗战胜利后，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到任第三天就去拜访穆春，同他谈了很久。临行时张学思问他有什么困难，穆托他买点煤，张学思答应给他 12 吨，解决了他的取暖问题。

据知情者回忆，张学良将军虽然当年缴了穆春师的军械，但是穆春和张作霖、张学良、张学思是很有感情的。1945 年末穆春病故，终年 73 岁。

张学良修建打通铁路



1924年5月，张学良将军代表军界出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亲自下令修建打通（打虎山—通辽）等各线铁路。特别是在他执政东北后，更重视东北的建设与发展，致使“满铁”在东北的铁路运输业开始走向萧条，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东北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工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提起东北铁路的早期建设，还得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南满铁路说起。甲午战争后，沙俄于1896年6月3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修建东清铁路（满洲里—绥芬河）的权利。此后不久，沙俄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哈尔滨—旅顺铁路的修筑权（史称东清铁路支线）。1897年8月28日—1903年1月，这两条铁路全线开始施工，临时营业。

沙俄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因此，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东北势力范围，于1904年2

月8日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后沙俄将长春至旅顺的铁路让予日本（史称南满铁路）。日本政府为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做准备，于1906年6月7日，下令成立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先遣特务总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满铁”成立后，先后又修建了安奉、吉敦、四洮等铁路。与此同时，“满铁”还在鞍山、阜新等地掠夺铁矿、煤炭及其它资源。

鉴于日本“满铁”的嚣张气焰，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俩及奉军中的一些爱国将领，决定由东北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及民众集资修建铁路。1921年，修建了京奉铁路虎壕支线。1922年，修建了全长183.9公里的吉海铁路。1924年3月，郭松龄将军创办了奉天省开丰铁路公司，修筑了开原至西丰的铁路，这条铁路是东北唯一的独立经营的商办铁路。该铁路是在张学良、郭松龄带头投资和大力支持下，又由当地资本家、士绅、奉天省军政界部分官员的联合投资共同修建的。开丰铁路于1925年3月开工到1926年5月竣工，历时一年零二个月。1924年5月，张作霖为了加强对东北的国有铁路、省有铁路和地方商办铁路的统一领导，决定设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并委任张学良代表军界参加交通委员会任委员，负责支持东北自办铁路。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决定将京奉铁路支线打虎山至八道壕段延续到新立屯，并于1926年4月开始向通辽修建。

早在1921年4月，张作霖就已经下令修建京奉铁路虎壕段。张作霖为确保八道壕煤矿煤炭的及时外运，决定修建虎壕铁路。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该铁路于1923年1月正式通车。通车后不久，张氏父子俩又下令将虎壕铁路延长修建到新立屯，该段延长修建的铁路于1923年春动工修建，1925年8月竣工。这段铁路竣工后，鉴于日本“满铁”在东北大肆掠夺各种资源，张氏父

子俩又决定修建一条贯通南北，与南满铁路相对抗的打通铁路。

当日本“满铁”通过《交通公报》得知张学良要修建打通铁路的消息后，就立即电令当时在北京的满铁理事松冈洋右，让他设法阻止该计划的实施，阻挠修建打通铁路。1926年8月，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表示：“如果中国方面仍然不改变态度，即以书面提出严重抗议。”对于日本方面的干涉，张作霖、张学良与杨宇霆采取了一面应付、搪塞，一面继续修路的方针。同年9月，吉田在往访张作霖的时候，张对吉讲：“现在并无计划敷设之事，如将来为开发奉省起见，经官府和人民提议兴修，事关内政，届时当斟酌情形为之。”日本见干涉无效，于是就采取强硬态度，向张作霖、张学良提出强烈抗议，在抗议书中声称“断难默视”中国修建打通铁路，让张“命令停止已着手的工程和今后的计划”等等。但张氏父子俩与杨宇霆仍以“一切听任京奉铁路当局或北京交通部决定，奉天方面管理京奉铁路仅为一时性质，并未参与铁路计划”等理由相搪塞，继续修建打通铁路。^①最后日本政府以将来打通铁路不延长到通辽以北为条件，准许打通与四洮、洮昂铁路联运。日本干涉反对张学良父子俩修建打通铁路，宣告彻底失败。

打通铁路，南起京奉铁路打虎山（今沈山线大虎山），北至通辽（今哲里木盟公署所在地），途经黑山、秦家屯、八道壕、芳山镇、新立屯、十家子、泡子、郭家店（今五峰）、彰武、章古台、阿尔乡、甘旗卡、伊胡塔、巴胡塔、衙门营子、木里图16个车站，全线长254公里。打通铁路筑路工程共分为四段，分期延长或修建，具体各段修建时间如下：

打虎山至八道壕 1921年9月—1923年1月

八道壕至新立屯 1923年春—1925年8月

^① 《满铁史》，第130页。

新立屯至彰武 1926 年 4 月—1927 年 1 月

彰武至通辽 1927 年 1 月—1927 年 11 月 15 日^①

打通铁路所经过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只不过在黑山县芳山镇蛇盘山一段线路坡度较大。全线跨越较大的河流有八道河子、绕阳河、柳河，其中柳河大桥全长近千米。由章古台至巴胡塔一段 100 多华里为科尔沁草原。打通铁路线路区间各站站舍采用仿西欧式高大宏伟的建筑，至今有很多车站仍保留着原来的站舍，如秦家屯、八道壕、芳山镇、新立屯等站。为加强该铁路的运输能力，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还决定在彰武建立工务段和机务段等机构。1928 年 1 月，打通铁路正式开通后，每天约有 15 对客货列车通过。

张学良对打通铁路的施工与建设非常重视，1925 年 4 月 8 日，他借给孙烈臣送灵回乡安葬之机亲自到八道壕车站视察，受到筑路工人的隆重欢迎。虽然当时资金不足，设备短缺，困难重重，但是筑路官员与工人在张学良将军的爱国思想鼓舞下，很快就修完了打通铁路。

自 1925 年打通铁路正式开始修建以后，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又下令修建了昂齐（昂昂溪—齐齐哈尔）、齐克（齐齐哈尔—克山）、洮索（洮南—索伦）等铁路各线。截至 1931 年，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总计自建铁路 1560.7 公里。打通铁路修建完成后，在东北出现了以吉海、奉海与京奉铁路为支线，打通铁路为主的，连接郑家屯、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等地的两条与南满铁路竞争的干线。黑山、彰武、通辽、索伦等地附近几百里地的矿藏、木材、农村畜牧等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奉天等重要城镇。打通铁路全线通车后，使日本满铁管辖的南满铁路几乎处于停运状态。据当年奉天列车段的运转车长吴希臣回忆：“自打通铁路等干线

^① 《满洲四十年开发史》，第 198 页。

修建后，特别是1928年6月张学良将军亲自掌握东北军政大权以后，日本满铁铁路客货列车运输处于萧条冷落状况，特别是客车，在奉天很少有人坐，当时的老百姓反映乘满铁列车嘴巴子不保险，造成了满铁列车人少，而中国人自己经营的铁路客货列车运输比较兴旺，后来满铁列车因客流量少，就开始使用轻油车（即内燃1节列车）。”^①

张氏父子俩下令修建打通铁路，粉碎了日本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垄断东北铁路的阴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条铁路的修建对东北民族工业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① 王云鹏访问离休干部吴希臣记录。

张氏父子创建 八道壕煤矿与矿新民小学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与日本满铁大新公司对着干，于1919年12月下令投资50万元创建八道壕煤矿。1929年4月29日，张学良下令在八道壕煤矿创建新民小学。八道壕煤矿与新民小学的创建，对发展东北的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都有推动作用。

1919年，满铁大新公司独霸阜新新邱煤炭开采权之后，致使很多中国人在新邱一带开办的小煤窑和一些官办的小煤矿倒闭，造成了辽西一些中小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如新立屯、义县、锦州、京奉铁路等企业用煤极为紧张。因此张氏父子俩就创建八道壕煤矿，并派阎廷瑞为督办，雇用一名美国技师，在10名中国技术人员的陪同下到黑山县八道壕开矿，与满铁大新公司对着干。^①

八道壕煤矿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距黑山县城约20公里，海拔五六十米；矿区范围约10平方公里，储煤

^① 王云鹏访问魏清林记录。

分上中下三层；储量为 6000 万吨，煤质较差，仅供民用。从 1920 年 1 月正式开始钻井施工，经过两年左右，该矿先后建设了北风井、西直井、斜井、西大井四个井口。

为了更多地生产煤炭，并保证煤炭及时外运，张作霖于 1921 年 4 月亲自给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写信，大意是：现在奉省八道壕煤矿，由弟设法经营，但须修筑一条铁路以利运输等等^①。经交通部批准，张作霖下令修建虎壕铁路（打虎山—八道壕），全长约 25 公里。修建铁路所占用的土地，大部分是购置北镇县大地主李鸣歧的，每亩均按大洋 60 元付款，共购置土地 2500 亩左右，共花大洋 15 万块左右。^② 修建虎壕铁路所用的其它设备材料与器材均由京奉铁路有关部门负责，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该铁路于 1923 年 1 月正式通车。

1922 年 1 月 24 日，八道壕矿督办阎廷瑞为确保本矿经济独立不受外商干扰，向奉天矿务局提出申请，经张作霖批准决定在本矿实行便利券（即矿币，便利券分为伍角、贰角、壹角、伍分四种），计值奉小洋贰万元，准备全存储到兴业银行专供兑现，不流通市面，于国家金融无影响，因外人得此毫无所用。这种券的发行不但方便了工人群众，更主要的是控制了货币外流。

1924 年，张学良为了提高生产力，扩大再生产，建立各种福利事业配套设施，先后责成八道壕煤矿督办购买大量土地，将土地面积扩大到 4905 亩，并在新购置的土地上建一个电灯厂（即发电厂，高压输电线路为 3.5 万伏，低压照明为 110 伏），将煤炭转换成电能，输送到新立屯、芳山镇、打虎山、阜新、北镇等地。该电厂共配备两台大型锅炉和启罗华德大型发电机 2 台，一切大型设备均由外国进口。八道壕电灯厂的建立，不但减轻了

① 奉天省公署档案，第 3480 号。

② 奉天省公署档案，第 3874 号。

虎壕铁路运输的压力，同时还发展了东北电力工业。

在八道壕煤矿的煤炭生产及能源转换配套设备工程完成之后，北洋政府农商部于1924年12月给张学良发了矿照。根据矿照和有关资料记载，八道壕矿矿权者为张学良，矿督办阎廷瑞，矿机关办事人员共计29人，工程技术人员9人，全矿职工500多人，全矿有固定资产价值为奉小洋拾万零五千元，吨煤售价为奉小洋玖元，所办煤矿性质为商办，开采方法为西法，全矿占地面积4905亩，日产煤炭为200吨左右，月产煤炭6000吨左右。

张学良对八道煤矿的生产建设非常关心，曾亲自到该矿视察，受到全矿工人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不但重视民族煤炭工业的发展，而且他还很关心煤矿工人的文化教育事业。

1928年6月，张学良亲自掌握东北军政大权之后，锐意求新，励精图治，不仅革新政治，整军经武，而且重视教育，培育人才。他不但重视东北大学等高等教育工作，而且还非常重视东北的中小学教育，特别关心煤矿工人子弟的教育。张学良先后在东北办了多所新民小学，并给新民小学拨款。张学良为了办好八道壕煤矿新民小学和黑山、高山子新民小学，还亲自给当时的黑山县县长王如山（字俊峰）、教育所长王日宣（字祝三）写信督促办学。信称：

曠隔雅范，时切驰思。遥维兴居多祐，为无量颂，学良近鉴于奉省人民知识浅陋，而其原因，端在于教育之不普及。兹拟在各县酌设新民小学若干处，藉使失学儿童均有受教育机缘。唯是需款过多，决非一人财力所克担负，故拟将该小学等开办经费，如觅定校舍、购置桌凳等项，统请各县自行筹备，至经常费用一节，则由学良处按月发给之。^①

黑山县行政当局和八道壕矿督办接到此函后，当即聘请黑山

^① 《黑山文史资料》第6辑，第166页。

绅商各界知名人士组成新民小学筹备委员会。其成员有赵尊伍、韩嗣源、王化南、潘华国等 17 人，负责筹款，督定校址。经研究决定黑山新民小学设在黑山县城东南（即现在业余体校处），高山子新民小学设在高山子车站附近，八道壕煤矿新民小学设在八道壕矿附近。1929 年 8 月东北矿务局公函第 61 号称：“呈请张司令长官拨款兴办新民小学，并请补助长年经费，业蒙令准，领款开办在案”。后经张学良批准，八道壕矿新民小学于 1929 年正式成立（校舍为青砖瓦房 40 多间，设备齐全，堪称东北一流小学，占地面积 1 万多平方米）。该校所有教育经费开支均由张学良从八道壕煤矿建设费用中支出。经黑山县行政当局与八道壕矿督办研究决定，八道壕矿新民小学校长由黑山县知名人士梁宗鼎兼任，教育主任由石家村担任。

八道壕煤矿新民小学建校初期共有刘、那、褚等 10 位教职员，学生 160 多名。学制为初级小学 4 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该校设置了高级小学部五年级与六年级，全校学生达 300 多名。伪满时期该校成为日伪开展文化教育的小学校，解放后八道壕煤矿在新民小学基础上建立了八道壕煤矿子弟小学校。^① 八道壕煤矿新民小学的建立，为普及八道壕地区的小学教育，提高当地居民子女的文化素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不但在八道壕煤矿创办了新民小学，而且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还建了一个戏园子作为文化阵地，用来弘扬民族文化。

^① 王云鹏访问吴希臣等人记录。

张学良最喜欢张学思



张学良共有弟兄 8 人，姐妹 6 人。二弟学铭，三弟学曾，四弟学思，五弟学森，六弟学俊，七弟学英，八弟学铨。大姐冠英（字首芳），二妹怀英，三妹怀瞳，四妹怀卿，五妹怀曦，六妹怀敏。在这 14 位弟兄姐妹中，只有首芳、学良、学铭是一母所生。张学良最喜欢四弟学思。他在与各界人士谈话中曾多次谈及学思最有出息。

张学思（1916—1970）是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澍暘所生。许氏出生于河北宛平县一个乡村的铁匠之家。在她还小的时候家乡遭灾，父亲病故后，母亲带着她闯关东来到辽西新民县一个穷乡村里，靠给有钱人家缝补浆洗为生。当许澍暘长到 18 岁时，便被清军新民府统领张作霖相中，娶为四太太。许夫人在张作霖的六位夫人当中，可以说是家庭出身最贫寒的一位，她为人正直，教子有方。当张学思刚记事时，许夫人常对他说：“你和你三哥学曾都不要忘记你老爷家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风，吃喝

嫖赌，叫人看不起，说你们没出息。你们要那样，我就不活了……”她还经常对学思、学曾、怀曦说：“如果你父亲死了，张家的家业都是你们大哥和二哥的，不许你们去争，不要靠张家势力吃饭。”^①在张学思上小学的第一天，他的老师朱焕阶告诉他明天上学不许坐汽车，也不要穿绸缎衣服，要和别的同学一样穿普通的布质衣服。对朱老师讲的条件张学思没有一点反感，反而笑嘻嘻地都答应了。回家后他把老师讲的事与许夫人一说，许夫人非常高兴，就让裁缝给学思和怀曦做了普通的布衣服。第二天又改乘玻璃马车上学了。张学思在奉天省城第四小学读书期间，他的母亲许夫人还经常给老师打电话，询问学思在校读书的情况，并嘱咐老师：“若张学思在学校犯错误就打，希望不要姑息。”在学校老师与许夫人的教育下，张学思和张怀曦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均为优秀。许夫人对张学思的教育，为他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解放军将领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立下雄心壮志，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张学思小学毕业后，考入省城同泽中学，1931年初又转入北平汇文中学。1933年3月，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学思入党后，为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决心学习掌握军事本领，联络一些同学共同抗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学良讲了。张学良听后说：“好啊！四弟果然有出息。”后来张学良在张学思高中毕业后的1934年7月，就保送他进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即黄埔分校）预备班读书，翌年，转为步兵科正式学员。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团结同学，受到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表扬。张曾向张学良说：“张学思能吃苦耐劳，成

^① 《张作霖与他身边的女性》，第27页。

绩优良，是个出色的人才，很有培养前途。”张学良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和四弟同期的有何键的儿子与朱培德的弟弟，他们的纨绔之风很盛，又不听管束，而自己的弟弟则与其完全不同。他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器重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精明强干，勤奋好学，而且没有一点纨绔之气。我们张氏八兄弟，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些出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思被学校当局逮捕，一直关押到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那一天）。在张学思被释放的第二天，他专程到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去看望大哥张学良。这一天来看望张学良的各界知名人士很多，张学良几次想抽空和张学思说几句话，都没有机会。最后只好说：“今天我很忙，三两天我就要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当张学思再次前往鸡鸣寺看望大哥时，得到的消息却是张副司令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押到孔祥熙公馆了。张学思非常气愤，随即驾车前往孔公馆，看到是国民党宪兵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守护”孔家宅院，不让他进去。他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允许我见见我哥哥！”宪兵们回答：“这里无此人。”张学良听到四弟在院子里的吼声，便把住室的黑窗纱撩开，向学思摆手示意，要他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张学思呆呆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迫离开。张学良被幽禁之后，二弟学铭、三弟学曾均前往国外，惟有张学思为营救他大哥到处奔波（五弟、六弟、七弟、八弟当时还小）。1937年1月，张学思由军校毕业后，到东北军第53军任见习排长。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重新领导东北军进行抗日，学思听到这个传闻，立即决定去看望大哥。7月中旬，张学思去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看望张学良。他在雪窦寺住了五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特务们的监视下，在玩乐中度过。张学思到雪窦寺的第4天，突然风雨交加，吃过早饭后张学良对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

到书房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在忙着张罗同特务们玩牌的同时对他说：“你们弟兄去吧，我们在这玩玩。”张氏兄弟趁机在书房里进行笔谈，张学思快速写着共产党的主张……抗战的形势……东北军的情况等等。张学良告诉张学思，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等等。最后张学良又告诉他，回去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他：“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张学思写了“你的话我一定照办！”。长时间的笔谈，在特务们的监视下被迫停止。这是张学思与张学良的最后一次见面。

张学思从雪窦寺回来，在东北军军政要员中，奔走呼号，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共同统率东北军抗日面努力奋斗。他先后找到了第67军军长吴克仁将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将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将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将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将军以及原东北的政界领导王树翰、刘尚清、莫德惠等。要他们给蒋介石写信，并请莫德惠和王树翰为代表去给蒋介石呈送释张的信函。可是莫、王到南京后，蒋竟拒绝接见。张学思为营救张学良，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通过营救活动，却使东北军的军政要员及全国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反动面目。

此后张学思联系东北进步青年，准备组织队伍进行抗日。1938年10月，张学思到了延安，不久即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党组织派他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二队（东北干部队）担任队长。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与东北干部队指导员高存信带领87名干部开赴冀中抗日前线。他带领的干部队伍被安排在冀中军区机关和抗日部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学思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

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 11 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建国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致死，享年 54 岁。1975 年 4 月 8 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 月 19 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面。

张学良支持刘长春 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第十届奥运会于1932年7月30日—8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37个国家或地区都派出了较为庞大的体育代表队参加这次盛会，唯有中国代表队只派刘长春1名运动员参赛。他是在张学良个人捐助8000元路费的前提下才赴美的。

1928年6月，张学良执政东北，展开东北新建设，其中对体育教育事业也特别重视。他下令投资25万元修建能容3万人的现代化体育场（今沈阳体育学院田径场）。^①第二年5月在这里主持召开第十届华北运动会。与此同时，他还下令设立了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专科，招收大批学生和体育教授。如吴蕴瑞（曾留学德国，解放后任上海体院院长）、宋君复（曾留学美国，解放后任北京体院副院长）、申国权等。还培养了刘长春等一些国内外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科设立后不久，东北大学就派出足球、篮球两个代表队，前往日本

^① 孙景悦、董慧云等：《张学良与辽宁教育》，第129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东京、大阪、京都等地进行友好比赛。

刘长春（1909—1983、大连市小平岛河口村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时开始到西沙河口大庙小学读书。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参加校内外举行的各项体育活动。他的足球、篮球、乒乓球水平等都不错，是个多面手，但是他最擅长的体育比赛项目要算是中短跑，每次比赛刘长春都是冠军，因此很多同学给他起了个“兔子腿”的绰号。1925年他考入旅顺第二中学，一年后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到一家玻璃厂当学徒工。在此期间，他坚持锻炼，把百米成绩提高到11秒。

1927年末，刘长春经人推荐开始进入东北大学预科班学习，后来他又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科。1929年5月，刘长春参加在沈阳举行的第十届华北运动会上，荣获中短跑比赛冠军，特别是他在百米决赛中创造了百米10秒8的全国最高纪录。同年10月，张学良将军在沈阳又亲自主办了中、日、德三国国际运动会。刘长春仅以一秒之差落于德国选手彦鲁特拉比尔之后，而战胜了另一名德国健将。在200米决赛中德国选手雄芝比曼以21秒6的成绩获第一名，刘长春以半步之差屈居第二，日本的著名运动员阿武、岗建次、吉冈隆德等完全被刘长春甩在后面。1930年，中国第四届运动会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辽宁队夺取了全国总分第一名。刘长春夺取了100米、200米、400米的冠军。从此刘长春的名字响彻中国体坛。九·一八事变后，刘长春回到家乡，在他回家的第二天开始，就受到日本特务监视盘查。他不愿当亡国奴，于是他就带着路费乘船逃往天津转赴北平上学去了（当时东北大学已经迁移到北平）。

1932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十届奥运会。当时伪“满洲国”的一些官员，为了表示出“满洲国”是所谓的日满亲善合法政权，决定选派代表参加这次奥运会，并在各报刊登出刘长春等人要回大连，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的报道。刘长春得知后极为气愤,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既不出兵收复东北,也不抵制日伪阴谋,反而宣布因经费不足,不选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奥运会。面对这种情况,刘长春等人找张学良联系,要求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张学良表示坚决支持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前往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并决定捐助8000元作路费。是年7月1日,张学良还将这一决定在东北大学体育系(即体育专科)毕业典礼大会上公开宣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体育界及其它各界爱国人士的志气。事后全国体协董事王正廷即派傅宝瑞秘密回大连找于希渭,约他赴上海与刘长春和其他人同赴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由于受日伪特务监视,无法脱身,只好称病在家,未能与刘长春同行。

在这种情况下,刘长春仍斗志不减,决定与教练宋君复同赴洛杉矶。7月2日,刘与宋从北平抵沪,当时全国各界的报刊争先刊登了这条消息。7月8日上午,刘、宋在上海几千名群众的欢送下,由上海码头乘船前往美国。经过20多天的海上颠簸,刘、宋于7月29日下午抵达洛杉矶。

在洛杉矶,刘长春于7月31日和8月2日分别参加100米预赛与200米预赛,由于他缺少一个多月的训练,只获小组第5名和第4名。刘长春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193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1934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等很多体育活动。在全面抗战时期,他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一直到东北解放后,他才获得新生,先后被安排在东北师范大学及大连工学院工作,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①

中国30年代的体坛名将刘长春,能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为国争光,这一光辉业绩应归功于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

^① 《大连文史》第1集,第84页。

杨扒皮誓死效忠张学良

①



杨扒皮（绰号）真名杨德新，1920年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1927年任东北军16旅39团上校团长，驻防黑山县新立屯，负责黑山、阜新、彰武三县的治安与防务。在此期间，他治军有方，不鱼肉百姓，不受贿，专门惩治土豪恶霸，一些歹人若被他抓住，不死也得扒层皮，故人称“杨扒皮。”

杨德新为官清正廉洁，誓死效忠张学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奉命率部开往关内，跟随张学良转战至冀、豫、皖、鄂、川、陕、甘、宁等地。1933年初，杨扒皮所部被编为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110师（师长何立中）629团（杨仍任团长）。1935年9月下旬，杨部某营营长陈镇藩，带领全营（5个连）在甘泉被红15军团围困起来。王以哲命令何立中带110师前去甘泉解围。该师行进至劳山时大部被红军全歼，在战斗中何立中负重伤毙命。杨扒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成此文。

皮，不愿当俘虏而自杀身亡。

杨扒皮，河北人，生于光绪年间。因家境贫寒，于民国初年到东北参加奉军。在历次战斗中英勇作战，多次立功受奖。1919年3月，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在校期间他有幸与张学良相识并结为好友。张与杨在学习军事科目上都很刻苦，同受讲武堂战术教官郭松龄之教导，决心做一个精忠报国的指挥官。杨的耿直刚正、胆大过人的气质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于是在1920年3月毕业后，张学良将杨留在自己身边担任尉级副官。

1920年春，杨德新在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担任旅长和参谋长的卫队旅担任张的副官。在历次战斗中，深入基层，身先士卒，指挥有方，经常受到张学良与郭松龄的表彰。

1926年末，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地处边里边外一带的黑山、阜新、彰武地区土匪横行，八道壕煤矿和正在修建的打通铁路经常受到土匪及地方邪恶势力的破坏，张作霖决定派一个团驻守在黑山县新立屯，维护这一带的治安与防务。可当时还未找到合适的人选。经张学良推荐，杨德新被任命为驻防新立屯的16旅39团上校团长。

1927年2月20日拂晓，杨德新奉命率部从奉天乘专列向打虎山、新立屯方向前进，到达新立屯车站时，受到该站站长和地方商贾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员的热烈欢迎。在欢迎的人群中惟独不见几位著名豪绅的人影。杨德新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他当即下令，明天在新立屯南大营召开社会各界有关代表会议，并要求几个著名绅士必须到会。

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只有商会的几个地方官员、一些秀才及小绅士到会。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些著名绅士仍然未到。新立屯商团团长向杨德新报告说：“杨团长，王四大人家里有事，五爷家里有事，柳四老爷、惠二老爷没在家……”杨一听，火冒三丈，上去抓住商团团长的脖领子，打他几个耳光，骂道：“他妈

拉个巴子的，我让你给排辈呢？我是奉大帅与少帅的命令前来率部驻防，我不管他是老爷还是孙子，是大人还是小人，是仗着县长还是仗着督军，明天都得来给我开会！”

22日上午，还没到8时，几个著名的绅士都提前来到会场。杨德新说：“社会各界的先生朋友们，我杨德新奉张大帅与张少帅的命令，率部来到新立屯驻防，恳请各界朋友多多帮忙与支持。可是在你们当中竟有几个地方绅士仗着有钱有势，请开会都不来。”“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有多大仗势，我杨德新也不怕，我是张大帅派来的，我曾当过少帅的高级副官，谁要再敢和我作对，我非收拾他不可。”几个绅士见杨德新不听邪，谁也不惧，就都连连点头说：“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办。”自从这次会议之后，几个仗势的士绅都感到杨团长这人很难斗，心里有些惧怕。

杨德新到新立屯驻防后，首先加强了对全团官兵的军容风纪教育，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新立屯城内外及附近方圆几百里区域内社会秩序的维护，并要各级官员及时通报匪情，部队准备随时出发围剿土匪。

一天上午，杨的卫兵来向他报告：“杨团长，有个饭馆的掌柜，前来告状，说咱们一个士兵吃了他的切糕没给钱。”杨问：“真有此事，快请他进来。”时间不长，那个掌柜来到团部，杨问他贵姓，他说：“姓张”。然后杨德新又问，你是否认识那个吃切糕的士兵？他说：“见面保证认识。”杨非常严肃地说：“张掌柜的，你可别诬陷好人。如果没有此事，你可要负责，否则扒你的皮。”张掌柜一听这话忙说：“杨团长，小人绝对不撒谎。”他刚说到这，杨团长对传令兵说：“传我的令，全团官兵立即集合！”部队集合完毕，杨团长带着张掌柜对士兵辨认。时间不长，张掌柜说：“就是他。”于是杨团长命令那个士兵出列。杨问，你是吃切糕没给钱吗？那个士兵说：“我没吃他的切糕。”杨转过身来又

问张掌柜的：“你敢保证是他吗？”张说：“敢保证。”这时杨德新杀气腾腾地对卫兵说：“把他的肚子（即胃）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切糕。”话音刚落，张掌柜很紧张地说：“杨团长，切糕钱我不要了，你也别杀他了。”这时杨德新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我非看看他是违反军纪吃切糕不给钱，还是你陷害好人。”他命令卫兵用刺刀挑开了这个士兵的肚子，然后把胃挑开，果然见胃里有切糕。杨团长见此情景，立即从兜里掏出几张奉票，对张掌柜说：“算我对部下教育不够，你把钱收下吧。”这时张已吓得脸色煞白，手直哆嗦，还不敢不收钱，接钱后慌忙走开。接着杨德新在操场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弟兄们，我们是张大帅的军队，是军人就得有铁的纪律，以后谁要再吃老百姓的东西不给钱，我就扒了他的皮。”从此以后清官“杨扒皮”的外号就传出去了。

杨扒皮不但对士兵要求严格，而且对一些当官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天杨扒皮带着卫队，穿着便衣在城内视察，正遇上有一个士兵给一个连长行军礼，这个连长头没抬眼没睁。杨扒皮火了，上去把那个连长叫住，打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令他跪在地上，让几个卫兵用皮带抽打。杨扒皮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当军官的不懂军礼，连礼都不还，这叫欺侮士兵，给我打！”十几分钟后，杨扒皮带着卫兵走了，可这个连长跪在地上还不敢起来，直到团参谋长讲情，杨才亲自下令让他起来。

杨扒皮对别人要求严格，他对自己也是如此。在一次训练中，他举执刀礼，没有按要求去做，执刀方法错了。于是他就把刀插在地上脱下军服，把军服搭在军刀上，然后跪在地下请罪。几个营长前来拉他，他说：“我有错不罚自己，你们犯军规，我怎么处罚你们呢？”因此，全团官兵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带领下，军纪非常严明。

杨扒皮有一个座右铭，即是“孔曰杀身成仁，孟云舍身取义，则国家大治矣；文官悉不爱财，武官皆不怕死，则天下太平

矣。”他把这些话写成对联挂在团部大门口两边，让大家学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死、不贪污腐化、不行贿受贿，舍身取义，敢做敢为，不惧权贵，好打抱不平。

在新立屯城内，杨扒皮经常穿着便衣，带着卫队巡视，他什么事都管。凡是做买卖的人如有缺斤少两者，他就让卫兵把秤杆子给撅了。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的，他就把斗给你砸了，休想再开业。有一个姓冷的小贩卖糖时边走边叫卖，1角钱买5块，搭5块，奉送5块，回头再给5块。他这些话被杨扒皮听见了，杨问他：“1角钱到底给几块？”冷答：“20块”。杨又问给20块是赔还是挣？”冷答：“挣钱。”杨当时就训他，做买卖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啰嗦个什么，看你还像个人样吗！”新立屯街内的市场经他整顿，秩序大为改观。

杨扒皮在街上巡视时，若遇见有留分头穿西服很阔气的，他就问你是做什么的？对方答说是做事的，他就点点头。一次他遇见一个农民留着分头，杨问他：“先生你是做什么的？”这个人说：“我是西边外的庄稼人。”杨一听这话就骂道：“庄稼人不像庄稼人，买卖人不像买卖人，在外做事的不像做事的，你是个二流子，不是好东西，庄稼人都剃光头，看谁像你？”说着就把他拉到剃头房，给剃了光头。

新立屯是方圆几百里的贸易中心地，有一个较大的交易市场。每逢一、四、七为集市，杨团长经常穿着便衣去视察市场治安秩序。到新立屯半年后他观察到一个40多岁的农民每逢集上都挑一担柴禾来卖，而后用卖柴禾钱称几斤肉带回去，集集如此。杨扒皮怀疑这人好吃懒做，就让卫兵把他叫来，问他什么地方人，为什么集集卖了柴禾买肉，这个农民说：“杨团长，我家住西边外，离这十几里，我家很穷，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我没有钱给老妈买肉，所以只好卖柴禾。”杨扒皮一听这话就说：“照你这么一说，你是个孝子了？”于是杨扒皮放他回去，并派两

个卫兵到他家去看个究竟。待卫兵回来向杨汇报，说情况属实，杨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快给他送半拉猪、两袋白面奖励奖励这个大孝子。”这两个卫兵用马驮着肉和白面奔向西边外。

每逢佳节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给杨扒皮送礼物，他一律拒绝。有一次新立屯立德堂（东北第二号地主）四大人王介潘派管事的给杨送礼，杨不在家，他夫人即问有杨团长的收条吗？管事的说“没有。”杨夫人说：“那可不敢收，快抬回去，快抬回去！”

杨扒皮还经常带数十人的便衣队走乡串户，了解民情和匪情。一天傍晚，杨来到西边外一个村头的两间破房外，只听一个女人对她男人说：“小米粥怎么煮的这么稀，清水清汤的？”那男的说：“这还清，再清也没有杨扒皮清。”杨听后敲门而入，这家人以为出了什么祸事，心里直害怕。杨安慰了他们夫妻俩并给他们一些钱，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杨团长在新立屯政绩突出，声誉颇好，张学良多次派他的部将荣臻、缪徵流到新立屯视察军务及剿匪治安情况，他们认为杨德新是东北军中较为著名的团级指挥官。1928年初春的一天，张学良又派荣臻等到新立屯视察。杨扒皮在欢迎各界民众及全体官兵时说：“咱们都是吃张大帅俸禄的官兵，你们是大帅的兵，我是大帅的团长，我还曾给少帅当过高级副官。因此，我希望全团官兵，精诚团结，维护好我们防区内的治安秩序，坚决铲除土豪、恶霸，剿尽土匪，使这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安居乐业……”

1929年深秋，新立屯城内唐光举家炮手被土匪打死，唐的外甥被绑了票。案发后新立屯商务会立即报告了杨扒皮。杨听后感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抢劫杀人，这还了得……”于是亲自带领卫兵化装侦察，得知匪首躲在朝北营子商务会长郑老佐家。他立即将郑和匪首抓住，押至新立屯准备枪毙，这时社会各界人物都来为郑说情。可杨却哈哈大笑，说：“就是皇上二大爷说情也没用，谁也保不了……”后来郑家人，

又托人到奉天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那里请她说情，寿亲自给杨写一封信，杨见后说道：“我杨德新就听张学良的，别人谁说也不行。”后来杨扒皮派人把郑押到黑山枪毙了。枪毙了郑老佐，打击了地方黑势力，使方圆几百里的治安秩序好多了。可是还有人敢和杨扒皮做对，这就是新立屯张海鹏公馆（张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当时任洮辽镇守使主任）里的家人和张海鹏的四子张四虎子（张俊武）。一次杨带着卫兵去浴池洗澡，见张四虎子的两个家人给他散布流言蜚语，即令卫兵将这两个人押回团部审讯，得知他们都有通匪的罪恶，就以通匪罪，将其游街示众。张四虎子，气得在家大吵大闹，说是在新立屯被撅了光棍，无脸做人了。仗着父亲与张作霖的关系，公开招兵买马，落草为寇，誓与杨扒皮作对，张学良立即命令杨率部追剿。打败了张四虎子的队伍，张海鹏得知此情后，就对张学良怀恨在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很快就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当上了伪边防保安总司令，成为有名的汉奸。

张学良大义灭亲



张学良大义灭亲，下令枪毙充当汉奸的堂弟张学成。

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清末宣统年间在黑山县任警察队长时剿匪阵亡）的长子。其父死后，他与胞弟学文及三个妹妹均由张作霖抚养成人。曾任张作霖的卫队营长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师长等职。1928年6月，张学良执政东北，张学成开始怀有亲日倒兄的野心，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关东军司令部，对他说：“日军进攻东北原无侵占中国东北之意，本意促使张学良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可是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目为仇，现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辽西的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你做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在本庄繁的拉拢下，张学成接受了“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之职。

张学成当上自卫军总司令后，大肆

招兵买马，设司令部于黑山县高山子附近，扩充了 4000 多人，下设 8 个支队 18 个旅，以滥发委任状的方式拉拢收编胡匪，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扬言“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

张学成以日本关东军为靠山，又依仗着是张学良的堂弟，对驻守辽西的东北军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当时在锦州军政两署任职的米春霖、荣臻等人碍于他是张学良的堂弟，觉得很难处理。而身为辽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力排众议，明确指出：“谁投降日本做汉奸，就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做汉奸的。”^① 随后黄显声给张学良拍电报请示如何处置张学成投日当汉奸一事。张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给黄显声等人，命令他们派军队全歼张学成所部伪军。于是黄派熊飞等率公安骑兵部队于 11 月中旬前往高山子围剿。高山子一战，张学成和日本顾问等一伙日伪官员被击毙，并生擒伪军官多人。

张学成伪军的被消灭，鼓舞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志，日军暂时放弃了进攻辽西的计划。

^① 《九一八抗战史》，第 99 页。

张学良参加孙烈臣葬礼



孙烈臣（1872—1924），奉天黑山县城北老河身屯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5岁丧父，与孀母裴氏相依为命，年轻时曾给新立屯王家等有钱大户充当护院炮手，后来又参加清军，最终被编入张作霖麾下。由于他作战勇敢，先后被提拔为管带、统领等，成为张的得力助手。1919年，经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保荐，兼署省长孙烈臣被任命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官至陆军上将。1921年后，他先后任吉林督军、吉海护路军总司令等职。孙烈臣跟随张作霖转战近20年，屡立战功，堪称奉军著名将领。1924年病故于吉林官邸，终年52岁。

孙烈臣病故后，张作霖、张学良、汤玉麟等奉军将领都纷纷前往吉林省府官邸给孙吊唁。根据孙的遗嘱及亲友的意见，决定先将孙的遗体运回奉天小北门孙烈臣公馆，把棺椁丘起来，一年后再安葬。

孙烈臣的灵柩运回奉天孙公馆，由张作霖、张学良、汤玉麟、张作相等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立即请风水先生到老河

身屯选择阴宅。经过慎重考虑，再加上各级有关人员推荐，决定请两个南方著名风水先生在老河身屯附近选址，最后经过商讨，才确定孙烈臣之墓地定在老河身屯东韭菜池子村。

在打墓时挖出两块茶碗大的河卵石，被风水先生说成是凤蛋，后来孙家亲友将这两块河卵石拿到奉天当做宝物。经过一年的修建，孙烈臣坟地已建成了功德碑、石牌坊等宏伟建筑，还栽上了几百棵十几年生的松柏。张学良对孙烈臣陵园的修建非常关心，经常过问此事。1924年夏秋之季，张学良曾利用视察八道壕煤矿之机顺便前往孙的陵园察看建筑情况，并督促修建陵园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将坟地的所有建筑修好。

1925年初，治丧委员会决定4月5日从奉天小北门孙烈臣公馆起灵。一切殡葬仪式完全按清朝末年的丧葬仪式办理。

在起灵前几天，从小北门到奉天北站仅10里左右就搭了三个祭棚，在火车车厢上，在八道壕车站和老河身屯韭菜池子墓地也搭好了祭棚。是日清晨，庞大的出殡队伍从孙烈臣公馆出发。行驶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由两个人拉着用纸扎的开路鬼（纸人站在木箱上，下面有四个轮子），然后依次是手举铭旗和开道锣的队伍。在队伍的后面是由80杠（即80人）抬的楠木棺槨，其后是奏哀乐的军乐队和鼓乐队及喇嘛念经的队伍，再往后就是长达一里多地的纸牛、纸马、金山、银山、万民衣、万民伞、整猪、整羊等祭品，最后是孙烈臣的亲友所乘的小车子（马拉的小车）和张学良、汤玉麟、吴俊升、朱庆澜等人骑马的队伍。每到祭棚都举行追悼仪式，路祭仪式时间的长短是根据路程和阴阳先生择时辰而定。根据孙烈臣的侄儿孙宪章回忆，当年给孙烈臣送殡的路祭活动，从小北门至北站就走了3天（每天祭毕送葬的大部分人员回去休息，待第二天清晨再回到祭棚，排着队伍继续送葬）。8日晨，孙烈臣的灵柩被抬上火车，几百人的送葬队伍也上了火车，当日下午给孙烈臣送葬的专列准时到达京奉铁路支线

虎壕铁路八道壕车站。在车站祭棚又举行了追悼仪式。当晚张学良、吴俊升等下榻于八道壕矿督办公署。

9日上午，送殡队伍从八道壕车站祭棚出发，经过20里地的跋涉顺利到达韭菜池子墓地。在陵园，张学良、张作霖、汤玉麟、朱庆澜等主持了追悼大会，并致简短的悼词，以示哀悼。然后将孙烈臣的棺椁下葬，孙的家眷与受孙栽培过的将校军官跪在地上边哭边朝着孙的灵柩三叩头。在哀乐与众人的哭声中，孙烈臣的灵柩下葬了。

奉军名将孙烈臣，虽然已经作古70多年了，但是张学良参加孙烈臣葬礼一事至今在孙烈臣家乡流传。

张学良罚乘警背尸骨

①



1930年11月17日，张学良带领警务处长黄显声、卫队统带刘多荃、侍卫副官谭海等随行人员乘专车赴南京。当列车行至京奉铁路兴隆店车站等候会车时，正赶上从山海关开往奉天的客车在该站停留。列车刚停稳，乘警从车上推下一个旅客，上去就打，顷刻间站台上围观的群众就达近百人。在专车内的张学良见此情景，立即派谭副官前去问个究竟。谭到围观者跟前，大声呵斥道：“快躲开，让我进去。”在场的人，赶紧闪开一条道。他见乘警正用皮带打那个旅客。就问那个乘警是怎么回事。乘警说：“这小子背着死人骨头坐火车，被我发现了，让他下车他不下。”被打的旅客见眼前来了一个军官，就跪在地上壮着胆子哭诉说：“长官，我背的尸骨是我兄弟。六年前我们哥俩都给大帅当兵，第二次直奉交战时，我兄弟死在九门口前线，可怜他死得太年轻了，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我不忍心将他的尸骨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成此文。

扔在千里以外，就到九门口把他的尸骨背回来了。我问铁路上的人，给不给邮尸骨，他们说：‘你这个穷小子还邮什么尸骨，穷骨头还值钱吗？快扔了吧。’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偷偷地将尸骨背上了车，到车上提心吊胆地坐过了高台山，没想到快要到家了，却被他发现，非逼我下车不可，还把我打了一顿，长官快给我求情吧！”话音刚落，那个乘警骂道：“你再说，我还打你，快滚蛋吧！”

谭副官查清情况后，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一听事情经过，就非常气愤地对谭说：“牺牲在九门口的人，都是我的部下，这个警察欺人太甚，我也下车，快把那个背尸骨的和乘警都叫来，告诉车站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开车。”张学良下车到站台上，谭副官把他们俩都叫来了。那个背尸骨的旅客一见张学良的着装和专车，到近前仔细一瞧，跪在地上就喊：“张副司令啊，你给我做主啊，我兄弟是给大帅当兵打仗死的。”张学良上前赶忙把他扶起，含着热泪说：“咱们都是东北军的弟兄，快起来吧。”接着又问他姓什么，家住什么地方。”背尸骨的人说：“我姓王，家住奉天古城子。”张见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就严厉地指责那个乘警：“你为什么随便打人，不知道他背的那个忠骨是当年东北军功臣的尸骨吗？你们铁路邮不让邮，背还不让背，这是什么道理？”那个乘警吓得满脸淌汗，哆哆嗦嗦地说：“张副司令我有罪，有罪。”谭副官接着张学良的话茬，训斥那个乘警：“你敢随便动手打人，那好，我罚你把这个尸骨给背到他家坟地里埋上，稍有差错撤你的职不算，还得治你的罪，听见没有？”乘警连连点头说：“是，我保证做到”，并顺手从那位旅客手中接过尸骨背在身上。那个姓王的旅客给少帅鞠了一躬说：“谢谢张副司令，我终身不忘张副司令的大恩大德呀。”说完他就上车走了。张学良这才放心地上了专车。

后来张学良给京奉铁路局下了令，以后不论是谁的尸骨，只

要是包装好都必须给邮。他又责成副官向铁路巡警过问此事的处理情况。果然那个乘警一直把尸骨背到古城子。那个旅客让他回去吧，他也不敢走，直到把尸骨埋上为止。

张学良罚乘警背尸骨的事传出去以后，很多东北的老百姓都说：“张学良不但是一位爱国将领，而且是一位体贴民情、关心老百姓的军人。”

张学良创办少帅矿^①



70多年前，在辽西阜新这块蕴藏着乌金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围绕煤炭的开采和建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年张氏父子，为发展民族煤炭工业，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阜新煤炭资源，决定在阜新建设自己的煤矿，即东北矿务局孙家湾煤矿（亦称少帅矿，又称少帅窑）。

阜新煤田位于辽西医巫闾山和努鲁儿虎山余脉之间的狭长盆地。1897年，穷棒子沟村有一个牧羊人，在山上发现经洪水冲刷而暴露地面的几块露头煤（当时叫渣子），一经传出就有许多群众用最简易的挖坑刨煤的采挖方法来开采。有的人还用采挖来的煤换些其它用品。

不久，一些有钱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发家致富之路，就立即投资开窑挖煤。先后建成的有：朝阳人徐泉开采的成贵窑，阜新县桑苏营子水泉人齐文仲开采的兴顺窑。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成此文。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了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特权，并霸占了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还强行在中国修建了安奉铁路（安东—奉天）和其它铁路等支线。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日本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经营铁路，实际上是以铁路矿山为中心，对中国的林产、农产、土特产和其它矿藏进行掠夺，对我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侵略。“满铁”受日本内阁和外务省、陆军等管理和监督，被日本帝国主义称为“满铁王国”。“满铁”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还与关东军勾结在一起，设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即特务部），派出大批日本特务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

日本特务土居秀男，就是日本关东军和“满铁”派出的特务班长，人称阜新通。他大约是在1912年被派到新立屯的，以行医为名，到处公开进行特务活动，1914年初，他将很多中国人在阜新开煤窑的情况汇报给“满铁”。

“满铁”得知这个情况后，就责令日本大仓喜八郎公司财阀来开采阜新煤炭资源。大仓公司又派大日方一辅技师来勘探煤田情况，当大日方一辅一行三人从新立屯骑马向阜新行进时，在距新邱20公里的大巴苇子沟村附近，遇上一个穿便衣骑马的绿林英雄，名叫张凤义。大日方一辅问：“老乡，我们的，阜新开矿的去。”张凤义问：“太君，干啥去？”大日方一辅回答：“我们的，煤田的勘测，你的道路的清不清楚？”张凤义一听要在阜新找矿，心想小鬼子竟想侵略中国。他就指着八道河子的方向说：“往西边走。”说完他就飞奔而去。刚走出五六十米远，只见张凤义啪地一枪，大日方一辅应声死于马下。驻军两个随行者还了两枪，可是张凤义早已跑得很远了。他们驮着大日方一辅的尸体，返回新立屯，向28师55旅旅长张海鹏报告了事情经过。张旅长只答应尽力捉拿凶手，妥善处理此事。

就大日方一辅被打死一事，大仓公司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

抗议，并要求发给抚恤金 3 万元，腐败的北洋政府后来做了变通，同意日本大仓公司在阜新开矿，使日本达到了垄断开采的预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仓公司利用汉奸刘海轩收买土地，扩大势力范围。刘海轩 1903 年曾在新邱地区创办了“九成窑”，经营过永盛煤矿，后来投靠大仓公司。刘海轩利用金钱引诱王爷云丹桑卜和王府的官员杜力加卜。通过他们的权势威胁当地的地主齐寡妇，迫使将其东至大岗，西至长营子，北至朱家洼子，南到新邱的 3000 多垧土地，全部廉价卖给大仓公司，致使一些中国人开的小煤窑和一些中国官办的小煤矿立即倒闭。大仓公司取得阜新新邱煤炭开采权后不久，该公司又将煤炭的开采权转交给满铁大新公司。

满铁大新公司独霸阜新煤田后，致使辽西一些中小工业、手工业，如新立屯、义县、锦州、京奉铁路等企业用煤极为紧张。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满铁独霸阜新、新邱煤田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许多爱国志士和爱国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后期，在爱国志士的支持下，在阜新念私塾的学生和阜新在北京念书的返乡学生 100 多人，一起来到大新公司门前游行，张贴标语，高呼“日本要灭东三省，同胞们赶快觉醒，还我煤矿，满铁大新公司从新邱滚出去！”大新公司的几个日本人和刘海轩吓得藏了起来，不敢露面。阜新爱国学生的反帝运动给满铁大新公司以沉重打击。

事隔不久，汤玉麟的秘书盖敬臣和阜新著名绅士杨士元等联名上书给张作霖，要求驱除满铁在阜新建的大新公司，撤销他的开矿权，恢复自己开矿。盖敬臣与杨士元还亲自到奉天大帅府进谏。张作霖气愤地说：“他妈个巴子的，小鬼子真不像话，满铁还想霸占矿山，真他妈的不知足。好了，你们俩先回去吧，回去以后先发个告示，宣布谁也不许给鬼子卖命。否则别说我不客

气，我有办法治他们。”

盖敬臣、杨士元回来不久，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下令投资 50 万元成立一个益民矿务局（后改奉天矿务局，1926 年又改为东北矿务局），并派阎廷瑞为督办，雇用一名美国技师在十名中国技师的陪同下，先在黑山八道壕开矿，和满铁大新公司对着干。盖敬臣和杨士元等一些爱国志士又发了告示，转达张作霖的指示，谁也不许给鬼子卖命，否则决不客气；一些绿林好汉听说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就经常带着人马夜袭大新公司，使它几乎处于停产状态。大新公司的总经理刘海轩和几个日本人，经常带着 20 几个保镖到奉天、大连等地一些特务机构，东藏西躲不敢露面，同时又派人从中说和。采取了表面上和张作霖缓和矛盾，暗地里采取保存大新公司的架子，待机发动新的攻势，以便东山再起。

1924 年，张学良又亲自下令投资 40 万元，派王子文等人在阜新孙家湾等地筹备打井建矿，计划一年多投产。1926 年，张学良为了在东北发展民族工矿业，下令将八道壕、西安（辽源）孙家湾、海城大岭滑石矿、辑安宝马川金矿等企业合并组成东北矿务局，派苗乃实任东北矿务局孙家湾矿矿长，并引进外国机械设备。1928 年 6 月，张学良亲自掌握东北军政大权以后，对发展阜新的民族煤炭工业更为重视。他亲自决定对孙家湾煤矿投资 120 万元，并派于凤至到阜新视察孙家湾煤矿的煤炭生产情况，受到工人们的热烈的欢迎，致此使煤炭产量大增。

孙家湾矿日产原煤 60 吨左右，年产量为 21000 多吨，全矿有工人 400 人左右。所产煤炭的百分之八十全部雇用 50 多台 7 套大马车，经大巴沟山道、大板、官营子、白厂门运往八道壕和打虎门，然后再装上火车运往奉天各地。

孙家湾矿建立以后，在辽西一代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少帅建矿对着干，满铁大新完了蛋。少帅建矿不怕难，东北工业得发展。

张学良支持北平青年 赴西北考察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就主张实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战略方针，在舆论上曾坚决支持很多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初的一天，张学良将军曾给由王钧（王静民）领导的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题词：“不到西北，不知西北的伟大，予导此行之不虚也。”与此同时，他给考察团200块大洋，作为赴西北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支持下，王钧带领的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在西安、咸阳、长武等很多城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对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钧（1906—1995），辽宁开原县人，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26年7月到广州经同乡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返回东北，翌年经奉天东三省交涉署官员沈祖同介绍，考入比利时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在东北军吉林省防军中任少校军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蒋介石

的不抵抗命令撤往关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张学良一面执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一面又对爱国军民自发的抗日斗争表示支持。1931年9月22日，他令警务处长黄显声在辽宁地区组织抗日义勇军。根据这一命令，黄显声指出：“凡能举义抗日的民众武装领导人，皆授以相应的军职军衔”“率武装100人以上者，以上尉待之；率武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少校营长；率武装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黄显声组建辽宁义勇军的命令下达后，辽宁各地的各界爱国志士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吉林、黑龙江的各界爱国志士也先后组建起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王之佑、王钧等人在吉林延寿县组织的义勇军（抗日自卫团），几个月内很快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抗日自卫团在延寿县一带到处袭击日伪小股部队，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1932年末，日伪军出动几千人，对这支武装进行围剿。当王之佑叛变投敌后，这支队伍就由王钧等人负责指挥，继续坚持战斗。

1933年春，日伪军出动1000多人在20多辆坦克的配合下，进攻延寿县抗日自卫团。因各地义勇军在战略上不能互相配合，导致延寿县抗日自卫团在强敌面前溃散。王钧只带领几十号人，由吉东向辽北、辽西、热河转移，于1933年夏到北平。他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王钧与东北大学学生取得了联系，经常带领一些人，深入街头巷尾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深入人心。东北老乡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春，王钧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唤起千百万民众共同抗日他和进步青年吴伟着手组织以考察为名的北平

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在考察团成立会上，王钧发表了演讲：“受苦受难的同胞们，东北军在南京国民政府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下撤往关内，使我们东北的三千多万苦难同胞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我们要抗战，要团结所有的抗日力量，特别是，我们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弟兄们宣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道理。可是现在东北军、西北军究竟愿意不愿意抗战，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先以考察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名，去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大会选举王钧和吴伟为团长与副团长。临行前，他们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26人中，大部分都是东北青年，他们纷纷表态：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抗日到底，并在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的大旗上签了字。

1936年6月初，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全体队员从北平车站乘车，经过三四天的昼夜兼程到了西安。在西安，他们一下火车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大旗直奔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王钧把他亲笔写给张学良将军的信，递给卫队副官，要求转给张学良。信的内容是：

张副司令钧鉴：

于北平流亡之东北青年，今组成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来西北考察西北之政治、经济、文化等。急需见张副司令……

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团长王钧顿首

中华民国25年6月1日

时间不长，王、吴等4人就受到张的接见，张学良非常热情地和代表们一边握手一边说：“咱们都是东北老乡，欢迎你们到大西北来考察。”王钧说：“张副司令，我们到西北来，名义上是考察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上是向在西北的东北老乡宣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恳请张副司令给予大力支

持”。张说：“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咱们都是东北人，我坚决支持你们在西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当即顺手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不到西北，不知西北的伟大，予导此行之不虚也”的题词。代表们对张学良将军的热情接待与支持深受感动，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张将军的期望，在大西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随后张又委派他的副官王子山将考察团安排在西北旅馆并赠给考察团 200 块大洋，作为在西北考察的经费。

在西北旅馆，王钧、吴伟等代表向考察团的全体同志们介绍了张学良将军热情接待代表的情况与坚决支持考察团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大家还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态度。根据张学良的表态和题词，大家一致认为：“张副司令之所以说，不到西北，不知西北的伟大，就在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在西北已初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联合局面，看来西北将会成为抗战的可靠后方基地。我们西北之行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第二天，他们打着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的大旗和张学良给他们的题词，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东北军、西北军及各界群众的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不满，一些特务还跟踪捣乱，扬言：“这是同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唱对台戏，简直是替共产党做宣传。”面对特务们的无耻谰言，考察团的成员们据理力争，驳得特务们哑口无言。王钧在发表演讲时严肃指出：“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们，西安各界民众们，流亡在外的东北老乡们，我们是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是专门来大西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考察的，同时也是来宣传抗日救国的。同胞们！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大好河山已完全沦陷，三千万骨肉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扩大侵华战争，随时准备向华北进犯。同胞们，东北军、西北军的弟兄们，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特别

是东北军的弟兄和东北老乡们，你们的父母、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们都在东北受苦受难，生活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这时王钧领头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在场的官兵和群众与考察团的成员们也跟着唱了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悲愤的歌声使很多官兵和群众都泪流满面。此时正值几个国民党特务窜到会场气势汹汹地说：“大家快散开，不要听他们搞赤色宣传。”面对特务们的捣乱，王钧和吴伟等人你一言，他一语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是爱国青年，是爱国的老百姓。”接着王钧又指问那几个特务：“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得联合起来抗日。”这时吴伟领头高呼：“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在场的官兵与群众也跟着高呼。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特务见抓不到什么把柄，又见考察团还拿着张学良的题词，在几百人愤怒的口号声中灰溜溜地逃跑了。

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在西安街头巷尾演讲 10 天后，就向兰州方向挺进，一路上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很多人都纷纷捐款资助他们的抗日演讲活动。7 月初的一天，当考察团行进至长武县城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拦，强令他们立即解散。全体同志在王钧、吴伟的带领下进行了说理斗争。国民党特务在长武县警察局警察的配合下，将全体团员押送到县警察局看守所审问。他们在看守所拘留期间，个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个特务审问王钧：“你们到西北来进行考察的目的是什么？”王答：“是为了到西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又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以考察为名宣传抗日救国，而不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王答：“我们的家乡东北都被日本霸占了。”特务问：“你们是共产党吗？”王答：“我们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抗日救国。”这些特务后来又对王钧、吴伟等人进行了多

次审问，并搜查他们的所有证件，但是最终也没抓到一点证明他们是共产党人的证据。特务们恼羞成怒，把考察团的旗帜和张学良给他们的题词撕碎，扔在火炉里烧了。并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考察团全体成员监押起来。

但是，长武县县长与警察局的官员们，知道此案关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张学良、杨虎城这两派人物，遂深感得罪不起，再加上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大联合的局面，就连他们自己对红军在长武的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都想给自己留条退路，惟恐将来与己不利。因此在他们监押考察团3个月后，就托人将省党部特务在长武县监押北平青年赴西北考察团全体成员的事，转达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很气愤地说：“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都给我放了！”就这样，长武县警察局遵照张的指示，于1936年10月末将考察团全体成员以监押期满为由释放了。

考察团王钧经车向忱和郭维城介绍参加了东北军，在西北“剿总”总部第三科任少校军官。

其他20多人，有的参加了东北军，有的参加了红军，还有的回了家。卢沟桥事变后，考察团的大部分成员都奔赴了抗日战场，其中有些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学良与文物书画

①



张学良酷爱文物书画，善于鉴赏，多所收藏，珍品颇丰。1927年决定撤兵关外的時候，他在保定驻扎。有一天他和随从们到古董店浏览，店主看到这班贵客来临，忙着扫地倒茶，将密室里深藏的宝货，摩挲赞欢，罗列面前，在黑暗中，倒显得五光十色，耳目为眩，水墨云山，古雅可爱。他鉴别金石书画真伪，眼力绝佳。用赝品施其欺骗故技，是蒙混不过的。他买得一座镂金塔，高有尺余，满刻梵文，确是西藏古物，卫士抱于街头，与太阳相映，射出灿烂金光，朗照远近，论价不过七十番。若在北京厂肆（即琉璃厂），不必说买，听也未曾听过，选择之精，可见一斑。这是因为兵荒马乱之际，古董行也打破居奇的老例，并不是张先生乘机取巧买贱货。他珍藏有王阳明先生仅存于世的山水墨画，去台后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他90寿辰时台湾故宫博物院曾精印此一墨画，分赠友人。1994年苏富比在台

① 参见王益知：《张学良外记》，第253、266页，香港南粤1989年出版社。

北举行春季拍卖会，卖出张将军收藏书画作品 207 件，总价值 1.3289 亿新台币。

当年金息侯到沈阳组织博物馆，三六桥（蒙古族，曾任奉天副都统），又把鉴别书画真伪的诀窍，详为说明，张学良触类旁通，鉴赏益精，搜集又富。密篋中四王吴恽不足为奇，宋元名迹，方称真品。金息侯看了他所收藏的书画和所临石田山水，曾题诗一首：

晋墨宋图元画谱，粗文细沉压明清。将军妙笔真天授，手创山河别样新。这虽不无夸张之处，而其藏品大有可观，确是事实。可见张学良不仅鉴赏字画，而且还可临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有一次，日本在东京举行中国古代书画展，方药雨、张贷杉、杨令弗携张藏品到日本参加展出，使日人大为垂涎。

张学良尽管善于鉴别书画真伪，但也有失足之时，表现在对张大千的“假作”上。20 年代末，张大千的仿石涛画已臻出神入化，几可乱真，令许多自命目中有神的鉴赏家相继上当，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他当年收买了不少石涛“真迹”，耗费巨资。京沪掀起石涛画热，张不甘落后，这些“真迹”大多出之张大千之手，当张知道真情之后，极愿结识张大千。有一次，张到沪借宴请沪上名流之际，也向张大千发出请帖。二人见面，张向众宾介绍：“诸位让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仿石涛画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在我收藏的古画中，就有不少是他的杰作。”张学良笑逐颜开，张大千却捏一把汗。事后张大千认为张学良这个人很知趣，从此不再轻易仿涛，而是师承古人，吸取传统绘画的精髓。

30 年代初，张大千在琉璃厂一家古画铺里，突然发现清代画家华岩作的一幅山水图，爱不释手，但因口袋空空，一下拿不出钱来，恳求店主将此画保留三天，不要卖给别人。第三天张揣

着从友人处借来的四百元大洋来到店里付款取画，不料店主尴尬地说：“此画已于昨天被张学良买去了。”张大千想，为了一张画能去和张学良打官司吗？笑话。

1935年10月，张大千偕友到西岳华山。当时驻节西安的张学良闻讯驱车前往张大千住处，请他作画。张到后略事休息，便铺陈纸墨，说“此次登山，颇有所感，就请作幅华山山水图吧！”画画好后，张大千把画拿到火炉边烘烤。就在这时，张学良讲了一个笑话，张大千只顾回头听，不小心，火舌舐上了画，顿时燃烧起来，而且燎着他的大胡子。张学良飞跃进来，手忙脚乱地将火扑灭，那张画也都烧毁了。张大千后来又作了一张《华山山水图》，在上款恭恭敬敬地题到：“汉卿先生方家正之。”张学良得到这幅山水精品，大喜过望，设宴招待张大千，并请出赵一荻小姐作陪，从此二张的友谊日益增进。

张大千返回台湾后，在台北举办了规模颇大的画展。事后他又送给张学良一幅巴西山水图。几天后，张大千乘机飞离台北时，忽见一人气喘吁吁奔进机场，将一个包裹递给张大千，说是张学良今早特地派他送来的。张拆开一看，原来是30年前张学良以600元从北京琉璃厂画商处“豪夺”的那幅华岩真迹山水图。

80年代初，张大千的数年力作《庐山图》完工，在台北举行特展后，因心脏病复发，溘然长逝，终年85岁。张学良闻此噩耗，如雷轰顶，匆匆忙忙赶来台北，而对老友遗容，恭恭敬敬地深深鞠了三个躬。

1928年，湖社与日本画家联合举办中日现代画家作品展览，上海、沈阳两地同时展出，张学良亲往致贺，与日名画家晤谈，并为月刊封面题“湖社”二字。七七事变爆发，《湖社》停办，社员走散。湖社乃由金城（字北楼）组建。他曾留学英国，学法律，善画山水，摹古尤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城用还中

国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组织中国画研究会。歿后，其子潜庵，继承遗志，改组为湖社，发行月刊，修契立约，吸收许多社员，社以“湖”为名，乃称“湖社”。正因为金城湖州人，号藕湖，其弟子关镜汀号镜湖，王雪涛号瓦湖。其近画家以湖名者尚有十人，号“十大湖”，标榜门户，自成一派。教授张学良子女书画的李五湖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湖社旧书画店在北京琉璃厂十字路口复业，正面高悬张学良所书“湖社”（由《湖社月刊》封面放大）横额，旁为张大千对联。引起游观者极大关注，交口称赞，翘盼及早归来，人心思“汉”，中外皆然。

张学良与京剧艺术



张学良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仅对文物、书画情有独钟，善于鉴赏，收藏颇丰，而且还喜欢京剧艺术与京韵大鼓，爱看，爱唱，评论优劣，也极在行。当年他在北京时，经常带着眷属、随从到中和剧场看戏。

1991年吕正操访美见张时，有一次张还问到裘盛戎、杜近芳等京剧名角的情况，说：“我回北京能否听杜近芳唱戏？”吕说可以安排，没有问题。吕为张祝寿，带去了京剧名角李维康的两盘录音带。寿诞那天，寿堂上挂的是启功撰写的张学良90生日时写给张捷迁的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播放的就是李维康的《玉堂春》。后经张学森从中安排，李维康、耿其昌夫妇，另有鼓师、琴师、舞美各一人，一同赴台演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看了他们演出6场中的5场，特别是在张学森家等处欢聚达8次之多，而每次少则一小时，多则几个钟头，聊啊，唱啊，犹如家人。

张将军和京剧名家的这般频频接触，不要说和大陆朋友，就是在台湾，亦属空前。耿其昌说，张将军可称得起“超级戏迷”。一见面就聊戏。说当年多次看过谭鑫培的戏，陈德霖是他的好友；至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更是他家的座上客，对旧时的梨园界如数家珍。他还说，当年的一位京剧名票友曾跟他说：“京戏嘛，你哼哼玩玩可以，别正经唱，因为你五音不全。”可他照唱不误，可见他对京剧的热爱不改初衷。

什么《空城计》、《坐楼杀惜》，只要他开个头，便一发面不可收，拦都拦不住。也怪，那些天，他唱，李、耿夫妻也唱，几次下来，张将军的调门准了，而且噪声也宏亮起来。更难得的是，他能看出并道出现今大陆京戏在唱腔方面的发展。在肯定的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李、耿：“过去老先生们的功夫是特别扎实的，你们可千万要学好基本功！”

李、耿对张的共同印象是，他有超乎常人的豁达、幽默。张将军喜欢说笑话，“段子”很多。说有位先生在别家打牌，边搓边说：“哼，有人说我怕老婆，胡扯。我在家里就是条老虎！”没想到他的夫人竟在身后，啪！拍了他一把，问：“你是老虎，我是啥？”这位先生脸色大变，赶忙说：“你是武松啊！”逗得在座的大笑不止。

可是当说起严肃问题时，将军判若两人。他说，当年东三省易帜之前，日本外相曾让他到满洲执政，这人能说会道，谈条件吧，一切细微处都考虑到了，“谦恭”地问张将军：“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尽可提出，一定照办！”此时的张将军冷起脸来说：“你考虑的比我考虑的周全多了，但你忘记了一点。”日本人忙问，是什么？张将军厉声斥他：“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听到这里，李、耿的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李、耿说，和张将军的这段接触无限珍贵，而他老人家的道德情操更是我们做人的方向。

1991年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会晤。将军虽已91岁高龄，但身体健朗，谈吐风趣。在吃饭时讲了许多笑话，逗得在座的客人不时捧腹大笑。有人提到其五弟张学森当年做票友串戏的往事时，张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位票友最爱唱戏，天天早上拿着大刀在树林里练功吊嗓子。一次，他突然看到有人挑着担子从他面前飞跑而过，马上追过去问：“别人都是听了我的戏才跑，你为什么不听我唱戏就跑？”那人说：“小弟是做生意的，看见你拿把刀，以为是劫道的，才赶紧逃跑。”这位票友讲：“你听我唱段戏就不杀你。”那人只好坐下来听戏，想不到刚听了一句，便爬起来磕头说：“大王，你还是把我杀了吧。”讲完故事，张将军指着张学森说：“你就是那个唱戏的。”顿时，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1993年4月，张学良在台湾观看大陆北京京剧团演出时，自告奋勇：“今天我也得过过戏瘾。”在锣鼓喧天、冠盖云集的台北中山堂，他坐在第一排，精神完全贯注在台上的表演之中，先是马派弟子张学津主演《遇龙酒馆》；压轴戏是谭派第四代传人谭元寿主演的《定军山》。他与场内1500名观众频频鼓掌。演员们看见张将军，演后顾不得卸装就纷纷跳到台下，竞相和他拍照。张学良乐得合不拢嘴，还念叨着：“当年我在北京常看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金少山老板的戏，和他们结成了朋友。”当天，台湾有关方面宴请剧团的几位主演，张也应邀出席。他拉住梅葆玥、梅葆玖姐弟两人的手回忆说，那年日本制造皇姑屯炸车事件，当天晚上，他正在请外国公使在财园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是手下人找到剧场报告消息的。……

席间，梅葆玖提议边吃边唱，听着两岸京剧同行各显神通的拿手好戏，张再也坐不住了，他向大家拱拱手说：“今天我也得过过戏瘾。”他健步走到正在操琴的姜凤山身旁说：“来段《战太平》，我的调门可高哩。”

姜凤山把京胡调高了调门，又是张学良将军开口一唱，是在

调门。姜凤山忙又调弦，忽然间，张学良先生又唱其高调门，弄得这位曾为梅兰芳先生操琴的京胡演奏大师一时手忙脚乱……

张将军唱完一段还觉不过瘾，便说：“再来段《斩马谲》。”于是，“帐下跪得小平王”。一段西皮快板响彻在大厅里。张唱罢连声向琴师道辛苦。

姜凤山感慨道：“难得呀，少帅 93 岁高龄了，戏词还记得真真切切，而且中气很足。我这个年迈占稀之人和他在一起，也顿觉年轻了许多。我有幸给张将军操琴，这可有历史意义啊。”

1996 年 7 月 13 日，杨连之先生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份特殊的寿礼”为题，报道张将军在夏威夷异常兴奋地度过 95 岁诞辰的盛况。当今颇受海内外戏迷喜爱的中国京剧院老生于魁智率该院琴师赵建华、鼓师苏广忠、旦角马小曼（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之女）飞抵夏威夷，让张学良将军过了一次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戏瘾。

正是张学良的亲友所期盼的这份特殊的寿礼——京剧，6 月 1 日晚上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张学良 95 寿诞酒会上引起异样的反响。张学良的女儿（已 80 岁）张闾瑛动情地说：“请来这么好的国剧艺人，能让家父过上几十年没有过的戏瘾，等家父 100 岁时，请大家别忘了再来呀！”全场热烈鼓掌。于魁智代表中国京剧院及此行的艺术家，向张学良赠送用中国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大幅“寿字图”，并当场演唱了传统京剧《上天台》。为了烘托寿宴气氛，他巧妙地把唱腔最后一句“又听得殿座下大放悲声”改为“准备下皇封宴庆功臣”。

板鼓一敲、胡琴一拉，一晚上没有几句话的张学良精神为之一振，洗耳恭听，手上还阵阵击节，当寿宴的程序接近尾声时，张将军随着京胡、板鼓的伴奏唱了起来，唱了京剧传统戏《失街亭》、《斩马谲》、《珠帘寨》的选段，不用话筒，有板有眼，颇有韵味。此时，晚上 5 点半开始的寿宴已近 5 个小时，张将军还兴

致未尽。

从6月1日到8日的几天中，张将军每天都沉浸在对京剧艺术的迷恋中。每天下午5点多，他准时来到约定的亲友家中，先听于魁智他们唱，随后自己开唱，几天下来嗓子越唱越好，调门越调越高。每天都唱到晚上近10点，不是赵一荻女士打来电话：“大爷该休息了！”他还不肯罢休。据家人讲，老先生有一天早上五点多钟就要起床，说是唱戏去。也许和张将军的戎马军旅生涯有关，他反复吟唱的一直是《失街亭》中的“两国交锋龙虎斗、《斩马谲》中的“火在心头难消恨”，还有《战太平》中的“叹英雄失势入罗网”。有一天，张对于魁智说：“你们不知道，其实她（赵一荻）唱得最好！”没想到，坎坷人生的伴侣还是京剧艺术的知音。

张学良的确是“超级京剧戏迷”。据说，将军百年诞辰，中国大陆还将组团赴美为他庆贺百岁大寿。



侵略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这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鲸吞我东三省后，1933年1月开始，又将侵略战火引向长城内外，这是它从局部侵华战争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1月3日下午2时，日军攻山海关；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开始进攻热河；3月4日，日军以128骑进入承德。汤玉麟用汽车队和骆驼队装满他的私人财物撤出承德，逃入天津英租界。万福麟部退入喜峰口。孙殿英部退入察北。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日军只用13天就占领了热河，随即转向长城各口。张学良原拟在热河支持三个月的计划落空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举国上下愤怒谴责国民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7日，张学良一面致电国民政府辞职，同时还想守长城一线，以挽危局，并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并下令缉拿汤玉麟。万福麟想回北平，张令万：

“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见我。”让王以哲守古北口，并想请求蒋介石补充些轻、重机枪与迫击炮。就在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准备反攻，不惜一切，收复热河，把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的关键时刻，他应宋子文邀请，与王卓然、汤国禎、端纳等人乘专车赴保定。张对王说，他见蒋是要商讨反攻热河计划，只要求蒋补充些武器弹药。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唾骂要好得多。人反正总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当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又合作了，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假抵抗，真谋和。

9日5时，张乘车抵保定车站，蒋未如约同时到达，宋子文电话通知张说，他先和张见面。10时，宋到保定，把蒋介石同意张辞职下野的意见告诉张，说譬如二人同在一小船上，风浪骤起，必须先有一人下船，可免同遭灭顶之灾。张告诉宋，当然我先下去，要蒋不必烦心。

下午4时，蒋介石到保定车站，张学良戎装恭迎，与宋子文同登蒋的专列。见面后，蒋首先对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转达你慨然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表示丢掉东北、热河他责无旁贷，免职可伸张纪律，振奋人心。还说：“我想日军必然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蒋只点头称是，不愿多谈，张即辞出。蒋、宋即到张的专车回拜，好言安慰了一番，并要张立即准备出洋，并留下宋子文与张商量善

后问题，自己已回到石家庄。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在返回北平的专车上伏枕大哭。端纳劝他要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大丈夫。王卓然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痛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张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王卓然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禎与贴身副官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想，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他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我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但你还在旁边跪着叩头？’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人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张对王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看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演双簧。”^①端纳仔细听着翻译后，也说了一个讽刺故事，他们彼此一笑。这时谭海进来报告：车已到西便门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王卓然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今全国政协大院），时已午夜12点。张下汽车时，王问张：“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张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

^① 《王卓然史料集》，第14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家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送给我。”王进屋翻阅参考书，查出原文。译文是：“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此时已是凌晨2时，张还在阅读文件。

张学良这位爱国爱民的年轻将军，在顾全大局，代蒋受过的同时，对蒋汪的屈辱外交表现了强烈的不满。3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谈了当时的心情：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很兴奋，“哪知到保定见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而已！”^①“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呢，唉哟，真是啼笑皆非！’”

^① 百戏是古代杂技，包括马术、幻术（魔术）在内。百，古音读若把，后讹书为把戏。至今京东有以百户为地名的，仍按古音，读作把户。



张学良谈国民政府 及其社会上的腐败

1990年6月，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他说：“当年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相当有好感。后来就不这样了。我当时看国民政府军队，有些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尤其在政治上，比那些政客、比原来的政治更腐败，有些地方还不如原来的政治。开始我还不这样看，后来到了南京，接触的越多、越深，越发现不满的地方。简单四个字，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争权夺利。”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他在1934年的多次讲话中，都说到这一问题。他说：“说起来救国家救民族，只有从自己做起，也就是要管好了自己之后，才能说救国，那么，难道要自己好还不容易吗？不容易。……因为今日中国之处境太恶劣了”。^①“假如你是个意志比较薄弱的人，很容易使你受打击，以致灰心、消极。尤其在今日社会几乎形成了

^① 《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67、168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一种风气，不止是不奖励好人，有时还真使做好人的出不了气，这种现象不一而足。张伯苓先生曾说过：‘好人在屋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这也可以说明今日社会不容许好人存在，而且好人难做的事实。”^①“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正因为有地位、有知识、有学问，所以做好事有能力，做坏事也有能力。譬如一个作文章的人，他只为一时的快意而信笔写作，出风头，弄点稿费。当他提笔的时候，毫未顾及说出这些话之后，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心有什么不良影响。就是一般作官吏的也绝不问他的贪污行为对于国家社会有怎样的危害。这是中国国势濒于如此危急，一般民众蒙受重大痛苦”的原因。^②

讲到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派系斗争时，张学良对某地的教育界人士说：“自身的派系之争，真是太无谓了。人类原来是应该斗争的，但是斗争要有斗争的意义和价值，绝不该只知从事于‘勇于私斗’怯于公敌的斗争。所以我说诸位尽可以充分的准备斗争的精神，所可惜的是自身派系之争毕竟是把斗争精神运用得太错了。”^③“斗争、反抗，都是推动一个时代必具的精神，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应有的美德，尤其是今日的中国人更应该养精蓄锐的准备未来的斗争、反抗。然而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认准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必须认清楚我们共同斗争的对象。譬如教育界自身的派系之争，那除了破坏自己的对外阵线和暴露自私自利的弱点之外，绝没有半点益处，真是何苦来！”^④“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话实在近乎情理，沙的本质是很坚硬的，可是他不能团结，就没有了力量，我们要把这些散沙团结得像铁桶一般，来挽回中国衰亡的厄运。”^⑤他说：“许多人心口不一，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第191、231、239、287页。1996年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

凡是口里说得非常冠冕堂皇，肚子里却肮脏不堪。遇着一桩事情，先打算与自己有没有利益，要是认为与自己没有利益，无论怎样容易，怎样有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要是与自己有利益，虽然特别艰难，或明知道妨害旁人，也要去做。于是大家的利害互相冲突，结果大家都受害，以致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这能说不是由狭义的自私引发的弊病吗？”^①“有人口里说忙，他却有功夫打麻将、吃花酒、抽大烟，以及和不相干的人拉关系、应酬，这也不是武断地胡说。我曾到过一县，有人说这个县城三千多个人家，有一千多个都抽鸦片烟。我觉得很惊奇，普通人家我不好进去调查，我专找公务员的家内去看看。看了许多家，真是没有一家没有烟具的。看了这种情形，县长家中便不好意思进去了，禁烟这件事难办吗？必须要钱才办得了吗？公务员禁烟这件事，不是办不到，完全在我们自己去做，并不用花钱的。专员县长多下回乡，看看民间疾苦，便可以发现许多事情，想出许多方法解除。但下乡决不要打扰百姓。我听说以往竟有县长下乡，区长设法招待，叫百姓摊钱，结果发了个小财的事情。像这样以解除民众痛苦为目的的行为，其结果非但没有削减民众的痛苦，转而立时加重了民众的痛苦，人民和国家又何必必要这些官吏下乡呢？”^②

“现在大家都说苛捐杂税是使民间发生疾苦的一大弊端。其实苛捐杂税之为害，不完全是因为税率太重，使人民负担不起，大半是因‘苛’、‘杂’足以扰民。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好了，你如果不扰他，他宁肯多拿一点钱而无怨。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就是官场中贿赂风行的原因。譬如检查员要检查一批烟叶，他本并不一定要受贿。可是他检查时把烟叶掀动掀动，贩烟的人便会受不了。所以在检查之前，贩烟的人宁肯送一点人情，请求通融通融。做长官的本来无意受贿，如遇类此事件，有人来送人情，复经属员的怂恿，或者也

①②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第287—293页

会不经意的收了下來。你这样收了人家一块钱。部下的人便会收人家的十块钱，寢假而賄賂公行，恬不为怪了。我们的老百姓真驯良，吃了你许多苦，他们也还不感觉这是为什么，只是自己难受，自己在那里叫苦。”^①他说：“彼此应酬，虽为礼尚往来，所不可缺，究亦要有节制。否则今日甲宴客，明日乙请酒，专以酒食相征逐，事实上难免不将有用时光和精力，消磨于无用之地，影响到个人的正当业务。况且‘富人一席酒，贫民半年粮’，亦非为天地惜物，为国家惜财之道。”^②他主张改除钻营恶习。说：“行营成立之初，找事的人特别多，有求试用的新人，有望提升的旧属，或请人写介绍信，或自己来求，一切情形，总不出奔走钻营四字。推而至于全国各机关，往往主管长官一有变动，这种现象也就不一而足。这是我国政治上亟待纠正的现象。不过以我个人经验所得，真有能力的人绝对不钻营，只有在工作成绩上求表现。反之，凡是钻营的人，无一不是缺少工作能力与品行较低的人，他于工作中，既难求表现，又患得患失，遂不得不想出种种卑劣方法，以冀侥幸成功。试问天下事，那有几桩侥幸成功的？结果终不过‘弄巧成拙’而已。”^③

“而目前民间痛苦，最大者在捐税奇苛，名目不一，而正当征税勘少。苛捐杂税概由地方收取，几乎无地无捐，无物不税，如卖一猪，抽捐四毛。一筐菜抽捐一毛。又有运一车叶烟，经某地至某地者，原价九元，可售至四十余元，而结果甚至尚需亏本。因一地一捐，一地一税，名目繁多，难以统计。至若保安队餉项，地方豪劣尤从中渔利。县私幸其不能发餉，便于籍端抽收，而少数官兵，亦有甘为利用者，可见民众痛苦之深。”^④他在视察部队时，“曾发现有躺在大烟馆里抽烟的，有聚在一起赌钱的，有在客栈里嫖妓女的，这些坏军誉军纪的人，大部分都是当长官随身带领的随从兵。”^⑤“我们当兵的算是丰衣足食了，可是有许多老百姓，还是没有吃的，没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

有穿的。试想我们的吃，我们的穿，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那都是由老百姓血汗赚来的，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取得的。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这样的穷困？就是我们国家的富源，老百姓的现金，都被帝国主义剥夺去了，压榨去了。”^① 他还讲到，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做官的无所事事，专以应付，极不认真。他自己为“真”吃亏吃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仍无怨无悔，仍以这个字来勉励后辈。他讲过一个笑话，说“认真”就没饭吃：“有次孔子陈蔡落难，断了粮，叫老实的子贡去买米，店主一听是读书人，就指着墙上的一个字叫子贡认，认得就卖之。子贡一看简单，说这是“真”字，米店老板一笑，挥之去。子贡返，孔子率弟子再去，一看墙上字，说乃“直八”也，米店老板称善，乃得米。子路性直，不解，问老师，孔子答称：“不能认真，认真就没饭吃了。”^② 由此可见一斑。

张学良曾对人说过：“当年的‘剿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人心在共产党一边，才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早在1947年，张学良就预感到：“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员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③ 当张得知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时，他说：“共产党会得到天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支持，是会得到天下的。”1991年他在美国与在大陆的部属吕正操谈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腐败情况时说：“不是人干的事，他们都干了，因而激起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引发‘二二八事件’。有人说那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就完蛋了！”^④

① 张友坤、周毅：《张学良文集》（下），第231页。

② 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第13页，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3年版。

③ 《张学良幽居岁月》第1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④ 《吕正操重会张学良》。

张作霖与张有财墓地的龙脉传说

①



张作霖与其父张有财的墓地相距二百多里，人称龙脉之地，在当地颇有一番传说。张有财的墓地在今天的大洼县驾掌寺叶家铺子村附近。尽管张有财当年家境贫寒，衣食无着，但是经常出入赌场。在张作霖十四岁那年的一天，张有财与当地栾家铺子的一位姓王的赌徒发生口角，争执起来，张有财激动地说：“谁要输了，就拿老婆抵债”。结果姓王的输了。王怕真的以老婆抵债，对张有财怀恨在心，产生杀人恶念。当张有财经过一片树林时，他乘其不备，一脚将张有财踢死（还有一种说法，是用镐打死的）。王见出了人命，便逃之夭夭。

张作霖与其母王氏很久不见张有财回家，便托人四处打听，不见踪影。有一天，他家养的一只黄狗，从外面回来，向王氏狂叫，并咬住王氏的衣服往外走，王氏一直跟着黄狗走到一里多外的一片树林边的壕沟里，发现了张有财

① 根据民间调查撰写。

的尸体。后来张作霖把张有财被害之事告到官府，可是杀人犯已经逃跑，难以缉拿。再加上张家一贫如洗，无权无势，无人替他说话卖力。张作霖与其母万般无奈，只好将张的尸体用一领苇席卷好，用三根柳条编的绳子捆住，埋在村头河边的无主荒地上。结果第二年发大水，将张有财的尸体冲出一里多远，露在河边的高粱地上。张作霖又将其父的尸体就地挖坑掩埋了。

事过20年后，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这时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都说：“张作霖会埋，把他爹埋到龙穴里头了。”根据张学良的表侄赵凤舞回忆说：“还有很多人说，当时张作霖是用千层芦叶板、三道纸金箍把其父给埋上了。”张作霖对此很迷信，认为是“天地兆应”。“兆应既得”，“仍其旧兆”，所以其父的坟始终未迁，惟恐风水遭到破坏。

在封建时代，老百姓对埋葬老人的墓地选择与确定，都非常重视。无论贫富人家都要请一些德高望重的风水先生和社会贤达看风水，以期后代官禄显赫、出人头地，光宗耀祖。1912年张作霖已当上了中华民国陆军第27师师长。尽管如此，他还总想继续有所发展，让父母之神灵保佑他进一步升官发财。于是他委托姐夫吴永恩带领风水先生，从山海关开始，在辽西寻找坟地。后来终于在十三峰峰下的石山镇驿马坊村附近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它位于东北三大名山之一的医巫闾山余脉，石门的山脚下。今凌海市（锦县）石山镇驿马坊村附近。这一墓园埋葬着张作霖的母亲王太夫人和张作霖及原配夫人赵氏（张学良的生母）。

据张作霖墓园的护陵人李子元等几位老人回忆，过去在石门附近有十三个山峰（其中有些小山头已在前些年被开山取石的人崩没了），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人们称这里是石山。清代的驿马坊是个驿站，因乾龙皇帝到盛京路过此地，在这里饮过马，故得名驿马坊。

张作霖与赵氏夫人及其母亲王太夫人的墓地，安葬方向是头

西脚东，正对着两山夹一岗的猴山（过去这座山的顶上有一座几十米高的颇像猴形的巨石，早被开山凿石的人炸毁了），在这座猴山的前坡，还有一块巨形的白石，每当旭日东升，白石闪耀发光。距张作霖墓地的西南、西北方向约 10 公里地，依次排列着鹰嘴山、猴山、印山、望海寺山。在当地有这样的传说：即两山夹一岗必然出皇上。还有封侯、挂印、骑马、当官之说。

在民国以前，石山附近的山上，到处都是原始次生林，望海寺山上还有一座寺庙，古树参天，松柏长青。在距墓园约百米远的地方，小溪流水不断。因近几年地表水下降。才变成了季节河。鉴于上述，张作霖才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原墓园内外占地面积 40 垧（现园内占地面积只有 20 垧）。墓园内原来的近千棵松柏，1958 年因患松毛虫害而被伐去，1993 年在墓园内又种植了近千棵果树。

张作霖的墓园现为辽宁省锦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墓园内，除两座原墓完整无损外，还保存着张作霖为其母亲树立的九眼透龙碑和宣统二年皇帝给张作霖之母王氏的诰命碑及供桌、石柱、围墙等。

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家又选中距抚顺 30 公里的浑河上游的一个村落（即现在的元帅林所在地），作为张作霖的迁葬墓地。从 1929 年开始建造元帅林（即新墓园），计划到 1932 年 6 月 21 日竣工，并举行迁葬大典。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被迫停工。张作霖迁葬一事，只好搁置下来。

张作霖的棺材是用珍贵的阴沉木（又称万年藁）做的。张死后穿的是由北京寿衣庄做的用来祭庙时穿的黑色绣龙袍褂，帽子是前齐后圆带穗的。张的灵柩先是放在大帅府，后又移至奉天东关竹林寺。

1936 年张学良在西安时，派吴永恩之子吴廷奎回沈阳办理

张作霖灵柩运往驿马坊茆地事宜。吴到沈阳后，先与东北军旧部张景惠（张此时已任伪满洲国黑龙江省省长）、张海鹏（时任伪满洲国陆军部部长）等人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利用张作霖灵柩运往驿马坊之事，大作文章，鼓吹什么“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等。当时的伪满报纸曾报道：“张氏遗骸埋葬，协和会之美举”等等。

1937年6月3日，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到石门车站，（张氏的灵柩下面有四个轮子，是由汽车牵引至坟地），送葬队伍有一里多长，参加人员有日伪官员和一些张作霖当年的部下将校军官及幕僚，同时还有喇嘛、老道、和尚、鼓乐队等等。当时给张作霖扎的纸草活有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一应俱全。张作霖的灵柩在此安葬后，除“文革”期间墓门前的石柱被推倒、部分院围墙有些损坏外，主体建筑仍完好无损。

目前每天都有许多人到驿马坊参观张作霖墓园。在张作霖安葬50周年之际，张作霖的侄儿张学文携夫人王文瑞及家属，在张学思夫人谢雪萍的陪同下，专程到驿马坊墓地祭奠扫墓。除此以外还有张作霖的旧部及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也都常来此地考察研究。

张作霖与海大老爷^①



1900年初春的一天，张作霖带领18个弟兄跑到巨匠屯，在官兵即将追至又无处躲藏的危急关头，下马问一年迈老人：“请问老先生您老贵姓？”这个老人说：“免贵姓海。”张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名叫海大老爷的人。”姓海的说：“海大老爷是我堂弟，他就住在后街住，你看那趟街，谁家的大门房阔气，你就往里进。”

张作霖带着弟兄来到大门前，在门前站岗的人跑来问张作霖：“你们找谁？”张上前一鞠躬说：“这位老兄，我们是前来找大名鼎鼎的海大老爷的，本人姓张名作霖，老兄快让我们进去吧。”那人一听是很有名的胡子张作霖，立刻吓得脸都变了颜色，忙说：“我去禀告海大老爷。”说着他就急急忙忙跑到上屋向海大老爷如实报告。海说：“张作霖是一个有名的绿林好汉，他找我可能有事，快让他进来吧。”海大老爷说完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大门口，上前与张

^① 根据民间调查撰写。

作霖答话：“久闻作霖大名，今天有幸和你见面，欢迎、欢迎，快进屋。”张作霖赶忙鞠躬敬礼，然后说：“海大老爷，我们跑了好几天，官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求海大老爷救命。”海说：“快到后院把马拴上，进屋再说。”张作霖带着他们一帮弟兄到后院把马拴上，都进了屋。海大老爷告诉管事的，派人把马喂好，并吩咐厨师赶快预备酒菜。

张作霖带着弟兄们一进屋就给海大老爷跪下磕头，恳求救命。海说：“快起来吧！这事好办，我一定保你们平安无事，可你们一定要把大枪都藏起来，不准出院，就说是给我家扛活的。”他还告诉家人都这样说。时间不长，饭菜做好了，张作霖在海大老爷的陪同下，宾主落座开怀畅饮。正在此时，把门的人又向海大老爷报告：“海大老爷，有一百多号官兵已经来到村头了，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这话急得脸上直冒汗，海大老爷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说完他放下酒杯到大门口，见一个领头的哨官，下马来到海大老爷跟前躬身施礼问好，并对海说：“海大老爷，张作霖跑这来了吗？”海大老爷不慌不忙地说：“你们这些人真不懂事，我海龙为官这些年，可从来不和胡匪打交道，在我这呆着的，除了朋友就是给我扛活做月工的。”这个哨官看不出一点破绽，又不敢多问，怕得罪海大老爷。海大老爷接着又说：“各位弟兄请到院里落脚休息。有酒菜招待。”他吩咐家人把预备好的酒菜端上。那个哨官下令把马拴在前院，进屋吃饭。海大老爷陪着官兵们喝起酒来，那个哨官说：“感谢海大老爷盛情款待。”海说：“大家都是为了保境安民来到这里，一定要吃好、喝好，有什么困难，尽管吱声。”官兵们你一言，他一语地奉承着说：“海大老爷不愧是个当官的，多会说话。”官兵们越喝越来劲儿，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

躲在后院的张作霖，心里总是不踏实，害怕官兵再来搜查，万一如此，必遭灾难。正在惊魂未定之时，海大老爷从前院过来告诉他们：“你们尽管放心，在我的府上，他们不敢随意搜查。”

前院的官兵喝完酒，海大老爷又给他们抽一阵大烟，一个个提了精神，高高兴兴地都走了。张作霖给海大老爷磕了头、认了干老，感谢海大老爷的救命大恩。海对他说：“作霖不用谢了，咱们爷俩有缘，我这个人就是广交四海之内的朋友。”说着又给张作霖不少路费，告诉他们今天在这好好睡一宿，明天再走也不迟。第二天张作霖带领弟兄们上了路，直奔八角台而去。

张作霖告别海大老爷两年后，在新民受抚成为清廷的一名军官，1918年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他为报答海大老爷的救命之恩，亲自差人去接海大老爷到奉天，一见面就说：“海大老爷，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如今我当了督军，奉天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老想当什么官尽管说吧。”（当时张作霖除兼任东三省巡阅使外还兼任奉天督军和省长之职）海大老爷接过话茬说：“我都60多岁的人了，当什么官，只图安度晚年，有你们好好干就行了。”张作霖接着又向他打听了家里的一些情况，得知海大老爷有一个儿子名叫海玉衡时，他主动说：“海大老爷，我给玉衡在督军府安排个差事怎么样？”海却说：“作霖你不知道玉衡这小子，让他当官怕是误了事，不行啊。”张作霖一听这话，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是讲义气的人，常言说：受人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这是做人的准则，如果他实在干不了，我就在督军府给他挂个参议的衔，每月给他360元的饷钱养家糊口，就这么定了。”此后不久，海玉衡就到督军府当上了参议。这个人正像他父亲所说的那样，也没给张作霖效什么力，只知道钱花光了就去开饷钱。

这次海大老爷在帅府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总觉得不如回家方便，就对张作霖说：“作霖，我还得回家，在这住不习惯。”经张再三挽留，实在留不住了，就给他一辆七套大马车和很多珍贵的财物，并派30多个卫兵保护他回家。海到家后用张作霖给的财物扩建了大院，买了几百亩土地。海大老爷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成了辽西大绅士。

张作霖认何二爷为干老

①



张作霖少时家境贫寒，被迫投身绿林，多次遇难，因得到很多朋友相助，化险为夷。有时他还靠认干老的办法脱离险境。据不完全统计，张在危难之时曾先后认过十几个干老与干妈，较为著名的有钟三爷、何二爷、海大老爷、赵干妈等。其中，张作霖认何二爷为干老的故事，在辽西广为流传。

何二爷，名茂林，辽宁阜新县务欢池乡穷棒子沟人。何家里比较富裕（开烧锅），非常善于交际，是方圆几百里内有名的绅士。

1898年7月末的一天，张作霖与张海鹏（辽宁盖县三家子人）两人被驻守在土默特左旗的清军巡防营的100多号骑兵撵到务欢池乡穷棒子沟。

当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中午，他们俩跑到穷棒子沟村何二爷家门洞口避雨，被在正房抽大烟的何二爷发现。何披上蓑衣来到门洞口问：“你们二位贤弟尊姓大名。”张作霖说：“我们哥俩都姓

① 根据民间调查写成此文。

张，是过路人，在这避避雨。”何二爷说：“你们俩衣服都浇湿了，快进屋暖和暖和吧。”张作霖说：“那就多谢大叔了。”说着他俩就跟何二爷来到正房。刚坐在炕上，何二爷就立即吩咐管事的说：“赶快让大师傅给做点荞面条，打点卤子，给他俩暖和暖和身子。”

他们俩一看何二爷对人这么热情，肯定是一个有良心的绅士人家。张海鹏很郑重地问：“大叔你老贵姓？”何二爷回答：“免贵姓何，名叫茂林。”没等他说完，张海鹏就说：“大叔，不瞒你说，我叫张海鹏，他叫张作霖。”何二爷一听这话，惊讶地说：“原来是你们二位英雄，我早有耳闻。”他虽然是这么说，可心里想，这两个人在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可是谁也惹不起的红胡子。于是又叫管事的赶快宰一只羊，款待他们俩。张作霖一看何二爷心眼挺好，加上连续几天的拼命逃跑，马也被打死了，身上除带着两支步枪外，分文皆无。他们俩就坐在火炕上抽着何二爷给的大烟解乏。

羊也宰完了，正要给他们俩包饺子，忽然管事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里说：“何二爷，不好了，马队从东边过来啦。”张作霖和张海鹏一听这话就惊慌地说：“何二爷救救我们俩吧，不然就完了。”说着他们俩下地就给何二爷跪下磕了几个头，算是认了干爹。何二爷说：“孩子快起来吧，别害怕，我有办法。”何二爷把当时已怀孕七八个月的儿媳妇叫过来说：“赶快进里屋躺在炕上，就说坐月子了。”何二爷的儿媳妇灵机一动卷上炕席，让张海鹏钻进炕席筒里，把张作霖藏在被垛里面。她又用麻花被单挡上窗户，自己又弄了双被子躺在炕上，就算坐月子了。何二爷顺手把门关上，在门上边贴一张红纸，写上“月房”两个字。

不大一会，马队的官兵就闯进院里，一个当官的大吵大嚷道：“大东家，你们看见两个带枪的胡子没有？”何二爷镇静地说：“没看见。”一个哨长命令道：“弟兄们赶快给我搜。”几个官兵把门房、厢房、耳房都搜了个遍。最后又搜到正房，到外屋一看什么也没有。他们就要进里屋去搜，这时何二爷开玩笑地说：“长官，你看上边写

的啥,要是不忌讳的话,就进去搜吧。”官兵们一看门上边写着月房,就七言八语地说:“可别弄个损气”(不吉利),扭头就走。

外边大雨不停地下着,马队的哨长下达了就地宿营的命令,要求部下“严加盘查,不得有误。”于是,100多个官兵对全村实行戒严。大雨下了三天三夜,马队也住了三天三夜。

当雨下到第二天的时候,何二爷的儿媳妇,从屋里传出话说:“二位兄弟总在这里藏着,一点不敢动,他们俩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啦,得给他们想个办法呀。”何二爷说:“今天半夜,我送他们俩出去,就说派两个人接先生给你看病”。何二爷的儿媳妇说:“只好这么办。”

何二爷为了晚上派人请先生方便,就在当天傍晚,摆了十几桌八中碗酒席,招待马队的全体官兵。在宴会上何二爷说:“各位长官弟兄们,你们为了保境安民,让我们过好日子,不畏劳苦来到这里打红胡子,弟兄们劳苦功高。咱们是一家人,你们旗的老王爷,又是我的大哥(表亲),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有什么困难尽管吱声。”马队的官兵,一听何二爷是老王爷的亲属,又给酒喝,还给钱,就一个个一盅接一盅地猛喝,直喝得东倒西歪。几个哨兵还不住嘴地叨咕着,何二爷真是这方圆几百里的世面人物。

到了半夜,何二爷让张作霖和张海鹏在里屋吃饱了,喝足了,又给了一些钱。然后叫管事的套上小车子,让他们俩扮做家人坐在车里。何二爷对住在门房的官兵说:“长官,我儿媳妇得了重病很危急,得派人接先生治病。”一个哨长慷慨地回答:“传我的命令,何二爷的小车子出村谁也不准挡”。小车子走到村口,几个披着蓑衣站岗的士兵,正在门洞里背靠背地睡觉呢,一听有动静,就端着枪站起来喊:“是谁的车?”何二爷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是何二爷,派两个伙计,给我儿媳妇接先生去,你们哨长说了放行。”还没等何二爷说完,几个站岗的,就你一言他一语的说:“何二爷,你早吱声,是你的人和车,我们都不挡,随便,快走吧!”何二爷把张作霖和张

海鹏送出村外，并对管事的说：“你把他们俩送到大山南，等他们俩上路后，你回来再请先生，以掩人耳目。”张作霖和张海鹏一听这话，赶紧从小车子上下来给何二爷鞠躬，张作霖握着何二爷的手说：“干爹，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报答你。”何二爷说：“不用谢了，人生在世就得积德呀，你们俩快走吧。”

何二爷送走了他们俩，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第三天早上，雨还是一个劲儿地下着，到了下午，雨才渐渐地停下来。这时马队的几个哨长又下令在村里再搜查一遍，也没搜到。于是就下令说：“弟兄们，我们虽然没有抓住红胡子，但是我们现在已将两个红胡子撵出了我们的防范境地，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现在立即回王府。”清军驻土默特左旗巡防营的马队官兵，带着何二爷给的金银财物返回去了。

何二爷救张作霖、张海鹏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家业就逐渐走向没落，到了1920年就变成了中农户。当时就有人对他说：“你不如到奉天去找张作霖。”何二爷说：“事过20多年了，如今张作霖打腰了（即有钱、有权、有势力），恐怕他不认我。”村里人劝何二爷说：“听人说张作霖也是个讲义气的人，你应该去找找他。”

在乡里人的催促下，何二爷拿点盘缠，从穷棒子沟起身，坐小车子走了二百里旱路，到打虎山乘车到奉天。一下火车就直奔大帅府。他对站岗的说：“长官，我从西边外来，找我的干儿子张作霖。”门岗一看何二爷是一个庄稼人打扮，就骂道：“你老头子，他妈的纯粹是冒认官亲，我们大帅哪有你这样的干老，快滚蛋！”说着几个门岗上去就是一阵子拳打脚踢，把何二爷打得鼻青脸肿。他无奈只好离开此地，到小河沿一家旅店住下。第二天他又壮着胆子到大帅府，对门岗恳求：“长官，张作霖真是我的干儿子。”门岗没搭理他，骂道：“快滚蛋！别找不自在！”何二爷一想完了，他就又返回旅店。

在旅店，他一连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憋一肚子气，整天愁

眉不展，蛤蟆癩(旱烟)一袋接一袋地抽，寻思着怎样才能见到张作霖。一天下午，他正在旅店门口唉声叹气时，一个挑泔水的年轻人，放下挑子过来问：“大伯你是哪人？”何二爷说：“我是西边外人，是专门来找张作霖的。”于是何二爷就把要进帅府的事诉说了一遍。这个年轻人对他说：“我有办法，我母亲是给大帅的四太太(许夫人)做浆洗婆的，每三四天去帅府一次，我一定让我母亲转告四太太。大伯跟我回家吧。”何二爷抱着很大希望去到他家。并把当年张作霖认干老的一些经过和他母亲说了一遍。他母亲满口答应，明天进帅府见四太太说说。这个年轻人见何二爷说话实在，心眼也好，又是大帅的干爹，心想：“干脆我认他为干老好了。”于是，面对何二爷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叫了声干爹。何二爷也就认了这个干儿子。

第二天，他的母亲进了帅府，见了四太太就说：“四太太，我家新来一个60多岁的老头，说是在光绪年间救过大帅，是大帅的干老。他两次进帅府都被门岗打了出去，拜托四太太问问大帅当年在西边外，遇过难没有？此人，现在我家，如果没有这事，就算拉倒。”四太太说：“那好吧，你等着，我这就找大帅去。”

四太太到大帅的客厅，把经过和大帅一说。张作霖就立即表态：“我张作霖是讲义气的人，正想报恩还找不着他呢，请他老人家明天早上进帅府，我款待他。”说完他又把卫队长和几个站岗的头头找来，骂道：“你们他妈拉个巴子的，我张大帅打腰了，就没有穷亲戚了，来了穷亲戚还给我轰出去了，你们这些玩意，跟皮子尽往上翻，都该他妈拉个巴子的枪毙了。你们知道他是谁？那老爷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卫队长和几个站岗的头头，连连点头说：“我们有眼无珠，该死、该死，有罪、有罪。”他们几个吓得直哆嗦，心想可惹下大祸了。张作霖又骂道：“你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找你们几个算账。”张训完了卫队，又对四太太说：“我派你亲自去一趟，请我那位救命的干爹明天早上进帅府。”四

太太答应一声就走了。

翌日清晨，何二爷来到大帅府门口。几个门岗一看何二爷来了，卫队长就领着他们几个扑通一下子跪成一排，说：“何二爷驾到，小人有罪，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请何二爷开恩。”何二爷上前赶忙把弟兄们扶起来说：“请起，不知者不怪，你们行此大礼，老朽何以敢当？快起来，快起来。”这时帅府的一个副官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客厅，把何二爷驾到的事，报告给了张作霖，张作霖一听何二爷来了，就赶紧拖拉着鞋，赶快到院中间迎接。

一见面，张作霖就拱手说：“干老受惊了，这都怪我作霖对部下教育不够，才使你老皮肉受苦。”何二爷忙说：“哪里，哪里，不知者不怪。”张作霖搀扶着何二爷进了客厅，就要给他磕头。何二爷赶紧上前把张作霖扶起来说：“这可不比当年，如今你已是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元帅了，这可不行。”在跟前的太太和副官们一看，大帅对何二爷这样热情，一个个就忙个不停，准备酒菜的准备酒菜，送水的送水。

两个人都落座后，他们从20多年前的西边外，一直谈到现在的东三省。张作霖问：“干老想当什么官啊。”何二爷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当什么官，我就在家过日子发点财得了。不过得把那个挑泔水的年轻人给找个差事。”张作霖说：“好，传我的令，让他立即就来。”不大一会这个年轻人就到了，他很有礼貌地给大帅磕了头。张作霖说：“平身，快起来吧。”然后他又问：“小兄弟你想干点啥，当文官还是当武官。”这个年轻人说：“我家靠我母亲给四太太浆洗衣服和我挑泔水养猪维持生活。要说当文官我没文化，当武官我还胆小，还是过日子吧。”张作霖劝他说：“小兄弟，你尽说他妈的熊话，这东三省不咱说了算吗？我他妈的还没文化呢，怎么不也当大帅了吗？我封你个税捐局局长，给你派四个秘书，你掌舵干吧。”从此以后，这个年轻人，

通过何二爷和张作霖的关系，在奉天城里，一下子就青云直上当上了税捐局局长。

安排完这个年轻人，张作霖又问：“干老，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人？”何二爷说：“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女婿们都是庄稼人。家里就剩我和你干娘，还有一个正念书的小子。”张作霖告诉他：“你那两个女婿，我给他们俩安排个差事，一人给他个少校副官。”何二爷忙接过话茬说：“作霖哪，这行吗？”张作霖笑了笑，满不在乎地说：“哎，这不咱爷们说了算吗，以后就看他们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了。”说完这些，何二爷又插话问：“海鹏现在干什么差事呢？”张作霖说：“他早就当旅长了。自打那次你救了我们俩之后，不久我们又找到了失散的弟兄，又重新干起来了。这回人也多了，势力也大了，在光绪二十八年，我带着几百个弟兄被改编成新民巡防营。从此以后就不再打游飞了，算是有了着落，一直混到现在，咱爷们说了算啦。干老，你就在我这呆着吧！”何二爷说：“我是庄稼人，在山沟里呆习惯了，呆些日子我就回去。”张作霖说：“那你老实在不在这呆，我也没办法。”

何二爷自打进了帅府，整天是山珍海味好吃好喝，张作霖对他照顾得非常周到，他在帅府住了一个多月非要回西边外不可。张作霖对他说：“你实在要走，我也不留。”他下了一道令，给何二爷套上一辆七套马车，装上金银财物和许多贵重物品，派一个连的骑兵护送他回家。

何二爷回家后，又打发了他的两个女婿到奉天当了官。他的家业又重新振兴起来，其势力越来越大，在西边外一带，出远门的人都打着何二爷的旗号，官府也不敢惹，都得高看一眼。

当年穷棒子沟一带的老百姓都说：“何二爷从张大帅到满洲国打了一条龙的腰，直到八一五光复以后，何二爷的家业才走向没落。”

张作霖劫持增祺三姨太，

以求投诚官方



张作霖投身绿林后，觉得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浪迹辽西的绿林生涯总非长久之计。一次张与汤玉麟在一起喝酒，说：“当今之世，东北无主，我等不应据守一隅之地，而应将小股辮子合并在一起，进而称霸东北。”汤赞同说：“吾意亦然。”从这以后，张开始琢磨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的门路。

1901年的一天，有一个拉线（密探）的向张作霖报告说：“盛京将军增祺的三姨太，近日要从义州、白厂门、富家荒，沿八道河子方向经新立屯回奉天。张得此消息后，即与汤玉麟在一起商量，认为这是一个与增祺接近受抚升官的好机会。原来增祺为了躲避沙俄入侵东北之战逃至义州，并将自己的三姨太送往北京。事隔一年之后，辛丑条约签订，东北的社会治安形势趋于安定，增祺派人将三姨太从北京接回奉天。

张得知此情报后，即与汤玉麟商量如何劫车。方案制定后，张作霖立即派汤玉麟带一伙弟兄前往新立屯以西苍土南八道河子，埋伏在两岸密林中，而张

本人带十几个人在新立屯王家大院等候。汤带着弟兄在埋伏后的第二天下午，只听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和车轮声。这时前边亮水的（即岗哨）从富家荒方向跑回来向汤玉麟报告说：“活！秧子（即人票）已到。”汤玉麟一听此话欣喜若狂，立即下令进入伏击圈。待十几个骑马的卫兵护送的小车子（马拉的铁车）进入伏击圈后，汤玉麟鸣枪为号，100多个弟兄一齐冲上去包围了增祺三姨太的小车子，汤对所有护送人员以命令的口吻说：“谁也不许动，动就打死你，快把枪交出来。”护送增祺三姨太的随从人员见汤人多兵众，怕吃眼前亏，就乖乖地交了枪。这时增祺三姨太惊慌失措地从小车子上下来，胆战心惊地说：“各位长兄是哪个辮子的？”汤接过话茬训斥道：“我们是八角台保险队张作霖的队伍，你们快跟我们走。”增祺三姨太又告诉汤：“你可要知道，我们是增将军的家眷，咱们最好是别伤了和气，有什么事好说。”汤蛮横地告诉她：“你少说废话，我不管你什么这个将军那个将军的夫人，快跟我走，别废话！”于是增祺三姨太就这样被劫持到新立屯王家大院。

在王家大院，张作霖向增祺三姨太问明了情况后，对增三姨太和随从人员彬彬有礼，并当着增祺三姨太的面，假惺惺地训斥了他的部下，骂他们是有眼无珠，没看看是谁的车还敢劫。张还当面向增三姨太赔礼道歉，并设八中碗宴席盛情款待。酒后又给增三姨太的随从人员最好的大烟抽。当随从人员在炕上抽烟时，张作霖故作唉声叹气地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软弱无能，没有国际地位，尽受外国人的气，国内的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出来当胡子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当绿林。”增三姨太和随从人员听张这么一说，另外一看张作霖对他们很恭敬，一致认为张作霖很平易近人，又很懂道理，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张如何凶恶，心狠手辣。

张作霖见增三姨太和随从人员对他有了好感，就见缝插针地

对增三姨太说：“我张作霖冒犯增夫人有罪，以后有用着我的时候，请夫人尽管吩咐。”这时增三姨太见张对自己如此恭维，就对他说：“我明白地告诉你吧，我是增祺将军的夫人，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假如你愿意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程一定不可估量。”张作霖听此话后立即表示：“愿在增将军麾下效犬马之劳。”当即下令将随从人员的枪支弹药如数交还。增三姨太还拿出一些银两赏赐给张的部下，张婉言谢绝。增三姨太对此很受感动，决定翌日回奉。

第二天，张作霖亲自护送增三姨太出新立屯东门外，并派汤玉麟等人一直护送过了辽河。增三姨太回奉天后，将张作霖的情况向增祺诉说了一遍，增祺对张作霖受招抚一事，表示同意，并决定向朝廷上报，准备招抚。增祺于1901年11月9日亲自到张作霖驻地择精壮者250名，编成新民府巡警前营。张作霖被任命为管带（副营长），从此结束了六七年的绿林生涯，当上了清廷的军官。

张氏父子与汤大虎



汤大虎，真名汤玉麟，字阁臣，外号汤二虎。汤大虎是张作霖的绿林伙伴，患难时期的把兄弟，在征战辽西打响窑的战斗中，汤曾多次救助过张作霖，为他立下汗马之劳。在后来的大小军阀的争权夺势的斗争中，他们有离有合，颇有传奇色彩。

汤大虎，1871年生于辽宁阜新县新民乡扎兰营子村四道沟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长得虎头虎脑，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因此他的父亲汤福和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二虎子。他从记事时起就好打架，从不惧怕附近一些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他20来岁的时候还经常出入赌场。有一次二虎子和几个有钱的人在赌场赌输了，人家逼着他交钱，他被逼无奈，就当场用杀猪刀在自己的腿肚子上割下一块肉来放在桌上，瞪眼睛说：“要钱没有，要命我有一条。”在场的赌徒都吓呆了，打这以后二虎子生死不怕的名字传出去了。在他25岁那年夏锄季节，一个大地主的马吃了他家的青苗，他将马砍伤，因此

与王府的官员杜梅林结下仇恨，投奔辽西绿林苑四、苑五，在缙子里当炮头，从此，方圆百里的人都称汤二虎子为汤大虎。

汤大虎入缙子后，见苑四、苑五不讲义气，便领着一伙人劈了缙子，在医巫闾山另立山头。后来他又带着这伙弟兄转战至锦西虹螺山，以此为据点向外扩展势力。

当时在辽南与辽西地区与汤大虎同立山头的还有，以海城高家坨子为中心的冯麟阁；以黑山姜家屯为据点的洪辅臣；以黑山赵家庙、北镇中安堡一带为据点的金寿山和张作霖。他们少则几十口子，多则几百口子（绿林黑话缙子里的人数为口子），彼此有时互相联合，有时互相残杀，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有这样一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的混乱局面：“冯麟阁占东山，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汤大虎闹得欢，张作霖坐地保险要银捐。”在这几伙地方势力中，争夺地盘最激烈的要属张作霖与金寿山。

张作霖领导的保险队在中安堡站住脚后，急需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就邀请汤大虎入伙，汤投奔张作霖后引起金寿山的嫉妒，于是便勾结沙俄驻奉天的军队 100 多人，在 1901 年 2 月 18 日乘张作霖一伙欢度春节之际夜袭中安堡。当时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边打边撤，汤大虎身背张作霖的长女首芳边打边突围。他们突出重围后，唯独不见张的赵氏夫人，张心情很难过，可他不得不下令快撤。此时汤大虎命令大家快走，自己孤身一人骑着马，手使双枪冲进中安堡把张妻（赵氏夫人当时正身怀张学良 5 个多月）救了出来。张见此情景立即给汤大虎磕了一个头说：“感谢二哥的救命之恩。”汤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说这些，快走！”张作霖在汤大虎的护送下逃出虎口，投奔八角台张景惠的保险队。

八角台保险队的首领张景惠，主动把大权交给张作霖，二张合编后约 70 人。后来张作霖在汤大虎、张景惠等众兄弟的帮助下，先后打败了项昭子、海沙子等各股绿林。当队伍发展至 200

多人（堪称辽西绿林中的一支劲旅）时，张作霖开始考虑如何走弃暗投明之路。1901年9月的一天，张作霖与汤大虎带100多个弟兄来到新立屯，汤扮演黑脸角色，带人埋伏在新立屯西苍土南八道河子，将盛京将军增祺的三姨太劫往新立屯，然后张扮演白脸的角色将增三姨太放走，并护送到奉天。张、汤这一黑一白的表演，最后才引出了张作霖投奔盛京将军之场面。

张作霖投诚增祺后被任命为新民巡防营游击马队管带，汤大虎被任命为哨官。5年后汤又协助张作霖消灭了辽西巨匪杜立山。1908年他又跟随张作霖到东蒙地区追剿蒙匪陶克陶胡。此时张作霖已升任五营统带兼中营营长（后扩编为7个营），汤大虎被张任命为一营营长。在战斗中，张、汤率部进入大兴安岭的索伦河一带，多次遭到陶克陶胡蒙匪的偷袭。张作霖两次被困，均被汤大虎率敢死队舍生忘死地救了出来，张、汤所部经过一年多在草原与沙漠等恶劣地形条件下追剿，最后将陶克陶胡打败，陶被迫逃往沙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张作霖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率部进驻奉天镇压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张作霖被袁任命为陆军27师中将师长，汤大虎被任命为骑兵27团团团长，翌年又被提升为53旅旅长。

张作霖当上师长后，开始在奉天安置家眷，扩充家产。他先是在大南门里通天街左侧租赁了道台荣厚的一套旧宅居住。1913年底，将荣厚的旧宅买下来，同时又将西侧的江浙会馆购买下来，于翌年夏全部拆除，动工修建帅府。汤大虎见此情景，他自称功高盖世，要与张作霖同打江山同坐殿，于是也在奉天大兴土木，修建公馆，其建筑规模与帅府相当。根据保留至今的汤公馆，就完全可以看出汤公馆修建时的工程之大（今辽宁历史博物馆院内）。除此之外，汤大虎后来还在凤城、安东、承德、天津、北平修建了别墅，在他的家乡四道沟修建了宅第。

1916年夏，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后，为了治理好奉天，提出了“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因此他先后礼聘袁金铠为军民两署秘书长，杨宇霆为参谋长，王树翰为财政厅长，还聘任了王永江为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这时省城社会治安秩序混乱，其主要原因是驻守省城的53旅旅长兼省城密探队司令汤大虎的部下在省城乱用兵权，肆无忌惮。历任警务处长都怕汤大虎，对汤部所做所为佯装不知，得过且过，不敢过问。王永江上任后，敢做敢为，无所畏惧，并参照日本的做法改革警政，先后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严格执行检查制度。可汤大虎部下的某些军官却把派出所叫做“西瓜棚”，予以藐视。

有一天，汤大虎的工兵连某伙食长，带着几个兵去东门外市场买菜，与警察发生口角。双方互不相让打起架来，派出所人多，一直把汤军的几个官兵追到小南关娘娘庙驻地附近，几个官兵被打得鼻青脸肿。伙食长把被打的经过向刘景双营长做了汇报。刘仗着他姨夫汤大虎的权势，带着全营官兵把附近的几个派出所全给砸了。事态扩大后，王永江将此事报告给张作霖，张大骂刘景双无法无天，立即召开会议（在会上王永江将打架的经过说了一遍），他说：“如果都像53旅官兵这样，妨碍治安，地面无法维护。”这时汤反驳说：“你警察就管53旅吗？放你妈那个屁。”张作霖见此情景，先是训斥王永江几句，接着又对汤说：“二哥你的弟兄有的太骄横了。”没等张把话说完，汤站起身骂道：“你放屁，我的弟兄骄横什么了，难道警察骑在我们脖梗上拉屎还不许我们扒拉掉吗？”这时张很气愤地说：“你的兵如此骄横不服管束，连说说都不行。你能干就干，干不了就拉倒。”汤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地骂道：“操他奶奶才干呢，天下是你我打出来的，我不是给你拎烟荷包出身的，老子到哪还不能吃碗饭。”说完扬长而去。后经很多有资格的元老派人物的劝说都没起丝毫

作用，汤仍坚持拉出去单干。后来有 1000 多人跟着汤经新民到北镇投奔了 28 师师长冯德麟。冯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汤又带领余部回到家乡阜新的大水泉子、卧风沟、蜘蛛山和义县花尔楼、稍户营子一带。

张、汤后来各自平息了怒气，都觉得他们过去是莫逆之交，因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很不值得。为了缓和关系，张作霖首先为汤做了三件事，第一在义县稍户营子为汤开了一家当铺。第二将汤父灵柩运往奉天亲自护灵安葬。第三将汤母及汤的大儿子接回奉天，并安排了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场合公开暗示，东北的天下是几个结拜兄弟联合打的，十分想念有救命之恩的大哥。这时汤也通过奉军的元老派人物张作相、张景惠、汤金纯和自己的母亲到张处说情，于是张同意汤回省城。张作霖为了表示自己愿与汤大虎和好的诚意，亲自率部队高级官员到奉天城西门外列队迎接。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在众官员的相劝下才止住了哭声，手挽手走进汽车返回帅府。经过张汤一年多离与合的内部斗争，最终张作霖又委任汤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等职。

1921 年，汤大虎被张作霖任命为第 11 混成旅旅长，率部驻守凤城并兼任东边道镇守使和剿匪司令。后来他又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曾率部从义县稍户营子、黑山、白厂门、新民姚堡方向向巨流河挺进，在辽河东岸阻击郭军。郭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在 1926 年末任命汤为安国军第 12 军军长兼热河督军，率部驻守热河。

汤在驻守热河期间，任人唯亲，在各县以上机关安排了自己的亲信，他的老乡盖敬臣被任命为省府秘书，后来调到开鲁县任县长。亲属张显臣被任命为卫队团团长兼副官长。女婿周铁铮担任了阜新县县长。几个儿子也分别在军政各界担任要职。总之，凡是阜新人投奔他去的，不论能力怎样，他都分别委以重任。

1928 年 6 月，张学良执政东北，考虑汤大虎是东北军元老

派，即委任汤为热河省政府主席。汤当上主席后以元老派身份自居，野心勃勃，大肆扩充军队，并强令老百姓种鸦片烟 100 多万亩，以便巧立名目扩大税收。他的军队装备虽好但战斗力不强，经常有克扣、停发军饷之事，引起士兵不满。在此期间，汤大虎更加专横。一次他乘专车去奉天，在途经京奉铁路（今沈山线）打虎山车站时，看到车站运转室的房子顶上写着打虎山车站的字样，就对秘书说：“他妈拉个巴子的，很多人都称我是汤大虎，我有虎威，可这个地方还叫什么打虎山，这还了得！快把站长叫来我问问他。”秘书下车把站长请来，汤问：“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打虎山？”站长说：“汤大帅，我们这里在几百年前是一片大森林，狼群虎豹经常出没，曾有一位武艺高强的人，在此打死过一只虎，后人才把这个地方叫做打虎山，此名一直流传至今。”汤说：“人们都称我为汤大帅，过去也有人叫我汤大虎，我是大虎，而你们这却要打虎，这可不行，赶快改为大虎。”站长忙说：“汤大帅，我们现在就改。”从此以后打虎山车站就因汤大虎几句话改成了大虎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汤大虎在热河则采取了既不主动抗日，又不公开降日，而是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保存实力。1933 年 2 月，张学良领导热河抗战，将汤大虎的军队编为第 5 军团，汤任总指挥，担负凌源——平泉——承德一线以北的作战任务。他的部下只有董福廷旅、于兆麟旅对日军的进攻曾一度进行抵抗。其它各部及董、于部下均有不少人投靠日军，致使热河抗战失败。前线败退的消息传来之后，汤大虎从平津征集大批汽车，并扣留军用载重汽车装载私产鸦片运往天津租界。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进攻承德，汤大虎带领身边人员出逃。汤军如此溃败，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汤军腐败丧失斗志，部队训练很差。长年累月不发军饷，官兵很有怨言，很多人都说：“跟着汤大帅打天下，连我们的饥寒温饱他都不管，我们连要饭的都不如，不管我们死

活，还替他打什么仗？”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热河抗战之前，张学良一度要撤换汤玉麟，蒋介石也表示同意。后来张学良征求东北军元老派张作相的意见，后者不同意，认为汤态度蛮横急则生变，会造成东北军分裂。

承德被日军占领后，汤大虎带残部不战而逃至滦平县城，引起全国爱国将士的极大愤怒。当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于3月4日到古北口给张学良打电话建议：“不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平民愤，如汤大虎来古北口，我代表救国会先杀他，杀错了，你再杀我。”张学良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你不要冒失，捅出乱子来。”就在这天晚上，汤大虎给张学良打电话，说要求经古北口去北平，张学良当即叫他带队反攻，如不听命令，军法论处。后来张学良给王化一打电话说：“汤玉麟如一定要来北平，放他进来好了，我派人送一密令，就按你的意见处理。”王化一遵照张的命令，待汤一人关就逮捕法办。后来因独立12旅截留的汤军驼运队逃回去的人向汤报告，再加上张学良命令他带队反攻，预感入关没有好果子吃，就由滦平转鞍匠屯会合孙殿英的41军向西撤。后来国民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免去了汤的一切职务。被全国人民骂为不抗日而成为逃跑将军的汤大虎，无奈只好撤往察哈尔。1933年5月，汤参加了冯玉祥等人组成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察东司令。同盟军失败后他又担任了29军参议、北平军分会顾问等职。1936年辞职回到天津寓中，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汤大虎于1937年病死天津，终年66岁。

纵观汤大虎的一生，他与张作霖的关系可以说是既有生死之交，又有分道扬镳。张学良顾及元老派的脸面，委汤重任，但后来由于他腐败无能，又非常憎恨他，下令撤职法办，以除这个弃城携财而逃的千古罪人。

被气死的戴夫人



张作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他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对曾救过他的好友与亲属有讲义气的一面，也有为严肃军纪大义灭亲的一面。提起张作霖枪毙内弟这一传奇故事，还得从三太太戴夫人说起。

1901年11月，张作霖投诚清廷，被任命为新民府巡警前营管带（营长）后，大肆扩充实力，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他经常带领部队到黑山、彰武、阜新、北镇等地巡防。有一次，他到北镇县城，遇上一位长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女人，就对身边的卫士说：“这个女人真漂亮。”此话一经传出，有些人为了给张作霖拉近乎，就到处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经了解这个女人姓戴，是北镇县一个捕盗班头的儿媳妇。后经张作霖的义父杜泮林从中策划说合，张花了很多钱，将戴氏夫人买来。

戴与张作霖结婚后，总要太太作风。戴的弟弟也借着张作霖的权势在张的卫队里当了一个小头目，并经常扬言：

“张师长（张当时是 27 师中将师长）是我姐夫，有权有势说了算，这奉天省城的天下都是咱们的。”一些官兵见他如此仗势，谁也不敢惹他。

1912 年 12 月末的一天晚上，戴某在营房里喝了很多酒，随后便溜出营房到大街上耍酒疯，招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他破口大骂：“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枪毙了你们。”说着就举起步枪，照着路灯就射，一个不漏，走了三里多路共射二十几盏路灯。张作霖的卫队长把戴某酒后射坏路灯的事向张做了汇报。张说：“他妈拉个巴子的，这小子依仗我的势力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坏我司令部门口附近的灯胆（路灯），这还了得。”立即下令把戴某抓起来，亲自审问：“你为什么打坏灯胆？”戴某说：“姐夫，我当时喝酒喝多了，有很多人围着我，我就掏枪打灯胆吓唬他们”。张作霖一听这话气得拍桌子骂道：“你小子虽然是我小舅子，可你竟敢在我的司令部门口以打灯胆开玩笑，他妈拉个巴子的，我决不轻饶你”。说完他又命令卫士们把他关起来。

戴夫人听说自己的弟弟惹了祸，就到司令部找张作霖说：“张师长，我的弟弟酒后闹事打了灯胆，这是他的不对，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张作霖听她这么一说，立刻就火了，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照这样下去都仗着我乱闹事，军队没个纪律能打仗吗？若不毙了他，别人犯军纪怎么办？你她妈的别给讲情了，谁讲也不行，非毙了不可，明天就开大会。”戴夫人给弟弟讲情，反倒碰了一鼻子灰，气得抱头痛哭。

第二天张作霖在司令部召开了卫队官兵会议，张在会上骂道：“以后谁喝酒闹事也不行，像我小舅子这样仗着我无理取闹，不枪毙他，能严肃军纪吗？将来别人犯军法我怎么处置？我难哪，我再难也得就这么定了，非毙他不可。”接着又说：“以后谁再胡闹，就是我小舅子的下场。”话音刚落，戴某就被拉出去枪

毙了。

张作霖枪毙内弟的事传出去后，部下很多人都说：“张师长真是大义灭亲，严肃军纪的将领啊。”从此以后，张的部下军纪大有好转。

张作霖把内弟枪毙之后，戴夫人几天卧床不起，哭泣不止。她觉得张作霖一点面子也没给，在这个家庭已无法再呆下去了，于是就出家为尼，在尼姑庵里天天念经，心情郁闷导致病魔缠身，于1916年病死。

自杀身亡的常司令



常司令，名万里，字百年，1876年生于辽西阜新县务欢池村。少时家境较为贫寒，只读过几年书。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到清政府毅军将领宋庆部下当兵。由于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同时又善于讨好上级，到了民国年间，常万里已担任了直系热河毅军米振标部下的暂编第一师中将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后，常带着一伙人投降了奉军。他为了讨好张作霖，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拥张武力统一中国。常在扩军中吹了大牛，吃空头军饷，欺骗张作霖，最后落得自杀身亡的下场。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常万里见直军战败，毅军已垮，就带领残部投降了奉军，被张编为热河骑兵第二旅，常任旅长，奉命驻守林西、林东一带。常对此很不满，总想在奉军里当个司令、军长的官，通过张作霖的干老何二爷托其关系说情，设法升官晋级。1925年初的一天，他带着一个排的骑兵，陪同何二爷骑马带着礼物赶赴奉天。到了大帅府，张作霖盛情款待了他的救命恩

人何二爷，常也跟着借了光。常见张如此恭敬何二爷，他就低三下四地对张说：“大帅，我是东北人，以后决不能再给直系毅军卖命了，一定要效忠大帅。”张问常：“你小子既已归我奉军，今后有何打算？”常说：“大帅，现在我的兵不多，都开了小差，没剩多少，待我回去保证给大帅招来两个师（2万人）的兵力。”张见他很诚恳，加上何二爷从中作保，就对他说：“你如果能给我招来两个师的兵，我就封你为镇守开鲁、阜新的热河省防军地方司令长官。”常万里一听这话，赶紧给大帅连鞠躬带敬礼地说：“谢大帅提拔……”他还向张提出军饷怎么办的问题，张当即答复先给两个师发一个月的军饷，等兵员招齐后，所有武器和服装逐步配齐，限一年之内必须完成。常万里向张作霖发誓：“明年初请大帅检阅部队。”就这样常万里带着张作霖给的军饷与何二爷一行几十人返回了家乡，准备扩军。

回家后常万里庆贺了3天，前来道喜的绅士官僚都恭贺他荣升司令。他把原来跟他干的很多人都封了官，晋了级，并派这些人下去招兵买马，可是投奔的人仍不多。半年多了他才招了不到2000人的队伍。很多过去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抽大烟，克扣军饷，什么事都干，为了吃空头军饷，常仍然派自己的参谋长胡宝山到奉天向张作霖作假汇报：“大帅，常司令已在辽西一带给你招募了两个师的军队。”张信以为真，就按月给他们发了军饷。常用这笔军饷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仿古式公馆，与王府一样壮观。

1926年4月初的一天，张作霖电令常司令15天后将部队带到沟帮子、石山站一带接受检阅。常接到命令后心里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彻夜不眠。他对胡宝山等人说：“我不能活了，到检阅时，张大帅一看就这么一点兵，非毙我不可。我死后你们带着队伍跟张作霖干吧，我不能连累弟兄们。”大家都劝他想开点，可常司令却说：“兵没招够两个师，军饷都让我给花了，这叫欺

君之罪呀，我死了你们也都好办了，不然咱们大家都得完。”说着他泪流满面，情绪消沉。常司令的家人和亲信听说此事后，就派人日夜看护他，就连他用的手枪子弹全用水给煮了，屋子里的绳子匕首等凶器都藏了起来，临近检阅部队的时间就差几天了，由于家人看得紧，他始终没有得到自杀的机会。有一天，他的侄子常德去看他，他说：“常德，你的匣子枪好像有锈了，可能没擦好，拿来我看看。”常德说：“枪没锈，不信你看看吧。”说着他把枪随手交给了常司令。常接过枪后，照着自己的前胸勾动扳机，自杀身亡。

后来常司令招来的近 2000 人的队伍，在胡宝山的带领下准时开赴沟帮子、石山一带，接受了张作霖的的检阅。胡将常司令自杀身亡的事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张一听常万里是一个吹大牛说大话的骗子，就气愤地骂道：“这小子他妈的只知道升官骗人，不知道我张作霖是不好惹的吗？算了吧，他既然已经死了，算是自己聪明，你们这些人愿意跟我干的就留下进关打仗，不愿意干的可以回家。”在场的胡宝山等人表示坚决跟着大帅，永不变心。

徐傻子当军官



张作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但善于笼络各种人才，而且还善于收买人心。他曾提拔过很多智勇双全的将校军官，也提拔过一些忠勇过人的士兵来担任下级军官。一次他到小河沿视察部队时，就曾立即下令提拔一个外号叫徐傻子的40多岁的老兵为副营职军官。

徐傻子，辽宁阜新县苍土乡人，生于光绪初年，家境十分贫寒，从小就靠给地主放猪扛活维持生活，目不识丁。1906年，正值张作霖所部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派人到新立屯一带插旗招兵。徐傻子为了混饭吃，毅然报名应招。从此，他就开始跟随张作霖作战，征讨蒙匪，参加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在战斗中英勇作战，屡立战功。

徐傻子当兵后，骑术高超，骑射超群。在追剿陶克陶胡的战斗中，他跟随张作霖征战在东蒙草原、沙漠地带，被张作霖誉为剿匪勇士。因他有勇无谋，目不识丁，始终只能担任一个班长而未被提拔重用。

1926年初春的一天，张作霖到奉天

小河沿视察警卫队时，发现在队伍里有一位年过40的大胡子老兵。张觉得很奇怪，就令他出列，这个跟随张作霖征战20多年的徐傻子，跑步到张作霖面前，恭恭敬敬地向张敬了个军礼，然后说：“卫队旅1团1营1连1排1班班长徐傻子前来报到。”这时张上下打量一番，问他：“咱们过去在什么地方相见过？”徐傻子赶忙回答：“大帅，我是跟着你征战东蒙，后来又参加了两次直奉大战。”张作霖忽然哈哈大笑：“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忠勇过人的徐傻子吗？怎么还在当兵，跟着我转战的都是师长、旅长、团长的了，就你还是个兵，连个官都没当上。”徐傻子接过话茬说：“大帅，我斗大字不识一个，甘愿为保卫大帅而当一辈子兵。”张作霖很受感动，眉开眼笑地问：“你现在家里几口人？”徐说：“大帅，我是庙门旗杆——光棍一根，家里还穷，谁能给我说媳妇。”张说：“我今天就封你个少校副营长，你当正职干不了，当个副职的小官还是没问题的，你当了官就有人给你找媳妇了。明天我给你放一个月假，带几个当差的副官，回到西边外去说媳妇，说不来媳妇别来见我，另外我还奖赏给你200块大洋。”徐傻子一听，又给张大帅行了军礼，说：“感谢大帅对我的提拔。”然后回到队列里。张作霖说：“卫队旅的官兵们，你们要向徐傻子学习，学习他忠心耿耿去做人，为人要讲义气，不可三心二意。以后只要大家跟我一心一意，不要心眼，我绝不会亏待大家。有本事的将来可以当师长、旅长、团长。没有本事的只要一个心跟地干，也得给个副职的小官，到那时说个媳妇还是没问题的。”他拍着胸膛激动地说：“我张作霖是讲义气的，大家只要好好干，除了我老婆不给以外，剩下什么都行，就怕你们没有能力……”在场的官兵热烈鼓掌，一致高呼：“誓死保卫大帅，一切行动听大帅指挥。”

张作霖视察完部队之后，卫队旅就给徐傻子发了少校军服，并召开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在就职仪式上徐傻子说：“弟兄们，

我是个傻大黑粗的人，斗大字不认一个，只知道一个心眼地干，我也不会说啥，以后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第二天，徐傻子带着几个副官，骑着高头大马，回到自己家乡。乡亲们都说他占了大帅的光，升官发财了，真是有福气。

邹芬吞金而死



奉军名将邹芬，满族，别名芬雨田，1882年生于义县大凌河畔河夹心。其父邹永在家务农以种田为生。邹芬弟兄六个，他排行老四，祖籍山东。

邹芬少时家境比较贫寒，只读过几年书，曾给地主放过牛。大约在1900年前后投奔到增祺将军麾下当兵。由于他能逢场作戏，善于交际，胆量过人，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哨长等职。不久邹的一些人马被编入张作霖的奉天巡防营，张任该营前路统领。与此同时，邹芬也被提拔为巡防营第4营营长。

从此以后，邹芬开始跟随张作霖征战东蒙，围剿陶克陶胡。辛亥革命后，邹芬又跟随张作霖率部回奉天镇压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此时邹芬也随着张作霖扶摇直上，被张任命为该师53旅160团团团长，驻守营口。

1915年12月，袁世凯准备当皇帝。张作霖为了讨好袁世凯骗取饷械，拟派代表赴京朝贺，但是一时还找不到一个

合适的人选。因赴京的代表必须懂得朝廷的大礼，经人推荐，邹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他过去多次跟随增祺、徐世昌、赵尔巽等历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进京入朝拜见光绪、宣统皇帝，深懂朝廷大礼，当年光绪帝还赐给他一张入朝通行证，即一条用黄绸布写的，并加盖大印）。

邹芬被请进师部后，张作霖对他说：“邹老弟，此次请你来，是准备派你为代表团团长，带着礼物去京城朝贺袁大总统当皇帝，你看怎么样？”邹说：“张师长，我进京可以，不过我身价太低。”张说：“这好办，我封你为少将，明日带着几个随从立即赴京。”邹芬高兴地说：“谢张师长提拔，保证完成任务。”说完，邹去准备行装。第二天他就带着几个随从，拿着一些金银珠宝赴京朝贺袁世凯去了。

邹芬到北京拜见了袁世凯，并代表张作霖说了很多恭维话。袁很满意。邹芬在京城住了几天，就回奉天，袁世凯下令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在袁看来已是破格笼络。但“抱有封侯大志”想当督军的张作霖，听说是封他二等子爵，大失所望，甚为不满。他询问左右：“子爵是怎么回事？”左右有人告诉他“子爵下于伯爵一等，上为公侯。”张不高兴地说：“吾何能为人作子。”遂立即“递呈请假”，以示反抗。袁世凯后来派段芝贵亲自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袁采取了调虎离山的手段，调张任绥远都统，张作霖竟一口拒绝。

同年12月底，蔡锷于云南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西南各省也称兵独立表示支持蔡锷讨袁，四面楚歌的袁世凯想依靠军阀的武力挽回局势。1916年初，他又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此次赴京邹芬又陪同张作霖前往。到京后，张作霖表示愿意派兵南征，袁当即决定给张作霖大批饷械。张得到饷械后和邹芬回到奉天，提出“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开始驱逐段芝贵，乘袁垂危之机，张夺取了奉天督军大权。

1918年1月，北京政府冯国璋从日本购置3万多支各种枪械，张作霖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请包瞎子算一卦（包瞎子即包秀峰）。“卦问得吉”，立即派张景惠、邹芬和丁超到秦皇岛去执行劫夺军械的任务。到秦皇岛后，张景惠、丁超和冯国璋领取军械的官员，聚赌饮酒作乐，而邹芬带领了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连的兵力将车站占领，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押送军火，强迫车站站长让车头调转方向开往奉天。与此同时，邹芬又派一个营外加一个机枪连的兵力包围了冯国璋领取军械的官兵。邹向他们宣布：“我们奉军今天不是来抢枪，而是袁大总统在位时向奉天政府借过很多枪支弹药，现在该还给我们了”，张作霖用这些枪支增编了七个混成旅。邹芬因劫军械有功，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暂编第1师少将师长。由于邹芬跟随张作霖多年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又非常器重他的军事才能，1921年9月破格提拔邹芬为奉军第16师中将师长。

邹芬不但在军界官运亨通，而且在经济上通过各种渠道大发横财，他在家乡建筑了仿古式公馆和家庙，购置了大量土地出租给农民，还在奉军中培植个人的势力，他的两个侄子邹廷兆、邹廷庚分别被提拔为炮兵团长和步兵团长。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任命邹芬为西路军第二梯队司令，统率第16师和暂编奉天省陆军第6混成旅鲍德山的部队驻扎西苑。同年5月4日，吴佩孚亲率2旅从左侧面袭击西路军，西路军司令张景惠乘专车离开前线逃回天津，造成西路军群龙无首，作战被动，军心不稳。邹见此情景，私自派密探与吴佩孚联系，准备弃张投吴。

吴、邹通过密探联系，在一个村庄里秘密会晤，达成口头协议，吴答应邹降吴后给个军长当。邹在前线带领16师，接受直军改编。使奉军整个西部战场全线溃败。造成奉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东路军的阵地相继失守。只有张学良与郭松龄部，

尚能有秩序地撤退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最终以奉军失败告终。

两年后，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奉系大获全胜，邹芬觉得要想当官还得靠张作霖。于是就和汤玉麟取得联系，要求回奉军任职。汤考虑邹芬是自己的辽西老乡，又跟随自己多年，还曾经给张作霖立下过汗马之劳，所以汤就亲自去找张作霖，张说：“邹芬这小子，他妈个巴子的，竟看风使舵，太不讲义气，一次直奉大战投了吴佩孚，差点使我们奉军全军覆灭，还想回来当官，没门。念他当年给我出过力，死罪免去，让他解甲归田吧。”后来邹芬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没脸见家乡父老，一气之下吞金而死。

才貌双全的寿夫人



张作霖一生共娶了六位夫人。原配赵氏，黑山赵家庙人。继配卢夫人，北镇县人。戴夫人，北镇县人。许夫人，天津人。寿夫人，奉天人。岳夫人，河北人。她们在为人处世、社交等各方面，各具特色，各有其能，而张作霖最喜欢的是寿夫人。

寿夫人，系清末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王氏小夫人所生。她的真名寿懿，别名王雅君。寿夫人从小就生活在高级将领家庭，经常和一些官员及社会贤达打交道，见过大世面。她自幼聪明伶俐，再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她自幼就成为一个通情达理，很有见识的女性。同时还能做到一般女性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在外交场合，寿夫人能做到假戏真演，真戏假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假乱真，使对方难以看破。因此，很多和她打过交道的人物，都说她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敢做敢为的杰出女性。她利用自己的才华为张作霖出谋划策，为张学良稳定东北的局势做出过重大贡献。

自古以来，在婚姻方面，不同层次的人物择偶的条件也不同，不同层次的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张作霖与寿夫人的婚姻，即是高层次官员对高层次女性的选择。所以寿夫人才能在稳定张氏家庭与巩固东北军政大权的政治活动中，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提起张作霖与寿懿结为夫妻的话题，那还得从头说起。寿山将军去世后，寿懿的母亲王氏受到寿山原配的歧视，带着女儿回到奉天老家居住。王氏文化不高，但很有见识。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像自己一样受到歧视，她要女儿多学点文化知识，以出人头地，立足于社会。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时代里，女孩子到学堂里读书，实属罕见。可王氏却毅然送女儿寿懿进学堂，使她从小学一直读到中学。

在读书时，寿懿在学校所用的名字叫王雅君，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堪称优等生。

1912年，张作霖所部被改编成国家陆军第27师，张任中将师长。他虽是只读过几天书的草莽英雄，可他率部进驻奉天当上师长后，却非常重视教育；注重培养人才。他经常到省垣第一中学、第一女子中学和商业学校视察工作。年末的一天，奉天省垣第一女子中学举行毕业典礼，张作霖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毕业生代表发言时，年轻漂亮的姑娘王雅君走上讲台，只见她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她的讲话和姿色打动了张作霖，张聚精会神地倾听，并对在场的人说：“他妈拉个巴子的，这个小姑娘还真有词。”并问旁边的人：“她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这就是省垣第一女子中学的校花王雅君。张作霖高兴地说：“妈拉个巴子的，她真是才女，真他妈的有两下子，不简单。”张喜欢王雅君的消息传出后，当时校长、几位老师及省城的一些要员都到王雅君家，给她说亲。王氏母女俩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作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王雅君得到张作霖的赏识，一跃而成为贵夫人。她到张家后开始改用寿懿这个名字，后来很多人都称她为寿夫人。

寿夫人当上张作霖的五太太之后，张经常带她出人外交场合，接待各国使节和高级军政官员。她每次都用自己的智慧和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打动对方的心，圆满地完成涉外活动任务。张作霖见她确实有才能，有时还经常带她去检阅部队，张发表演讲后，她也发表演讲。有一次，她在奉天北大营的阅兵式上说：“各位将士，各位弟兄们，大家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升官发财，来到部队跟着张师长当兵。只要你们大家好好干，想当官到时候立了功，就让你们升官。不想升官的弟兄，打仗立了功，受到奖赏，到时候回家买几垧地，当个小地主，发家致富，娶妻抱子，给乡亲们看看。跟着张师长干的都有出息。我在你们师长面前保证给大家美言几句，大家好好干，立功才能升官发财。”她的讲话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说寿夫人的讲话讲到我们心里了。张作霖听了也非常高兴，认为寿夫人真给他壮脸。因此寿夫人到张家不久就有了很高的地位。

寿夫人不但在政治外交场合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而且还能用温情与柔情打动张作霖。张很喜欢地方戏，她就在张高兴的时候给他唱几段《大观园》等段子。当张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决不与张发生冲突，常常以疏导忍耐的办法与张谈话，使张佩服而欢心。为了增进和寿夫人的感情，他于1915年专为寿夫人建了一幢楼，即小青楼。

寿夫人在帅府有很高的地位，她懂得和气生财、笼络人心的重要性。有一年过中秋节，张氏家人老少共享天伦之乐，张作霖一边喝酒，一边发表祝酒词，寿夫人见时机已到，即委婉地说：“大帅，今天我们张家欢聚一堂，喜庆东北的丰收之年，全东北的父老乡亲全借大帅的福气，才有今天的盛世。”张作霖一听这话忙说：“还是老五会说话。”接着寿夫人又说：“我看哪，咱们

今天再加两桌让老妈子、丫环都入席共同庆贺庆贺，让大帅再高兴高兴。”她的话刚说完，张作霖立刻就说：“还是老五想得周到，赶快再加两桌。”

1923年秋天，张作霖到天津从事军政要务。在此居住期间，一些官员为了讨好张作霖，将天宝班的七八个姑娘送到张作霖面前任张挑选，张挑选其中一个高个漂亮的女子，她就是马月清（后来人称岳姑娘，岳夫人）。张作霖说她有福相，就经常和她在一起居住。张回奉天后，也经常想起岳姑娘。有时心事重重，沉默不语。寿夫人见张有心事，就柔声细语地追问，最后张作霖才说出实情。寿夫人对此心里很不满意，但她表面上对张仍以温情相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寿夫人认为，张作霖想办的事谁也挡不了，还不如将岳姑娘请到帅府，以满足张作霖要求，于是她亲自去天津，将岳姑娘接到大帅府，后来立为六夫人。通过这件事张作霖更加信任寿夫人了。寿夫人宽广的胸怀是一般女性不能与之相比的。

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命归西天。此时，担任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正在河北邯郸与晋军作战。

为了封锁消息，稳定东北局势，等待张学良回奉天主持东北军政大计。寿夫人带领几位夫人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及其他所有家庭成员强忍悲痛，守口如瓶，滴水不漏，禁止亲日派人物入内宅，她让杜医官天天到帅府“为张换药”，填写诊断处方等；让帅府所有的人员和往常一样，说说笑笑，载歌载舞。她与几位夫人和于凤至及老女士们照样浓妆艳抹。在此期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多次派他的太太和其他官员前往帅府，以看望张作霖为名打听真实消息，均被寿夫人等婉言拒绝。

有一次，寿夫人和于凤至等在帅府接待了几位日本外交官。他们问：“大帅的身体如何？”寿夫人愤怒地说：“他妈拉个巴子

的，不知是哪个狠心的王八蛋，给大帅炸伤了一支胳膊，现在大帅心情不好，不愿见人，正屋内休息呢。”日本的外交官都信以为真，认为张作霖只是受了点轻伤，日本人得知张还活着。没敢轻举妄动。

张学良得知大帅在皇姑屯遇难的电报，立即将三、四方面军逐步撤到滦州。为防日人暗算，他化装潜回奉天。等一切布置妥当后，于6月21日才公开宣布张作霖被炸身亡。

寿夫人、于凤至及张作霖的其她几位夫人导演的这场“假戏真演”，为张学良回东北执掌军政大权赢得了时间，为稳定东北局势做出了较为重大的贡献。

张作霖故去后，寿夫人一直孀居，解放前夕由天津赴沪后去台湾。在台湾每当寿夫人生日，张学良都去祝寿，称寿夫人为姨妈，直到寿夫人1966年病故（终年70岁）。

笑 话



有一次张作霖给一个外国的外交官题词：“道德为心”。外交官说：“大帅你没签名。”于是张作霖又拿笔签了“张作霖手黑”。秘书拉着他的手说：“大帅你写的那个墨字缺个土”。张作霖灵机一动笑着说：“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知道啥，我张作霖手黑寸土不让。”在场的人听张作霖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随声附和说：“对，大帅说的对，中国的领土寸土不能让。”

还有一次，张作霖因将“派”字写成“抓”字，使干兄弟蹲了3个月牢狱。当年他在辽西阜新、黑山、北镇等地结交很多朋友。特别是在他遇难之际，还认了很多干老和干兄弟。他靠这种认干亲的办法多次逃出虎口，幸免于难。张作霖当上了督军和大元帅之后，凡是对他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他都一一报答。

有一年的冬天，张作霖的一个在黑山县赵家庙的赵姓干妈对她大儿子说：“小子，咱家现在很穷，我打发你去奉天找张大帅，他是我的干儿子。他当胡

子时，我救过他的命，让他给你找个挣钱的差事。”大儿子按照母亲的旨意到奉天大帅府，见到了张大帅。张大帅问他：“我说干兄弟你来奉天想干个什么差事？”赵某说：“大帅大哥，我一没文化，二又胆小，让我当武官和文官都干不了，找个轻活还差不多。”这时张作霖接过话茬说：“他妈拉个巴子的，我兄弟干点什么合适呢？”正在思索之际，奉天省警务处来了一官员找他办事。张心想还不如让我兄弟当一个监狱看守，于是他写了一个“抓事”条子（其实他想写派事）交给这个官员说：“你把他带去按条子处理吧。”这个官员也没细问，张作霖也没细说，赵某就跟这个官员走了。官员仔细一看，条子上面是张作霖亲笔写的“抓事”，以为赵某在张作霖面前犯了错误，令他把赵某抓起来。于是就把赵某带到一间监狱小号关了起来。赵某一再解释，张大帅是他干大哥，可这个官员说：“你别冒认官亲。”

事隔3个月后，张作霖的干妈来奉天看儿子，张作霖这才想起来说：“老干妈，我把他安排在监狱里当看守，现在就把他叫来。”说着就给监狱长打电话，对方回话说：“大帅，现在他正在这押着呢！”张作霖一听这话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我让他去你那儿当看守，你们却给关押起来了，简直是胡闹，非毙了你们不可。”对方立即回话说：“大帅这有你写的条子让我们抓的。”他没把话说完，张作霖气愤地说：“我他妈的能写那个条子？他是我的干兄弟。”对方说：“那好，大帅我们连人带条子都一起给你送去。”当把赵某和条子送到帅府时，张作霖一看笑着说：“咳！我还真写错了。人不念书没文化还真不行。”接着他说：“不怪你，不怪你，这都是我的错，你回去吧。”张作霖打发走了这个官员之后，向干妈连鞠躬带敬礼地认错，并说要在奉天养活他干妈，可他干妈和干兄弟说什么也不在奉天呆了，非要回家不可。无奈，张作霖给他们很多钱，并派十几个官兵把他们母子俩护送到赵家庙。并在赵家庙给他干妈买地盖房子。在黑山一带上

了年纪的人因此都说：“张作霖真讲义气。”

1923年秋，正值东北大学建立不久，张作霖在校长王永江的陪同下前去视察，正赶上同学们在球场上比赛篮球。张作霖见很多人争一个球，累得满头大汗。他对王说：“咱们东北就办一所大学，为的是培养人才，别把学生都累坏了，你明天多买几个篮球，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拿着玩。”后来他见有人一吹哨学生就不抢了，这时才明白，说：“他妈拉个巴子的，大老粗真不行，尽出洋相。”

有一次，张学良的一个儿子在听张作霖给军人讲话：“妈拉个巴子你们听好，这次妈拉个巴子的仗，你们妈拉个巴子不给我打好，打妈拉个巴子败了，我们妈拉个巴子都妈拉个巴子完蛋，妈……”张讲完话，在场的顽皮孙子对他说：“爷爷，我数了一下，你妈拉个巴子讲了很多遍。”气得张大帅直吹胡子。

沟通红军与张学良

联系的使者高福源



高福源,字少卿,1901年生于奉天(今辽宁)省营口县(原属海城)博洛铺乡马家屯村。祖籍河北盐山县。清顺治年间,举家逃荒至东北落户。其父高玉麟因家贫外出谋生,后入保定武备学堂习武,在绥远任过管带(即袁世凯部下的骑兵营长)。因母亲早故,他由婶母抚育成入,十余岁随父至绥远,曾入北京汇文中学就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感于内忧外患,国事日非,遂弃学从戎,1923年考进东北讲武堂第五期。1925年10月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1929年春,任东北陆军第一旅79团少校团副。是年,该旅成立步兵研究班附设步兵教导队,他任队长。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代蒋受过,通电下野,4月11日携眷出洋。此后,高福源同东北军的其他官兵一样,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内心充满忧伤和愤懑,处境甚为艰难。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欧洲回国抵沪,2月7日,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

代行总司令职务，驻屯武昌，旋调师南下，致使东北军误入歧途。是年春，67军由河北廊坊调驻河南信阳、潢川、商城等地，向红25军根据地豫鄂皖边区进犯。高福源带619团在商城西南地区与红军交火，屡屡受挫而不肯认输。后调到东北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深造，因九·一八事变猝发而中辍。事变次日，他被任命为中校团副，本欲率部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东北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遂撤入关内。

1933年3月，东北军王以哲部奉命改编为67军，高福源任该军上校参谋处长。是年秋，改任107师619团团副，被王誉为有胆有识的好军官。当时正是长城抗战的紧张时期，他积极投身抗战，由于南京政府本无抗战决心，未予有力支持，终于后撤。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由豫鄂皖根据地转进陕南、陕北。高福源随67军尾追红军入陕，驻扎郿县（今改富县），对红军再次展开进犯，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一役，619团及一个营（107师师长刘翰东临时将621团的一个营配属给高指挥），被红军歼灭，高负伤被俘。

为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对俘虏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待之如宾，他们的生活一般都优于红军。高福源同其他负伤被俘官兵一样，都得到红军医务人员的精心医护。他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上级发给他们材料，让他们学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所发材料，高福源都感到特别新鲜，往往一口气读完，尤其是工农红军的“八一”宣言，他贪婪地连续阅读了多遍，宣言里的抗日主张，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使遭受蒋介石谎言欺骗的高福源如大梦初醒，茅塞顿开。那种被俘时“不知吉凶”的恐惧心情云消雾散，成为如饥似渴的学习积极分子。^① 百忙中的周恩来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的思想转变，亲临学习班，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做报

^①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49—51页。

告,形象生动地阐述了抗日的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周恩来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给高很大启发和鼓舞。他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主动向彭德怀建议:张学良、王以哲都有抗日要求,东北军将士更是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意图,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对高福源说:张学良如有诚意,中国共产党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① 193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派兵护送高回到被红军包围的甘泉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被红军围困在城内的挚友——周祖尧(东北军的一位营长)现身说法,说明东北军应与红军合作,收复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的道理。指明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与红军打仗,是怀着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险恶用心。他拒绝了周让他留下来共谋守城之策的要求,认为甘泉城是守不住的,不愿再当第二次俘虏,并一再向周剖陈利害,才打消了周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愿望。第三天高临回苏区前,再三叮咛周,只有与红军联合才有出路。没有粮食吃找红军解决,可不要把东北军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无谓牺牲。^②

两三天后,周祖尧接到高福源从苏区托人带来的信,告诉他红军愿与甘泉守军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希望尽快派代表去谈。周征得守城指挥官张文清同意,派他的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到红军驻地左道铺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并达成协议: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城北门外二华里的空场上设立市场,自由买卖。从此,红军与守城的东北军成了友好邻居。当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红军路经甘泉城时,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在城墙上鼓掌欢送。红军指战员高呼: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城上

① 《西安事变简史》,第23页。

② 《回忆高福源烈士》,《革命英烈》1986年6期。

城下激荡着团结抗日的口号声。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其中也包含着高福源奔走斡旋的心血。

高福源返回苏区不久,又给他的老友佟道(驻洛川 67 军代参谋处长)写信,叙述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并请佟道代为转达他要回洛川军部面见王以哲的要求。当时王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得知此信,即令佟道将高秘密接回洛川。王以哲与赵镇藩(军参谋长)和高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乘飞机亲临洛川。高向张学良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采纳了高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1936 年 1 月 16 日,高返回苏区,向红军领导机关汇报了和张学良、王以哲谈话的情况,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出发前,高再赴洛川,约好红军和东北军王以哲部电台的联络呼号、密码。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2 月 21 日,李克农一行 6 人,由高福源引导从瓦窑堡出发,25 日抵洛川。赵镇藩予以接待,并密电张学良。张因去南京开会,电嘱王妥善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回洛川后再谈。经双方协商,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3 月 3 日,张学良飞回西安,4 日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除同意双方已达成的局部停战协定外,并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今延安)和张学良会晤。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

1936 年 9 月以后,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身边继续做与红军的

联络工作。在张的支持下,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红军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他说,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对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那些饱受流浪之苦的东北军子弟,都深为他的讲话所感动,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

“西安事变”前夕,高福源曾奉命去马步青部作联络工作,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派他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剿共”内战、立即抗日的主张,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政治、军事兼而有之的“外交”任务。

“西安事变”后的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如何挽救张学良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矛盾激化。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不顾大局的少数盲动分子一意孤行,将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杀害。高福源是东北军中尽人皆知的进步分子,又是中共秘密党员,^①一直受到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信任和重用。“西安事变”前,被张学良派到105师任少将旅长,遭到该师师长刘多荃等保守分子的嫉恨。他是坚决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对王以哲是特别敬重的,根本没有参与杀王事件^②。并且在事件发生后,为缓和已经激化了的矛盾,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欲向刘多荃说明真相,以挽危局。不料刘已回师西安,借机令二团团团长葛宴春(高福源的部下)于2月4日^③在西安将高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其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

① 《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② 《关于高福源烈士是否参与“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现存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③ 高福源被诱杀的时间有几种说法:商同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是2月4日;张政枋说是2月3日;还有人说是2月5日;此文采用了商同昌和吕正操回忆文中的说法。

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当地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将烈士的骨灰和遗像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高福源之所以能由一位曾参与“剿共”的旧军人,转变为一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除了受共产党人的耐心教育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外,主要还在于他自身的内在因素。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有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1934年驻军商城时,他曾与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商谈抗日大计。他认为不能坐视寇深祸急,拱手把大好河山让予他人,愿率一旅之师,打回老家去。若能唤起国人抗战,虽死不悔。他为人豁达爽直,嫉恶如仇,即是对顶头上司直至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也敢直言净谏。为了抗日,他敢冒杀头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成为在西北“剿共”战场上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信使。他治军严谨,训练中常以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为楷模,教育官兵;下级违法,既不宽恕,又善教育,受到官兵拥戴。他喜爱读书写作,任团长时,所需军事教材,如《步枪射击操典教范》、《历史上的军事故事》等,都亲自编纂。他自苏区返回东北军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政治和历史。清理他的遗物时,保留的书籍中就有《大众哲学》、《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等进步书刊。他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勤于学习,立足实践,追求真理,弃旧图新,逐步由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确保台湾入版图

——读张学良《谒延平祠旧作》



1990年5月底，抗日名将吕正操收到张学良从台湾托带的信函：“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谒延平祠旧作，书寄正操学弟正，九十老人毅庵书”。

“延平祠”即延平郡王祠。民族英雄郑成功曾被清廷追封为延平郡王，在台湾建祠，又称郑成功庙（谥“忠节”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典）。张学良到台湾后，拜谒该祠，触景生情，赋诗纪念郑成功。称上诗为《谒延平祠旧作》。因为张学良毕业于东北新办讲武堂第一期，吕正操为第五期毕业，所以称吕为学弟。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是年6月3日，正是他90寿诞，故自称“九十老人毅庵书”。

郑成功（1624—1662）生于日本平户千里滨，乳名福松。父亲郑芝龙，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乡人。母亲日本人田川氏。郑7岁回国，15岁考中秀才，21岁入南京国子监，成为太学生，称“稚

儒”。清兵入关，南明福王在金陵称帝，封郑芝龙为福建总兵。清兵破金陵，郑芝龙等拥福建唐王为帝，并送郑成功入侍。1646年清兵入闽，唐王兵败被俘，郑芝龙率部降清。郑成功哭谏其父不听，次年1月，在泉州羊川镇孔庙里焚烧儒服儒冠，投笔从戎。宣称自己是“孤臣孽子”（张学良在东北沦陷后，也常称自己和东北军是“孤臣孽子”。1936年6月22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才能对得起作了若干年奴隶的东北父老姊妹！才能对得起忠勇的抗日志士、死难的同胞们！”）

郑成功率兵反清，义无反顾。郑芝龙多次以父子之情劝降，清顺治帝屡屡以高官厚禄诱降，均被拒绝。郑成功先后奉南明隆武、永历年号，始终以明主为正朔（即“尊明朔”），誓不降清。其民族气节，极为鲜明！

郑成功抗清受挫，退居厦门时，海峡对面的台湾仍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解除民困，变台湾为抗清根据地，1661年3月23日，郑率船舰200（一说900），兵25000人，由金门出发，远征台湾。台湾人民箪食壶浆，迎接郑军。4月5日，荷兰总督变卦，只愿年奉白银，不想撤走。郑成功拍案痛斥：“台湾者中国土地也，地当归我！”双方重新开战，郑成功部打败了从爪哇前来助援的卡龙殖民军。郑军围困赤嵌城8个月，城内水源断绝。1662年2月1日，荷兰侵略者被迫献城投降。沦亡38年的台湾宝岛，终于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是年6月23日，郑成功逝世，年仅39岁）。

张诗的前两句是歌颂郑成功高尚的民族气节，后两句是说郑成功的丰功伟绩，不仅仅在于反清复明的决心与行动，更重要的是光复台湾，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诗言志，正当由张群发起，台湾各政要参与，给幽居54年的张学良公开祝贺九秩大寿的前夕，张学良书寄吕正操《谒延平

词旧作》，以热情歌颂郑成功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反对分裂祖国、渴望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可见他虽已 90 高龄，仍以“台湾人版图”为念，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6 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深入人心。在这一形势下，张的抗日救国思想进一步升华。他与杨虎城将军于 12 月 12 日发动“西安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促成二次国共合作，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获取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送蒋返宁，从此失去人身和政治上的自由，但始终不忘爱国初衷，反对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渴望和平统一。

1991 年 5 月，张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能有贡献很愿意”，“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他对台湾经济繁荣，中国大陆在国际上地位提高，感到特别高兴。他说“作为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很不愿意双方分裂。”可见他到台湾后一直关注着两岸和平统一，共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融化了海峡两岸的坚冰，20 年来，两岸人民来往频繁，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但是，台独分子决不会善罢甘休。而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妄图插手台湾。他们炮制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公开上映，明目张胆地为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招魂，为侵华战争翻案。还有人扬言把日美安全防卫条约所谓“周边事态”范围扩大到台湾，公然干涉我国内政。此时此刻，我们重读张将军的《谒延平祠旧作》和重

温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一定要“永远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的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繁荣昌盛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拜见了张学良



去年元月 6 日，我应美国斯坦福大学欧森伯（又名奥克森伯格）教授的邀请赴美访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夏威夷和旧金山访问张学良将军及其亲友。元月 8 日，我在旧金山会见了张的女儿张闻瑛（于凤至生）及丈夫陶鹏飞教授、张的挚友宁恩承先生（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等职），分赠《张学良年谱》和我最新制作的《张学良在大陆的幽居历程》录像带等。希望她（他）们也能体谅大陆人民的思张之情，一同促成张回归故里之行。

据张的亲友们讲，张当前不能回大陆的原因并非政治问题，而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他们不仅靠坐轮椅行动，而且赵一荻身患多种疾病。前年他们要去给宋美龄庆贺百岁华诞，因医生不同意坐飞机而作罢。

元月 12 日，夏威夷的天气特好。蔚蓝的天空，时而飘来朵朵白云，檀香山的风光显得格外秀丽：绿树成荫，花草铺地，各式建筑，鳞次栉比，茫茫大

海，万里浪涛。整个檀岛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张将军居住的公寓和中华第一基督教堂就坐落在这里。上午9点多，我终于盼来了昼思夜想的伟大爱国者张学良。他与赵一荻乘坐一辆印有“残疾人”标记的特制面包车，来到教堂门前的草坪上，在服务人员的协助下，乘轮椅下车。我赶忙上前向张将军说明来意，面送《张学良年谱》、《拯救民族的伟业——实现全民抗战研究论文集》（张梅玲著），转交其亲友托带的新年贺卡、信件等。张将军身心健康，精神矍铄，只是听力、视力不好。我躬身贴近他的耳旁大声说：“吕正操将军和宋黎先生特意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他点头致谢。当我说到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他，希望他回老家看看，他在大陆居住过的地方大多数都被当地政府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他拱手说“谢谢”。他送我《毅获见证集》，内称：“在我的一生中，我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但是却一事无成。”前者千真万确，后者显然是自谦。事实已证明，他一生爱国，矢志不渝，即便信教，仍不改爱国初衷。是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杨虎城将军力挽狂澜，发动西安“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抗战。是他，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给予支持。1936年10月10日，他派刘向三给红军送去5万法币，12月4日，由叶剑英经办，给红军10万块银元。还送过一万套冬装和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电讯器材、中西药品和多种慰问品。邓小平当时在甘肃庆阳一带正患伤寒，还吃了张学良送的炼乳。是他，身陷囹圄不丧爱国之志，数十年如一日，置个人名利、荣辱、生死于不顾，念念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昌盛。1990年6月，在台湾由张群等人发起，国民党各政要参与，为幽居54年的张学良公开庆贺九秩大寿的前夕，他书寄吕正操将军《谒延平词旧作》：“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

湾人版图。”可见已经 90 高龄的张将军仍以“台湾人版图”为念，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吕正操于 5 月 31 日电贺张将军 90 华诞，并和诗一首：“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以此讴歌张将军的历史功绩。

1991 年 6 月，张吕美国会晤时，张对吕说：“在我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与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我虽然 90 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正因为张将军有大功于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直在关怀、思念他这位千古功臣。1960 年，周总理托友人到台湾巧妙地转交将军一纸条，上书：“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张看后心照不宣。1975 年 9 月份，周总理身患癌症时，从一份《情况反映》上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疾，且有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提笔用颤抖的手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想办法给以帮助。周总理还不放心，又在批示后加了三个字：“托！托！托！”是年 12 月 20 日，周总理在沉疴感到不久于人世时，再三嘱咐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1990 年 6 月，邓颖超电贺张将军 90 大寿，电称：“忆昔 54 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忧，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民敬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必欣然面自慰也。我和同辈朋友们遥

祝先生善之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张学良也常常思念老朋友周恩来。1996年，当记者请他对国共两党当年历史作简要回顾时，他说：“当年的‘剿共’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人心在共产党一边，所以才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当记者问他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他答道，“是周恩来。”当他得知邓颖超病危时，曾表示希望能和张将军再会一面时，感叹地说：“没能再见周恩来先生和夫人，这也是我的终生遗憾。”

今年6月3日，正是张将军99华诞。我们祝贺他的生日，就要学习他“息争御侮，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繁荣昌盛而奋斗！

爱国何所罪 青史有定评

——张学良爱国获罪略析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爱国者。他赤胆为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一心以救国为己任，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在极端屈辱的逆境中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而今已过九十高龄了。

回顾张学良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他的一贯思想。直到现在他仍然热爱祖国，矢志不渝。1990年，他在祝寿会上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会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将军的这一不朽诗篇，充分表达了这位“千古功臣”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下面就以张学良在不同时期几个重大事件中的态度、作为，及因爱国被蒋介石无限期“管束”，作一略析。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息争御侮是张学良的一贯思想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序幕，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愈演愈烈，犹似狂潮。进入民国之后，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据地称雄，横征暴敛，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偌大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任人宰割。长期处于日、俄帝国主义夹击和控制下的东三省犹为破碎江山的悲惨缩影。生长在这样时代的张学良，自幼就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蹂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横行霸道，使他萌发了爱国抗日的思想意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特别欣赏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崇拜的历史伟人，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清末的丁汝昌，以及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当他的父亲张作霖希望他成为一代君王的李世民时，遭到他的严正拒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高尚的品格和志向，尽管他是大军阀的儿子，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却驱使他在思索和寻觅着改变中国命运的途径。

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张学良，从一个军阀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转化为反抗侵略、投身救国拯民的潮流中来，却又有他特定的思想意识为基础。

第一，他意识到，抵御外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看来，只有国家的凝聚和结合才能迸发出一致对外的巨大力量，这是反帝爱国的必要条件。

张学良原来是希望学医治病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19岁就入了讲武堂，开始其军事生涯。他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

为利，他当初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1927年1月3日，汉口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游行队伍在江汉关前遭英国水兵刺杀。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向码头罢工工人寻衅，杀伤多人。这两起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事件，时称“汉浔惨案”。当时的张学良还是站在北伐军的对立面，是与北伐军干戈相向的。但是，1月12日他在北京与英国某要人谈汉浔惨案时却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①是年春，他在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写道：“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②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于22日午后全部占领上海。当时张学良正在郑州督战，即与奉系将领韩麟春自河南前线联名发出对时局的通电，表示“期在地方共得安局，人民悉循正轨，并望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共挽颓流。”^③24日，当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占领南京时，帝国主义竟疯狂炮轰南京，造成军民重大伤亡。张学良得讯后，立即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各方息争御侮，“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1928年春，张学良从河南前线返回北京，力劝其父退兵出关，结束内战，南北统一。撤军时，他坚决制止炸毁弹药库和铁路桥梁，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的东西，应该用于保国卫民，一旦炸

^{①②③}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98、104、106页。

毁势必造成巨大损失。在最后撤离北京时，张学良命令驻南苑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宁可被阎锡山、冯玉祥部队全部吃掉，也不许使北京居民包括外国驻华使馆，外侨受到侵扰，无辜死一人、抢一家、失一物，这一做法受到各方赞许。而事实上避免了一次以日本为主的驻北京东交民巷和天津各国租界的驻军以保侨为借口进驻北京“维持秩序”，给北京和天津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东北的狼子野心。他为东北三省的前途计，怀着“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改革”的强烈愿望，毅然于同年7月19日指令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宣布该省“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① 日本政府对此举极为不满，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面对这种蛮横的政治讹诈，张学良毫无畏惧，予以有力回击。他断然宣称：“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② 并表示，“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寥寥数语，义正词严，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外力的崇高的民族气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通电东三省易帜。

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证实，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前所时刻考虑的已不仅仅是自己一派势力的消长与恩怨，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实力与地盘，而是从大局出发，息内争，御外侮，以解救濒临危亡的祖国。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他当时还不可能意识到，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来掌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这种强烈企求

^① ^②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6页。

统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期一致对外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他的爱国思想，带有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为了外抗强权，他极力谋求增强国力，同时不惜一切来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

张学良主政东北前后，为了与日本抗衡，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抓教育、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为东北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为了钳制南满铁路，继修“沈海、吉海、大（大虎山）通（通辽）铁路之后，又修筑了洮索、齐昂等铁路，建沈阳北站、东站。”^③ 为了减少对大连港出口货物的依赖，他修筑葫芦岛港口，作为东北的吞吐港。他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肇新窑业公司、兴奉铁工厂和东北大学工厂等。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他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新建迫击炮厂，支持迫击炮厂生产汽车，还积极准备建立奉天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汽车装配厂。从而为对付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进攻作好物质准备。张学良尤其注重教育、培养人才，1922年他就捐给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5万银洋，用于修建校舍。为了改进教育事业，他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会，捐赠私产500万元，创办同泽中、小学，还应邀担任了辽宁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慷慨捐助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活动基金。他还重视高等教育，积极发展东北大学并兼任校长，“重金聘请章士钊、梁漱溟、梁思成等国内一流学者到东大任教。另外还扩建讲武堂等，培养东北军的将才。这些都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张学良易帜和建设现代化东北的惟一目的，是实现国内统一团结，富国强兵，一致抗日。但此后两年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事与

^③ 参见礼广贵：《张学良将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愿违。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之战，1930年4月，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真是内战频繁，国无宁日，哪里还谈得上抵御外侮呢？张学良审时度势，认为尽管蒋介石是个贯耍阴谋的政治家，但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还是全国的中心，支持这个政府，才能实现全国统一。而与之对立的，由阎锡山等人在北平成立的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利害冲突极为尖锐，即使暂时成事，结果必然分裂。为尽快停止内战，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拥蒋通电，并以调停各方争战为名派兵进驻平津。自此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迅速结束了延续数月的空前规模的新军阀混战局面。张学良之所以在这场中原大战中扮演了收场的角色，应当说主要还是息争御侮的初衷所决定的。

自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我国东北地区接连挑起事端，频繁寻衅。1931年夏又蓄意制造了中外咸知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寻找借口。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战事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张学良曾急电蒋介石请示机宜。是年9月16日，蒋介石竟于复电内严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这样，蒋介石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了方便之门，使日本侵略军在一夜之间就轻易地占领了沈阳。1932年1月初，蒋介石再度命令数十万东北军毫无抵抗地退入山海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张学良眼看着生养自己的东北三省的沦亡，深感切肤之痛。在蒋介石“绝对不许抵

^① [美]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抗”的命令钳制下，他还千方百计地支持东北各地的民众抗日活动，特遣“救国会”^①常委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等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潜入东北慰问抗日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杨靖宇任政治委员的南满游击队取得联系，这对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随后又向长城各口大举进犯，平津告急。张学良闻讯，立即电召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吕正操（吕进平时任东北军16旅参谋处长，返回时，张委任他为647团团团长）星夜赶赴北平汇报战况，张学良听后立即表示，不借一切收复热河，并命令吕正操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激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②

东北沦陷，本来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所造成，但就在这时，张学良却因东北军奉蒋之命全部退入关内而遭到举国上下的责骂。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竟莫须有地加在他的头上。结果满怀爱国救国之心的张学良，反而冤枉地代蒋受过，在一片谴责和唾骂声中，登上了驶往欧洲的渡轮，出国考察。

张学良主张实力御外，加快国家建设步伐，构成了他强烈爱国心的积极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一厢情愿去依赖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府实现国家近代化，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从这一角度说，这也是他当时爱国热情中仍带有国家主义“超阶级”国家观的一种反映。

^① 1931年9月27日，由东北流亡北平的高崇民、车向忱、阎宝航发起，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车向忱是常委之一。当时张学良曾在物质和精神上给该会以大力支持。

^②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第三，他的爱国思想，又是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他毅然决然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惜献身时，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峰。

张学良去国之日，正是国内局势更加江河日下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逐步伸向华北地区。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继续对日妥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从而使华北门户洞开，给日本随时进占冀、察、平、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蒋介石媚日卖国的政策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爱国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

但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只是消灭共产党，认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他的“心腹之患”。为此，他于1934年初电召张学良回国，随即调张率东北军到豫鄂皖“剿共”，后又调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赴陕甘一带围歼长征中的红军。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之计。他阴谋通过张、杨部队与红军的战斗，造成两败俱伤，好坐收渔人之利。

张、杨在“君命难违”的不得已情况下，加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但是张的部队多次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不给补充，坐观不救，致使东北军陷入困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推动，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抗日是惟一出路。最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形成西北三位一体（即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相互联合）的大好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6年6月13日，张学良在会见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时，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我确信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只从侵略者占领

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侮，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①

是年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出路惟有抗日》的演讲，内称：“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和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他在演讲里对广大东北军官兵说：“假如我的决心动摇，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打杀。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②

同年11月，张学良在向蒋介石请缨抗日的电报中称：“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殒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取下而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而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恳切要求蒋介石下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③他坚信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中华民族。

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哭谏，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蒋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与此相反，蒋介石却将大批军队调到豫陕边境，逼迫张、杨率部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

①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② 西安《解放军日报》1937年1月5日。

③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第114页。

扬言张、杨如不服从命令，即剥夺其兵权。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是月12日清晨被迫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了这次“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也曾用过种种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之。”同时声称：“我们希望国人了解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成内战，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成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①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张、杨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全国人民的推动，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使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张、杨二将军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千古功臣”，名扬海内外。

身陷囹圄 不忘爱国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期间，被迫口头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从大局出发，立即做出释放蒋介石并陪蒋返京的决定。他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

^① 陕西省档案馆藏：《东望》第6卷第6期，随军第67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12日出版。

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① 还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要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更明确表示：“当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② 张学良对于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受到审判和处罚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这也表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是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的。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当他们乘坐的专机飞抵南京后，果不出他所料；立即被蒋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关心着抗日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解往奉化雪窦山一座古刹中拘禁。此时他已得知西安方面为解救他将采取行动的消息。他担心因此而内战再起，抗日无望，于解往奉化的当日即致函东北军高级将领，恳切叮嘱他们“要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并谓：“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③ 同年2月17日在致杨虎城函中亦云：“为国家牺牲无所吝

① 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② 李传信：《论张学良送蒋及被“管束”的前因后果》未刊稿，第5页。

③ 西安事变研究会从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惜，凡有利于国者，吾辈何有尚惜乎?!”他呼吁东北军将领要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勉励东北军广大官兵“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梦寐以求的是及早奔赴抗日前线，他为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而心急如焚，痛苦万分。1938年秋，他曾反复多次向来看望的人表示：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我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

张学良渴望在抗日战争期间能给他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请缨，但蒋对他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他为不能参加全民抗战深感内疚和遗憾，曾痛苦地表示：“自己是个军人，在八年抗战中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②直至80年代初，他还念念不忘没能参加抗战这件事，并引为终身憾事。他曾不止一次地自责说：学良是东北父老的不孝子孙!

但是，造成张学良不能驰骋疆场杀敌卫国的樊笼究竟是谁?是张学良本人吗?当然不是。正是张学良为促成全民族团结抗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岂能违背自己的初衷。寻根究底，正是蒋介石剥夺了张学良这一神圣的权力。因此张学良的遗憾和自责，正是对蒋介石最强有力的控诉!

^①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72页。

^② 沈醉：《军统内幕》，第165页。

蒋介石以怨报德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拥护蒋介石当抗日领袖。释放蒋介石并陪他返回南京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完全出自公心，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但却因此变成了阶下囚，饱尝了五十余载的“铁窗”风味。张学良忠爱国家何罪之有？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冤狱究竟是谁制造的？毫无疑问，制造这起冤狱的正是刚从西安被释回宁，信誓旦旦绝不计较个人恩怨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个阴险狡诈、心胸狭小的人，他所斤斤计较的正是个人的得失与恩怨。丧失东北，明明是他自己下命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逃到台湾，明明是他自己众叛亲离，“剿共”无能，却把丢失大陆的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张学良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陪蒋回宁，蒋却认为西安事变有损于自己的威信，这使他切齿痛恨必欲进行报复。因此，当他一回到南京，立即自食其言，把陪送他的张学良先是送军事法庭审判，“特赦”后又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蒋介石握有党、政、军的最高权利，又是个极端专制的独夫，他的决定就是“圣旨”，因此，当时尽管有些人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张学良，但也无济于事。于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冤狱就这样铸成了。但在中外人士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还不敢贸然处死张学良，于是便采取了对张学良永远监禁、不断折磨其身心的办法，使他在极度痛苦中了此一生。对此，就连宋氏兄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她）们对不起张学良。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遭蒋介石拒绝。

1947年元旦，旅居上海的东北籍人士乘蒋介石颁布“大赦令”之机，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是，“大赦令”的名单中，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子。是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自发的武装反抗迅速遍及全岛（即“二二八”起义）。当时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务必不使张学良趁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先将他和赵媿打死，然后以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上报，其用心何其毒也！只是因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张学良与赵媿才幸免于难。

同年10月，张治中去台湾探望张学良时，张学良又向他倾诉了要求恢复自由的强烈愿望。张治中将此愿望向蒋介石转述后，蒋对此不但仍不置一辞，反而下达手谕，规定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均不得往访张学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施展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告“隐退”。代总统李宗仁顺应輿情，“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达释放张学良的命令。给张群也拍了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同时还派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①结果，竟被有关人员以此事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辞，予以拒绝。由此更可证明，蒋介石是制造这一冤狱的罪魁祸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死。这距张学良被拘押已将近40年。蒋经国死后，台湾当政者也未及时给张学良彻底恢复自由。无论就人道、就法律、就特赦的意义而言，都没有理由将此案继续下去，代人受过。去年台湾出人意料地给被“管束”54年的张学良举办九秩寿诞，其规模之大为世人瞩目。这是值

^①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15—316页。

得庆幸的。

近年来，海峡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全国人民渴望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屹立世界。这也是张将军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值此张将军 91 岁诞辰即将来临之际，鉴于将军身心健康，在去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后不久，又出游美国，全国人民甚感欣慰。人民渴望他早日返回故乡，拜谒先祖陵寝、会晤亲朋故旧，游览大陆风光。企盼张学良将军把握时机，作出抉择，满足全国人民的这一强烈愿望！

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该不该送蒋返宁，史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总的说，对张的这一举动，惋惜、否定的多，充分肯定的少。甚至把张的这一举动说成是哥们义气的感情冲动、不顾后果的鲁莽之举。也有人认为此举有得亦有失。笔者以为，这些认识都没有从张的爱国拥蒋抗日的历史渊源出发，更没有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环节上来分析。历史证明，张学良送蒋返宁，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义无反顾的行为。要说有牺牲的话，那就是张学良个人、家庭和东北军集团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有历史 渊源和思想基础的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爱国与拥蒋抗日密不可分，二是爱国拥蒋抗日与联共相关。前者主要表现在华北事变以前的所作所为，后者主要表现于华北事变之后的各种活动，集中在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但是，爱国拥蒋抗日是贯穿于二者始终的。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皇姑屯遇难身亡。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是年底，他排除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压力，毅然易帜，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帮助蒋介石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0年秋，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结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新军阀混战局面，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张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荣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地位显赫，仅次于蒋介石。蒋曾致函予张，称“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之情，跃然纸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因判断失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东北，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热河失守，他又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辞职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1月，张学良“海外归来，矢忠领袖。”3月1日，“就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参与“剿共”内战。他还“召集东北昔日从事救国运动诸分子，聚会汉口，说服大家，共同拥护全国惟一领袖，并指派代表到南昌晋见，听受训话。”“至诚至恳的向一切旧部属旧朋友布道，要大家一心一德拥护蒋先生，信奉蒋先生。”他“相信剿共是抗日工作的前段，换言之，就是‘先安内面后可以攘外’”。为的是拥蒋统一，实现全国抗战，尽早收复东北。

张学良努力“剿共”的结果：109、110师全军覆没，“师长、团长多数阵亡，生者被俘。”“眼看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官兵，往西北“剿共”离家一天比一天远。”^①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却在不断加快，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共党与日寇，谁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最大敌人？”张学良对这个问题“很加以客观的研究，不断的研究共产党改变后的政策（即统一战线政策——笔者注），不断的同中央剿匪将领探讨，结果发现中央将领方面，颇多人承认‘剿匪是无期徒刑’、‘疯狂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②。他在大量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中共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真诚的抗日力量，审时度势，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如果通过谈判，为国家招抚这些强悍之众，用以抗日，我认为这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领袖，都是一种无上的贡献。而且一旦和谈成功，也可以实现我多年来的夙愿（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③。他再也“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④。由拥蒋“剿共”抗日，转变为拥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二将军为抗日救国，力挽狂澜，以惊人的魄力，采非常之手段，发动兵谏，对蒋实施“最后之诤

① 《王卓然史料选》，第158、15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王卓然史料选》，第1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管宁，张友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0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赵一荻谈张学良《相依相伴六十载》，香港大公报1990年5月19日。

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①。逼他接受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这是张学良拥蒋抗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逼蒋是拥蒋的特殊手段。正如张学良当年所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②。

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下级、部属和亲密无间、合作已久的结拜兄弟、个人友好。1937年1月，“他避居奉化雪窦山，有通问者，辄以‘读书思过’四字报之，知之者，谓张平日曾尊蒋先生如师如父，故蒋先生亦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③西安事变只是张与蒋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在“攘外安内”与“安内攘外”问题上产生尖锐矛盾暂时无法化解的产物，仅此而已，别无歧见。数十年后，张在谈及他与蒋的关系时说，蒋先生一直对我很好。“等到了洛阳的时候，没有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别人对我不好。可见蒋总统对我很好。”蒋介石去世时，人殓前，张应宋美龄之邀在观看蒋的遗体后，题写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④。以此表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与蒋介石恩恩怨怨的关系。这充分说明，爱国拥蒋抗日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当蒋介石口头答应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后，毅然送蒋返宁，的确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牢固的思想基础的。

① 《张学良文集》(2)，第1055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张学良文集》(2)第106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王卓然史料集》，第1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 管宁、张友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张学良送蒋返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是由当时国内外的条件促成的

西安事变前后的客观形势，不仅造就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而且也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环境，使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成为合潮流，顺人心，扭转历史前进方向的英雄行为。

1. 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严酷现实，迅速使国内各种矛盾降为次要。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除了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外，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在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道上汇集，出现了为抗日救国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多角秘密谈判。张学良与共产党、共产党与杨虎城、蒋介石与共产党，几乎都在同一时期，各派代表秘密接触，往来频繁。一方而张、杨与共产党先后达成局部停战协定，逐步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政治局而。同时。张、杨竭力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统治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连续“剿共”十年的蒋介石，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也不能不有所动作。他从1934年开始调整中苏关系，以取得苏联的支持。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时的政府”^①。为此，蒋派陈立夫、邓文仪等，通过不同渠道与中共秘密谈判。妄图用政治手段达到收编红军的日的。与此同时，蒋又亲赴西安，督促张、杨继续“剿共”，以实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西北军的一箭双雕之美梦。无论是

^① 《西安事变简史》，第16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武装“剿共”，还是政治收编，万变不离“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但从另一角度，不难看出，蒋对苏驻华大使的谈话，也是对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方针的回应。说明在外敌入侵、全国要求抗日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准备抗日问题。这是他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口头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之一，也是张学良送他回宁的前提条件。

2.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舆论的主流是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反对内战，呼吁张学良保证蒋介石安全，送蒋返宁，和平解决事变。

首先在南京政府内部形成了和、战之争。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调动大军向西安进发，派飞机施行轰炸。宋美龄 13 日晨从上海抵南京，力排众议，指责讨伐派的所作所为，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西安事变。“她强调除蒋介石外，没有别人可以领导全国；一旦‘酿成空前之内战’，则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因此她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① 她冲破讨伐派的阻拦，先后让端纳、宋子文前往西安探听情况，促使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尽量早日回宁；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赴西安会见张、杨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受蒋委托，和宋子文一起同张、杨、周会谈，达成六项口头协议，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支特殊的促进力量。宋氏兄妹在劝蒋接受张、杨所提条件，释蒋回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蒋夫人事后形容的那样，是端纳首先打下基础，子文到来垒墙，夫人再来盖屋顶。”^② 功不可没。南京其他

① 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② 《端纳传》，第 333 页，新中出版社，1993 年 2 月版。

军政要员如孔祥熙、林森、冯玉祥、戴笠等，都赞成宋美龄积极营救蒋介石。孔祥熙 17 日电张，称：“最好兄能伴同介公回京，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愈久，吾兄所负责任愈重，且激起民愤愈深，兄纵不为本身计，宁独不为国家民族计，不为子孙计耶？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悬崖勒马，及此不迟。”^① 何应钦虽然主战，但在主和派及全国舆论压力下也给张发出“删”电，称：“兄等关于救国大计之主张，果有利于国家，中央无不采纳。若不释出委座，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仍盼即日护委座南来……”^② 南京主和派所关心的焦点，是要求张、杨释蒋返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衷是一致的，对后来张学良送蒋返宁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共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经中央反复讨论，在未接到共产国际复电之前，就确定了支持张、杨八项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应张学良之邀，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使西安，充分发挥其调解作用，为和平解决事变、释蒋回宁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及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表意见。“青岛十万工人推举代表到西安向张、杨递交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呀！”^③ 在上海的全国救国联合会 12 月 25 日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

① 《团结报》1991 年 1 月 2 日 2 版。

② 《西安事变史料》，台湾出版。

③ 1936 年 12 月 22 日西安《解放日报》

下，立即捐弃前嫌，为全国抗日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①。《大公报》14日社论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

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支持张，杨。刘湘发表致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的通电，公开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对于事变，则希望“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②。李济深反对讨伐张，杨，18日通电南京政府称：“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遂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全大局，收回成命。”

其次，在国际上，英美为了维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赞同宋美龄等人的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美两国政府还曾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对西安事变缺乏真正了解，怕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对西安事变作出诬蔑性评论。说张、杨壮举是“叛变”、“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是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等等。日本则视事变为良机。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崇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好坐收渔人之利。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80页。

② 1936年12月21、24日《桂林日报》。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舆论来看，特别是苏联的态度，的确出乎张学良的预料。这些都促使张学良尽快送蒋返宁，和平解决事变，以击破敌人的阴谋，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各方面的谅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夙愿，救中华于危亡。

3. 对蒋一片赤诚的张学良，之所以发动兵谏，完全是出于爱国、救国、爱领袖，被蒋介石逼出来的。他从来就没有伤害蒋的思想。若伤害了蒋，还逼谁去当全国抗日领袖，发动兵谏岂不毫无意义。他深知蒋安全与否，事关全局、牵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形势。兵谏前夕，他派最亲信、最可靠的人去临潼执行“请蒋”任务。反复叮嘱，千万不能伤害委员长。尽管蒋介石在西安已成“阶下囚”，张仍以部属之礼，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向他痛陈利害，恭候省悟，盼其纳谏。17日，张见周恩来时，首先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叙述了蒋介石被扣以后的表现及南京的态度和各方面的反应，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因此，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杨除通电南京，公布八项爱国主张外，张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冯玉祥及各地方实力派领导人，说明发动兵谏的初衷，敞开和谈大门，以示和平解决之良机。希望他们予以谅解与支持。为确保蒋的绝对安全，张学良请端纳说服蒋介石从新城大楼移居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12月15日，张、杨在给阎锡山的复电中称：“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面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①。这说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张学良都不会伤害蒋介石。

^① 《张学良文集》(2)，第1073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

由于张、杨二将军的主观努力，客观形势的推动，中共代表团的调解，宋氏兄妹及端纳的促进，和被迫情况下蒋介石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省悟，致使西安事变后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双方商定派蒋鼎文于17日携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亲笔信去南京。函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①。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开始走向成熟，和平谈判，释蒋，送蒋返宁，势必提上日程。

4. 张学良送蒋返宁，不仅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其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否则，决不为也！请看张学良这方面的言行。

12月12日上午，蒋介石被送到新城大楼后，杨虎城不愿见蒋，张学良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送他回京去”^②。是日，“张还向被扣押的蒋介石的军长万耀煌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八项爱国主张的一部分，他就陪送蒋介石回南京”^③。送蒋之意初露端倪。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④

12月14日晚8时，张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中说：“学良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1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

③ 鱼汲胜：《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试析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送蒋回京的思想动机》

④ 《张学良文集》（2）第106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①。”张既然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愿牺牲生命，那么送蒋返宁当然不成问题。

12月16日，张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②。是日，针对冯玉祥愿到西安作人质，以换得释蒋回宁之举，张学良复电称：“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他人或有不知，而坚决抗日如公者，应能见谅，至先送介公回京一节，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势难遵办”^③。”蒋介石不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任何人劝张，张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12月17日，张在给反对西安事变最力的社会文化名人、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复电中称：“介公系国家安危，诚如尊论。良敢保介公之安全。……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凡人言行不顾必致复亡，公等听良之言，还乞察良之行。”^④这是张向世人昭示，只要蒋答应所提条件，送蒋返宁一定兑现。保证言行一致，决不食言。

① 《张学良文集》(2)第1070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张学良文集》(2)第1079—1080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张学良文集》(2)第1011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 《张学良文集》(2)第108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

12月19日，张学良在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中，解释蒋为什么还未回京的原因时称：“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们在星期一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的所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①。这是张再次申述没有释蒋、送蒋返宁的原因。1990年8月，张学良接见日本记者谈及当年的一些事情时说：“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自己负责任，尤其是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包括预备把我枪毙的。我不管当年是怎么个情形，我临走，我都把我的家眷交给了我一个部下，……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任，没有别的想法，同时我反对内战。那时我要不那样做，内战就会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②由此可见，张学良送蒋返宁早有打算，决非临时决定，也不是受任何人的指示与影响，并且作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蒋介石基本同意西安方面所提的六项要求后，张学良决心兑现诺言送蒋返宁。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周恩来、杨虎城及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们发生严重分歧。张学良针对他们放蒋需要签定协议、发表声明之类的先决条件，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

① 《张学良文集》(2)第1093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 《城默50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① 在解释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②。还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领送神，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③。这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张学良为国为民的赤诚心迹。他躬亲送蒋，不是单从与蒋的个人关系出发，而是把它作为和平解决事变，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重要环节而决心迈出的一步。他何尝不知道送蒋的危险和后果的严重。早在1928年，他与某记者谈话时就讲过：“以吾人私人之利害计，并由历史上之观察，予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予现在则服从之，何？为大局着想也”^④。他也曾向人谈起蒋介石是个疑心重，睚眦必报的人。最近他还对记者讲：“我怎么不知去南京的结果，周恩来也劝我不要去做，但我非去不可。我虽然不想做军人，可是我做了，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何况我也把我的看法向蒋先生表示得很清楚，听不听在他了”^⑤。

促使张及早送蒋返宁的直接原因：一是24日晚高崇民以东

① 《西安事变简史》第90—91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西安事变简史》第90—91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③ 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团结报》第535号。

④ 《张总司令与某记者谈话》，1928年12月25日《新民晚报》。

⑤ 《海外星云》旬刊，1993年第10期。

北军和 17 路军高级将领联名方式写信给宋子文，表示只有蒋做了撤中央军出潼关、释放七君子和在条款上签字这三项基本保证之后，始得释蒋。有些人甚至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他干掉！”此信被张看到后，他深感情况严重。二是孔祥熙电蒋鼎文催张学良兑现诺言，称：“日前汉卿曾言，子文弟如能赴陕，当即能偕同介公回京，想现已至实现时机。介公回京之后，不仅汉兄保介公之苦心可大白于天下，而彼等主张自亦不难商讨，容纳实施”^①。三是宋美龄提出，送蒋的最好“礼物”莫过于使蒋在圣诞节离陕回宁。张学良回顾事变当初，盛世才的反悔，东北军黄永安的叛变，万福麟的动摇，十七路军冯钦哉的叛变与西安方面的复杂情况，他怕夜长梦多，万一出事，谁担得起！何以向世人交待，又何以去“补天”。他一向主张，大丈夫做事必须能放能收，自己做事必须自己了，不能不快刀斩乱麻，立即秘密（除杨虎城外，别人都不知道）送蒋返宁，当周恩来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已经升空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思想早就存在，并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一步步具体化了。

（2）张学良躬亲送蒋，是为了蒋介石日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以便领导全国抗日。当张表示送蒋返宁的时候，蒋对张说：“我载了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又说：“汉卿，还是把我杀了干净。”张说：“委员长回南京可以给我判罪。”蒋说：“汉卿，你这

^① 《团结报》1991年1月9日2版。

次举动虽然鲁莽点，但是目的为了抗日，又没有加害于我，我怎能反过来加害于你，让天下人瞧不起我的人格呢？”张说：“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①

(3) 张学良向全世界表示，西安之举，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绝无私心杂念。使那些怀疑、诬蔑张学良动机的人，尤其是亲日派无话可说。

(4) 为了使蒋介石答应的条件不致反悔，力求尽早一一兑现。他说到做到，表里如一，从不食言，实乃明智之举，体现了他那无私无畏的宽广政治胸怀。

1937年2月16日，田雨时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张学良时，张回答田问为什么亲自送蒋介石回京的理由是：①“兵谏”有裨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②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③……庶足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④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⑤……万一变卦，……就算“负荆请罪”；⑥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于小我，决非所计^②。这是张学良对躬亲送蒋的原因、目的及意义的高度概括，是主观意志与客观形势要求的自然统一，是他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夙愿而作出的合乎历史发展潮流的壮举。

三、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环节，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1. 过去人们往往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限认定为12

① 张魁堂：《西安事变史》书稿。

②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15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月25日，似乎即此，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张学良送蒋返宁却成了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无关的、多余的错误举动。其实不然。因为：①张学良赴宁被扣后，东北军，西北军（主要是东北军）内部在救张问题上发生和、战之争，形势顿时剑拔弩张，尽管周恩来从中调解，仍未避免发生杀害爱国将领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大规模内战仍有爆发的可能，和平解决从何谈起。②蒋介石承诺的六项条件还未实现。③张学良身陷囹圄之后，仍在为收束陕甘“危局”、最终实现全国抗战，在蒋介石“领导下继续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限，不应是12月25日张学良躬亲送蒋一举的实现，至少是在西安方面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的乙案之后，红军撤回原防；东北军东调，分别驻于豫南、皖北、苏北地区；17路军改编为38军，由孙蔚如任军长；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那么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自然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2. 评论张学良送蒋返宁行为的正确与否，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是代表中国人民而被国际上承认的惟一合法政府，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既然周恩来都认为当时领导全国抗日惟蒋莫属，那么，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部下的张学良来说，在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后，送蒋返宁，的确是情理中的事。另外，作为部属暂时扣留上级，按传统思想来说，当然是犯上作乱。张学良后来也说，作为军人等于是谋反。但他认为坚决反对内战，主张一致抗日还是对的，也许方法欠妥。从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他到南京的当天（12月26日），给蒋写了请罪书。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颜面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

凡有利于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察！”^① 张学良这一举措，充分表现了他为国为民，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之后，他仍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发挥作用，目睹蒋介石兑现一些条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曾作出高度评价。1937年3月1日，他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②。这既充分肯定了张学良送蒋返宁的意义，也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一定作用。当然，张学良将军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比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来说，确是小我之失也。

① 《张学良文集》(2)，第110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新中华报》1937年3月29日第3版。

试论张学良的功过是非



出身军阀家庭，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地位显赫而又极富传奇。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其功过是非，一向为世人关注、学者研究。有关论文、著作及影视作品之多，在所有爱国将领中可称之最。然而至今意见各异，看法不一。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海峡两岸的学者，观点对立，如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直至彻底胜利，有大功于中华民族，张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学者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退居台湾，张乃罪人。张学良自己则说：“在国内不幸的动乱时代，我从事内战不知多少，杀人如麻。”^②“在我的一生中，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但是却一事无成。”^③

① 台湾王禹廷先生撰《西安事变，酿成巨祸》一文，见1986年，台湾出版《传记文学》从第47卷开始连载。

② ③④见《毅获见证集》第1、19、21页（1998年1月12日，笔者访张时获得此书）。

“有人说我好，我也不见得有那么好，有人说我坏，我也没有那么坏，上帝都知道。”^④那么究竟怎样评价张学良才算公道呢？笔者认为，只有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准绳，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判断张学良的功过是非，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现就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同仁。

东北易帜是多种力量促成的爱国之举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执政东北后，实践其“息争御侮”志向的首次尝试。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文与专著。总的说，似乎分歧不大，仔细分析，仍有差异。要么评价平平，要么过于突出张学良“无私奉献”的个人作用。也还有人认为易帜告成，给井岗山的红军造成压力，其性质尚属反动。事实是，东北易帜是由形势逼迫、人民推动、张的决心和蒋介石的支持，共同铸成的爱国之举。

1.19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愈演愈烈，犹似狂潮。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相互交织，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转换彼此的主次地位。进人民国之后，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据地称雄，横征暴敛，相互攻伐，兵连祸结，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若大的中国四分五裂，任人宰割。长期处于日、俄帝国主义夹击下的东三省，犹如破碎江山的悲惨缩影。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早在明治初期，为冲破其发展资本主义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严重障碍，逐步形成了并吞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在受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后，日本法西斯势力，企图以武力攫取殖民地，掠夺资源、充实军备，以求达

到称霸之目的。张作霖时代的东三省，实质上已成为日本控制下的自治区。他们彼此勾结，各有所图。日本想利用张作霖实现获取东北权益的“满蒙悬案”^①，把张作霖扶植为驯服的傀儡工具，进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张则利用日本的支持，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雄踞一方，问鼎中原，直到当上北洋军阀政府的末代元首。但他又不愿彻底卖身投靠日本甘当奴才，采用“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对此，他颇感自豪，曾对美国孟禄博士炫耀说：“我张作霖没有别的能耐，但为国家保护这点土地，还敢自信。日本费莫大力气，要求 21 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到什么了？他一条也没得到。”^② 正因如此，1928 年 6 月 4 日，他在奉天皇姑屯吃了日本的炸弹，呜呼哀哉。只是因为张学良及时化装潜回沈阳，巧于安排，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政局稳定，日本才暂时未敢轻举妄动。

张学良执政东北时，南有蒋介石催逼易帜，归顺南京，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阻挠他与南京合作。面对东北人民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声和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东北何处去？是张学良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出路无非是：投靠日本以自重，甘当有名无实的东北王，会立即得到日本的大力支持，这是具有民族意识、忠孝之心的张学良决不选择的屈辱之路；既不投靠日本，也不改旗易帜，势必继续内战，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显然有违于“息争御侮”的初衷；实行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实现和平统一国家，既可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地盘，又可一致对外抗击日本的侵略。这是张学良潜回东北之前就反复考虑的问题，由于日本从中阻挠，干涉易

① 所谓“满蒙悬案”，是日本人与袁世凯签订的 21 条遗下的祸根。其中除了商租地、开矿权等特权外，主要是日本在东北及蒙古东部的修筑铁路的特权。

② 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第 101—108 页。

帜，易帜时间才推迟到1928年12月29日。

2. 呼吁和平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在当时已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长期的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渴望和平、安居乐业，是他们的迫切心愿。东北人民感受更深。1928年7月7日，吉林省教育界张德懋等上书张学良，要求改旗易帜，以救危亡。7月10日，东三省旅平学商两界发表宣言，要求东北领导集团“顺应潮流，改旗易帜，服从民国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以谋统一”^①。“9月16日，奉天教职员联合致电张学良，希望‘迅即旗扬青天白日，改遵三民五权，实行赞助统一，以表爱国邦乡之意。’”^②11月8日，吉林省城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响应延边吁请易帜通电，召集各校学生及民众约万人，手持青天白日旗帜，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南北统一，结队赴省署请愿易帜。”^③11月9日，哈尔滨5000学生举行反日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20余人。可见东北人民希望和平统一之心极为迫切。他们还上书张学良，“若不改旗易帜，终恐为众矢之的。”人民的强烈易帜要求，为张决心实行易帜，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动力。

3. 张学良之所以决心易帜，是因为他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他虽是张作霖之子，但童年是在辽西新民地区的农村度过的。他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与蹂躏。尤其日本人在东北的横行霸道——随便杀害进入南满铁路沿线几公里以内的中国人的残酷情形，使他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意识。他曾为国势垂危而苦闷。“心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家弄到如此地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④后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

①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20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②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20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③ 引自1986年张学良讲话录音整理稿。

之希望》演讲的影响，茅塞顿开，精神振奋。“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①他积极参加爱国储蓄、义演义卖赈灾和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 21 条等爱国活动。以青年爱国狂的形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崇拜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丁汝昌等杰出人物，决心以他们为榜样，报效祖国。

他在追随其父参加军阀混战中，逐渐产生了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国家，共同对外的思想。1925 年 6 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说：“国人一向痛诟军阀跋武，学良亦军阀之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②他在 1930 年 11 月的演讲中称：“内战为罪恶之母。……在作战之将士莫不以抛头颅洒热血为无尚之光荣，殊不知男儿不协力对外，为国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③1927 年 3 月 21 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占领上海时，正与北伐军干戈相向的张学良，次日，与奉系将领韩麟春发表时局通电。内称：“期在地方共得安居，人民悉循正轨，并望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共挽颓流。”^④是年春，他在写给留学日本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称：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⑤他认为“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决不能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⑥“决不能以一党一派之利害而危及国家。”^⑦可见张学良参加内战并非心愿，而是父命难违。

① 《张学良文集》（上），第 393 页，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学良文集》（上），第 355—356、64、75、62、67 页，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基于上述思想，1928年春，他力劝其父撤兵关外，结束战争，保境安民，以便南北和平统一，共同抵御外侮。这也充分说明，张学良在易帜之前所时刻考虑的不仅是自己一派势力的消长与恩怨，和一家一姓的实力与地盘，而是从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息内争、御外侮，和平统一，以解救濒临危亡的祖国。其言行超出了一般旧军阀封建割据的思想范畴。他决心易帜，本在情理之中。

4. 既要决心易帜，内要统一思想，外要对付日本，还要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

早在1927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声明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政府当无权过问。张趁此良机，把昔日其父“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推个一干二净。日本鉴于国民政府的宣言，自知理亏，有口难辩。加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不满，日本怕出现外交孤立，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提向中央交涉。

1928年7月21日，当张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告知蒋介石，日本正式书面劝阻张学良易帜时，蒋鼓励张：“此宜自己觉悟，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①。“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当即决然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②。是日，“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外务省抗议驻沈阳日总领事（林久治郎）阻挠张学良易帜。”^③当林氏再次警告张学良（说什么“南京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联系之必要；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发生财政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时，张反击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

① 《中华民国大事记》（2）第850页，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②③ 《中华民国大事记》（2）第850—852页，文史出版社1997版。

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日本干涉情形，向南京报告，林氏无以回答”^①。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借参加张作霖丧仪之机，转达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威迫利诱张学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张“替父还债”，落实当年张作霖从事内争时曾答应给日本的所谓权力；二是鼓吹张学良独立，与南京抗衡。即是冒干涉中国内战之嫌，也在所不惜。张针锋相对：“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本身的责任，在保全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我本身没有权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的账如果是真的，只好向南京去讨。”^②“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如同日本人爱日本国一样，我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应当在一起共存亡，我的地位生命可以牺牲，我的人格信念不能动摇。”^③“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意之所向为准，决不违背民意而行事。”^④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高尚气节！

当内部有人提出：“东北地域辽阔，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兵强马壮，何以弃王称侯”时，张反驳说：“什么王啊！侯啊！中国不统一，王、侯都完蛋！”^⑤在他看来，单凭东三省的力量，难以抵御日本，惟有实现全国统一，不仅王、侯可以免遭灭顶，而且中华民族也才有振兴的希望。这是张学良决心易帜的目的，也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经过与蒋介石的多次谈判，蒋答应东北提出的主要条件：“①东三省党部暂缓工作，由东三省挑选青年赴南京学习党务，归后再行举办；②所有曾在东三省任职者之生命财产应予保护；

① 《中华民国大事记》（2）第850—852页，文史出版社1997版。

②③ 《王卓然史料集》，第153—15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41—42页，辽大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⑤ 笔者1998年元月访美时拜见了东北元老宁恩承先生，他给我讲了东北易帜时，他提出的“王、侯”之说。

③东北政治分会及省府人选，概由张学良开单，经蒋介石转呈国民政府任命。”^①至此，张认为条件成熟，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治合作。东三省所有内政事务南京政府概不过问，未来关于东北的所有外交事务，当有南京中央政府全权负责。

东北易帜的圆满成功，达到了一举三得人民满意的结果：一是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粉碎了日本乘机鲸吞东北的阴谋；二是张学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为其后的励精图治，建设新东北、抗衡日本奠定了条件；三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使张氏父子长期统治的东三省归顺南京，实现了和平统一国家，结束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当时东北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实行易帜是顺人心、合潮流的爱国之举，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张学良功不可没，应予充分肯定。促成此举的各种力量，也不可忽视（包括蒋介石与英美的支持）。由于阶级出身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张学良不可能投靠尚属星星之火的井冈山红军。因此就认为东北易帜其性质反动，是不能成立的。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有是有非

中原大战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专制而引发的新军阀争权夺利的争斗。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万，死伤30多万，历时半年之久，战况惨烈空前。给国家财力、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张学良对此，先是保持中立。因为“他不相信国民党，害怕中央政府有朝一日剥夺他在东北的最高权力；……更不愿与他父亲的老对手冯玉祥之辈结盟；他怕俄国人

^①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02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3年出版。

会乘机让共产主义在东北落地生根；更可怕的是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强邻一刻也未打消他对东北的野心。”^① 静观待变，有利于在这场多边权力之争中，加强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1930年3月1日，他发出《劝告蒋介石阎锡山和平息争通电》：“所冀举国同胞，洞察危局，注视线于国外，立泯内争，本诚意以相维，共图匡济。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② 当双方激战难解难分之时，蒋、阎的代表云集奉天，后来追张至北戴河，采取金钱引诱、封官许愿等多种手段，拉拢张学良站到自己一边，以求获胜。蒋方略高一筹，所许条件大大优于阎冯集团。南京方面首先用49万银元从东北兵工厂买去枪炮子弹，使张学良经济上受益；二是免税进口建设葫芦岛港的所需器材；三是除拨付500万元出兵费外，中央另外承担东北军驻平、津部队的全部饷项；四是将平、津及华北数省归张统管；五是出资1000万整理奉票；六是任命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③ 尽管张学良曾有上述担心，一度保持中立；但是，如此的优厚条件，不能不使他动心。经过较长时间的观望、考虑和分析，他终于在北方反对派政府宣告成立的第二天（9月10日），在东北召集高层军政人员秘密开会，宣布其意图：“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日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④ 认为北方军事同盟，只是一个松散的暂时结合，南京国民政府则是英美支持、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即便阎冯集团战胜南京方面，其内部纷争亦在所难免。蒋介石虽不完全可靠，但毕竟不同于北方的乌合之众。故为整个大局

①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59页，辽大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张学良文集》（上），第262—263页，香港同洋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③ 台湾出版《传记文学》，第50—52卷，连载吴铁城收藏之《张学良进关秘录》。

④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63页，辽大出版社1988年出版。

着想，必须早日息争议和，从速实现国家统一。1930年9月18日，张发出和平通电，率军人关。阎冯集团土崩瓦解。这是张学良继东北易帜之后，又一次助蒋统一，巩固了蒋家政权。他因此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威镇北方八省二市，地位、声望直线上升，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

张助蒋有功，蒋待张不薄。蒋曾致函予张：“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之情，可见一斑。是年冬张应邀赴京，一路上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抵京后又受到隆重的礼遇和接待。蒋介石以平等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次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张亦亲往捧场，表示拥护统一之诚，南京欢迎之盛亦如之。”^①从此，蒋张结盟，亲如兄弟。张对蒋亦步亦趋，开始卷入新的内战漩涡。

张学良此次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他贯彻“息争御侮”主张的继续。为了抗拒日本对东北的压力，无论就个人，就国家来说，他都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作后盾。此举虽不能排除军阀所固有的个人野心，但他与一般旧军阀不同。他珍惜和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人企图建立独立的北方政府，从来不赞成两个政府分庭抗礼或是中国分裂割据。从结束半年之久的军阀混战局面，减轻人民所受战争之苦来说，张学良率兵入关，助蒋统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更加严重的后果则是：蒋介石可以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的“红军”进行旷日持久的“围剿”；使东北国防空虚，给侵略成性的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政治军事流亡集团；使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① 《王卓然史料集》第15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九·一八的后果与“双十二”的丰功伟绩

没有九一八就没有双十二。前者促使中华民族与一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为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别突出而又极端尖锐的矛盾；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治军事流亡集团无家可归。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他们逼上了“兵谏”之路（即西安事变）。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促成国共二次合作，实现全国抗日，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在二者之间的五年多里，各党各派各界（主要是国共两党），为适应民族利益的需要，不断修正各自不切实际的主张，为寻求团结统一，共同救亡之路，历经曲折，付出代价。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有不少论文与专著，这里不再重述，仅就以下几点谈点看法。

1. 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

(1)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判断失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的责骂、贬官、辞职、出洋考察等接二连三地袭来。这一“历史伤痕”，终成他的“痛苦回忆”。^① 当年拥护“统一”的功臣，威信一落千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使华北门户洞

^① 1991年张学良曾为《九一八事变丛书》题写：“历史伤痕、痛苦回忆”，以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

开，给日本进而侵占热、察、平、津提供方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这恰为张学良事先所言中。张下野时，曾当着端纳顾问的面对秘书王卓然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要演变到什么程度，人家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①他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心中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五年后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当面对蒋说：“你不要以为‘九·一八’事变后，人们仅指责我是不抵抗者，如今你在世界舆论面前，与我并没有两样！”^③倾诉当年下野身背“不抵抗将军”罪名的冤屈。要蒋接受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彻底洗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2) 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④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在其主子英美的支持下，也可能产生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就连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后来也不约而同的为寻求救国之道，开始调整各自的原有政策。所不同的是，中共一贯倡导的抗日主张因蒋介石的“剿共”战争而不能实施，反蒋抗日，实不得已。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要求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纷

①② 《王卓然史料集》第143—144页，199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郭增恺：《西安事变三忆》第58页，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年版。郭曾任冯玉祥秘书、杨虎城参议、张学良顾问、胡宗南顾问、宋子文秘书。1936年随宋到西安参与和平解决事变工作。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纷成立，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另外，中间势力主张统一，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量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这里所说的内战，主要是指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此战不止，抗战难行。难行之因，根源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魂不散。

(3)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①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如出一辙。是年夏，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外咸知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当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②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致使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①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

^② 《张学良年谱》（上），第569页，199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①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此时张学良直接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抗日之道而加快步伐。张学良由拥蒋武力统一而后抗日，到拥蒋联共抗日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事例。

4. 是张学良最早提出了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上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以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灵丹妙药，但又不主张完全照搬德意专制独裁的一套，对法西斯专制制度做了新的解释：“拥护领袖绝不是拜菩萨，不是崇拜偶像，更不是谁作谁的走狗，而是在拥护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去复兴民族。”^②“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净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③一方而仇恨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必先安内而

^① 宋子文讲：“至第四次‘围剿’为止，除械弹军实等支付不计外，共耗国币四亿银元”（见《西安事变三忆》第103页）。

^② 《张学良文集》（下），第172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③ 《张学良文集》（下），第382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后攘外。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解决。”^①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提出：“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②“最适当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③“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个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④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他的这一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并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统一，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一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可见他的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

① 《西安事变研究》，第32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 《张学良文学》（下），第103、104、169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③ 《张学良文学》（下），第103、104、169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④ 《张学良文集》（下），第103、104、169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均不能解决共同救亡的问题。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惟一正确的救亡之路。在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央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一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的目标奔跑。是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2. 关于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败退台湾问题

(1)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显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一古训，在西安事变和八年抗战中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华夏子孙永留典范。西安事变是历史发展方向转换的枢纽。“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需求，而且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的憧憬与迷梦。”^①

(2) 西安事变的辉煌成果，当属中华民族，决非一党一派的私利。以狭隘的党派之见来看待这一事件，是欠妥的。那种把中共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归罪于张、杨及其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缺乏根据的，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首先应当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围追堵截红军的彻底破产。会师甘肃会宁地区的红军与东北军在

^① 《张学良文集》（下），第477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榆林桥、劳山和直罗镇的战役中三战三捷，歼灭东北军近三个师的兵力，两个师长丧命，数千官兵被俘，证明红军决非强弩之末，不堪一击、穷蹙边隅，灭亡在即。蒋介石“剿共”十年，共产党越剿越多，其红军力量越剿越大。蒋的第五次“围剿”历时两年，红军历尽千辛万苦，作出巨大牺牲，在如此恶劣的军事和自然环境中，蒋都没有将红军消灭，而三军会师甘肃会宁地区，靠近外蒙和苏联，蒋仍吹嘘几周之内全歼陕北红军，纯粹是疾心作梦。他的爱将胡宗南在西安曾对张学良说：“红军是打不完的，败也不溃。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打红军是无期徒刑。”^① 宋子文当年赴西安劝蒋接受张、杨所提条件，和平解决事变时，曾对曾扩情说：“共产党不是用武力所能消灭的，蒋先生靠武力剿共才有今天。”^② 可见“剿共”不得人心。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科学的理论武装、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凝聚锻炼了一批治军治政治国的英才（连宋美龄都哀叹蒋介石身边没有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的。这与西安事变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其次，八年抗战开始，蒋介石又企图在抗战中削弱八路军的主力，梦想有朝一日再彻底歼灭共产党，于是推行了一条压迫人民的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断挑起国共磨擦，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重创。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其阴谋，争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八年抗战，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日寇进行浴血奋斗，建立、扩大、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乃天经地义。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哪呢？”仅以河北为例，“整个抗日时期，国民党

① 郭增恺：《西安事变三忆》，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版。

② 郭增恺：《西安事变三忆》，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版。

的河北省党部和政府，都只在河南的洛阳办公。而中共的组织则深入到河北境内去，你想想河北人民将会跟谁走呢？那不是很明显吗？”^① 这能怪张、杨和西安事变吗？显然不能。

第三，旁观者清。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1944年10月9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共产党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被消灭成为不可能。……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对人民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两点至今尚无愿意或能做到的征兆），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② 是年，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写道：“蒋的封建的中国不能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③ 这些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的美国人1944年就看出了国民党丧失人心，共产党不可战胜的趋势。这与西安事变又有何干？

第四，抗战胜利，全国一片欢腾。人民渴望和平，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假和平真备战，“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又依仗美方支持，凭借种种优势，突然发动内战，扬言几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因而再次丧失人心，把中间势力推向共产党一边，这又是谁之过呢？当时蒋介石若稍有雅量，有点“大肚”，乘自己威望尚好之良机，容纳各党各派共同建国，振兴中华，岂不更好？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况且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腐败透顶、背离人心，祸及国民。就连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早在1947年就预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现在就

① 郭增恺：《西安事迹 三忆》第59页，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版。

② 《美国与中国人的关系》（下）第517页。

③ 《美国与中国人的关系》（下）第517页。

是明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我看已经无可挽回。”^① 这与张、杨和西安事变毫不相干！

第五，“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又是张、杨两位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② 没有西安事变，蒋早已被不断高涨的抗日浪潮席卷而去。是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蒋先生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促成了蒋先生成为世界五强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他曾钦定了12月25日为民族复兴节”^③，没有西安事变，此节何来？他在当年12月26日的通电中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已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④ 国共二次分裂后的1949年，蒋仍认为：“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意志统一的基础。”^⑤ 蒋的这些言论，对西安事变的现实，历史意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到了台湾，那些否定西安事变意义，嫁祸、怪罪张、杨和西安事变的先生们，不仅不顾历史事实，而且连蒋先生上述的“良心”之言，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没有西安事变和八年抗战，也不会有台湾回归之说，恐怕蒋先生后来落脚台湾也都不可能了。

历史事实证明，毁掉蒋家统治大陆的不是张、杨和西安事变，而是蒋先生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幽灵和他采取的一系列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综观以上诸点，张学良之所以能从一个豪门子弟、年轻军阀

① 《张学良幽居岁月》，第1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 见《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③ 郭增恺：《西安事变三忆》，第111页，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年出版。

④ 见1936年12月27日《中央时报》。

⑤ 见1949年6月，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

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近代中国作出特殊贡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近代中国的两大基本矛盾有较深的认识。“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始终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和纷繁复杂的内战漩涡中，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即使身陷囹圄，还念念不忘“台湾人版图”，^①渴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尽管他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历尽坎坷、曲折，但无怨无悔。他当过军阀、打过内战，剿过红军；他生活荒唐过，并且吸过毒。但他对此从不讳言，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责之“堕落”，并多次检讨，一一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他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从不谄过于人。他看似鲁莽，并不尽然。正如他说：“我做事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看我面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②东北易帜，诱杀杨常和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都干得干脆利落，令世人叹服。他因爱国获罪，被蒋介石软禁54个春秋，“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仰。”^③

① 1990年5月，张学良书寄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人版图。”以歌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反对分裂，主张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

② 1986年张学良在与晚辈们的一次谈话时说：“我做事高深莫测……这才叫厉害，当年蒋先生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已86岁了，才给你们讲这些话。”

③ 《张学良年谱》（下），第1442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后 记

《张学良轶事》，在华文出版社及社长吴修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该书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深入民间调查所得、张学良1986年和晚辈们的谈话及现有的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材料鲜为人知，首次与读者见面。只有“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一文，是征求作者曹振中先生同意才全文编入此书的。书中张友坤研究员的三篇学术论文：《爱国何所罪 青史有定评——张学良爱国获罪略析》、《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和《试论张学良的功过是非》，前两篇分别发表于1991年《近代史研究》第4期和1994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同年《新华文摘》第4期，摘编刊载了《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一文的主要论点），最后一篇已收入1998年12月出版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中一部分以《西安事变的动因和影响再探索》为题，发表在1999年《山东社会科学》第2期。对提供照片的吕正操、阎明光、周毅、赵双城、杨景华、于魁智等同志谨致谢意。由于水平、能力所限，书中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0年5月于北京